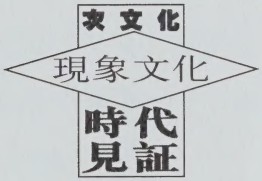
CANADA HONG KONG LIBRARY
3 1761 08871634 5

林匡正

九十後看中国

作者簡介

林匡正 筆名武大郎，一九八三年生於太平盛世的香港，熱愛中華文化，以中國人身份感到高興，以振興社會為己任。曾就讀於香港培正中學和英國波爾矛夫大學。著有：《八十後運動》、《香港大崩壞》。


次文化
現象文化
時代
見証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24 with funding from
University of Toronto

https://archive.org/details/31761088716345

RICHARD CHARLES LEE
CANADA HONG KONG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ies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Ontario, Canada M5S 1A5

次文化現象文化叢書

現象文化系列之八十五

夾縫

九十後看中国

林匡正⊙著

次文化堂出版

——次文化現象文化系列㉟

夾縫•九十後看中国

作　　者：林匡正
社　　長：彭志銘
出版顧問：史亦書
執行編輯：李子翹
助理編輯：劉思航
美術編輯：李家欣
封面設計：原秋白
出　　版：次文化有限公司
地　　址：九龍彌敦道612-618號
　　好望角大廈10樓1009室
網　　址：http://www.subculture.com.hk
　　http://次文化.香港
電　　話：27805625
印　　刷：次文化堂
總 經 銷：次文化堂
出版日期：2012年7月初版
書　　號：SCB575
I S B N：978-962-992-303-7
定　　價：HK$88

©二〇一二年　版權為次文化有限公司所有，嚴禁作全部或局部翻印、複印、轉載或其他用途。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釘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前言

當上世紀80年代出生的人被標籤為八十後；當社會把希望存放於新一代；當有人不喜歡被標籤；當有人喜歡以八十後自居，社會出現了新一批後浪，他們生於1989年或之後。為何選上1989年，是因為那年是中國歷史上一重大轉捩點，就是六四事件發生。六四事件是中國改革開放的轉捩點，令中國的經濟路向與政治路線來一個大檢討，以及實質轉變。

因此1989年或以後出生的一代處於港英殖民與後殖民的夾縫；處於英國與中國的夾縫；處於香港本土與大陸化的夾縫；處於世界公民與強國子民的夾縫；處於廣東話與普通話的夾縫；處於繁體字與簡體字的夾縫；處於中共極權與地產霸權的夾縫；處於移民一代與八十後的夾縫；處於自由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的夾縫；處於專制政治與爭取民主的夾縫。

本書訪問不同類型的夾縫一代，希望大家從不同角度了解他們的心態。

代序一

喬靖夫

初識林匡正，乃因收聽好友黃洋達的早晨網台節目《早朝天下》，猛然發現有這麼一位時事評論主持，詞鋒健銳，罵起牛鬼蛇神來正氣凜然，而且掌握背景資料精到，有理有節，聽得甚痛快，登時留下深刻印象。

因政府推行怨聲載道的中港自駕遊，終於透過電視播放的立法會公聽會看見林君真身。「Next哥」一外號從此不脛而走，此處不多述了。

後來得知匡正原來也是習武之人，專修洪拳，洪拳為嶺南少林正宗，與反清復明義士淵源甚深，武術能培養一人之氣質心性，信焉。

八九民運與六四屠殺，是香港自前途問題之後最大的政治轉捩點，其影響一直延續到今天。1989年時我正是大專生，亦因為六四事件的影響而走上作家之路。可正因為我們這代人曾經親歷其事，心裏總不免有些自矜，對後輩年輕人的政治熱情容易抱有懷疑。

匡正這部書，深入探討了「後八九」出生一代香港人對政治和社會的看法，不管對任何年代的人來說都具有重大的自省意義。孩子成長在我們大人營造的環境裏，他們正是我們的鏡子，亦是我們希望的寄託。此際「國民教育」洗腦工程正在磨刀霍霍，我們更不可視若無睹。

對年輕人我永遠抱持樂觀的心。青春就是熱情與能量，所欠的只是點燃的方法而已。

2012年7月

代序二

黎則奮

1989年是香港人的歷史烙印，曾經令在殖民地管治下，對政治冷漠的港人再次關心中國，從未如此在感情上與大陸同胞血脈相連。但六四血腥鎮壓，使絕大部份熱誠愛國的港人遠走他方。

好不容易又到九七，香港終於回歸祖國，在中共大力挺港經濟政策下，本港股樓暢盛，經濟欣欣向榮，使原本移民海外的港人紛紛回流，對前景充滿期盼。

殊不知亞洲金融危機驟然掩至，使金融地產等本港核心經濟不堪一擊，股樓暴瀉，香港從此走向兩極分化，貧富分化，步向M型社會。

禍不單行，亞洲金融危機外，董建華顢頇無能，亂港七年，民不聊生。世紀絕症沙士殺到，人仰馬翻，經濟蕭條，香港社會墮入深淵，萬劫不復。中共不得不出招，自由行與CEPA等政策救港，望令香港起死回生。

但天下間那有免費午餐?經濟得益之餘，社會和政治上卻需付

出深重的代價，香港大陸化便是必然結果，務求兩地融合一體化。中共要在香港建立第二隊管治團隊，密謀以幹部治港取代港人治港，從文化到政治層面湧入。大陸風氣習慣無孔不入，無遠弗屆，令土生土長的港人喘不過氣來。

八九前的一代港人見慣風浪，飽受折騰，吃不消之餘，因為早知政治險惡，別覓出路。八九後的一代，生不逢時，生於夾縫，身不由己，猶如渡河卒子，後無退路，只能勇往直前。

前途永遠屬於年輕的一代，因為世界歸根究低都是屬於他們的。要知香港的未來，必先瞭解本港生於夾縫的一代。林匡正份屬夾縫的一代，是箇中的佼佼者之一，由他親自訪問同代朋輩，最能窺探他們的心態，可讀性甚高，關心香港前途的朋友，不可錯過本書。

2012年7月

目　錄

前言

代序一（喬靖夫）

代序二（黎則奮）

這些年，一起走過的日子 …… 一個八十後港男的獨白 3

訪問 21

小魯、小吳 23

蔣家健 33

黃之鋒 41

陳當勞 49

V煞仔 57

黃　進 63

莊澤權 73

司徒子朗 81

鄧翠莎、葉梓鋒 91

社運情侶——葉志行、何潔明 103

何偉樂 117

Tommy 127

陳倩瑩 133

Koey 140

阿　花 153

邱嘉俞 162

後記

夾縫・九十後看中国

這些年，一起走過的日子……

一個八十後港男的獨白

我個名叫陳大文，係，陳大文，家傳戶曉嘅陳大文，無論係身份證廣告定係護照廣告，甚至係學校通告嘅樣本，都唔知點解，梗係好鍾意用我個名做示範，搞到次次識新朋友仔嗰陣，一講自己咩名就俾人笑。

廢話少講，介紹自己先：我生於風雨飄搖嘅1983年。嗰年除咗紅館開幕外，到咗炎熱嘅夏天仲展開了中英談判。由於談判無共識、無進展，引致股災出現，加上一代武打巨星傅聲與《牛仔》作者王司馬過世，以及颱風愛倫襲港，我就正正喺愛倫登陸香港嗰日出世。老豆話我係暴風中嘅嬰兒，註定一生多災多難。老豆仲話，1983年，港府實行限額賣地，乃今日地產霸權嘅開端；而中共有意收回香港，香港將會有日出現港共治港或地下黨員做行政長官，香港將會有日喺專權政治混合地產霸權下被統治；總之話我係黑星托世咁啦！

老豆話其實由1982年趙紫陽放風話要收番香港到中英談判呢段時間，曾經考慮「唔造人」，連一個嬌都唔要，唔好話兩個妙；因為唔知英國會唔會繼續管治香港，又話中共夾硬單方面要收番香港，就好似一對離婚夫妻爭個仔嘅撫養權，而個仔就完全無得話事，連

表態權利都無。老豆話如果英國人離開，香港唔知會變成點，所以唔生仔好過。咁又係，做鐘錶業嘅阿爺，自從港英政府喺1974年實行港元自由浮動、把握越戰同兩次國際石油危機，而放寬外資金融投入，便由出口業同紡織業轉型到金融業同鐘錶業。阿爺雖然唔似同行嘅李鵬飛同鍾士元咁飛黃騰達，但都算順水順風，如果英國政府離棄香港，的確對前途會有憂慮嘅。

不過我就唔係咁睇，我話我係福星托世就真。出世無耐，聯繫匯率制定，之後嗰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確立1997年7月1日，香港將會回歸祖國懷抱（不過話事人由清廷變成中共了）。股市亦因此步步上揚，老豆唔知好彩定眼光好似四叔啊、郭得勝啊咁鬼好，令到身家暴漲，我哋成家亦由石梨搬去畢架山。媽打仲話當時老豆當我係運財童子咁，日日對住我唱《愛你愛到發狂》：「我愛你愛到發晒狂」，仲差啲幫我改個叫Sharona嘅英文名。

阿媽當然懶理老豆啦，你有你唱譚校長，佢有佢日日去信和買近藤真彥嘅相，仲剪埋個「孖池」頭，以及每個月重溫一次《飛車歌舞三人組》嗰套戲，激到老豆生蝦咁跳。而阿爺因為同行大部份將間廠搬去大陸，而索性結業。阿爺話當年艱苦期，個個咬實牙根，

一路唱羅記嘅《獅子山下》：「人生中有歡喜，難免亦常有淚，我哋大家，在獅子山下相遇上，總算是歡笑多於欷歔。人生不免崎嶇，難以絕無掛慮，既是同舟在獅子山下且共濟，拋棄區分求共對。放開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同舟人，誓相隨，無畏更無懼。」一路加班趕工，唔可以因為大陸人工平、成本低而離棄班手足，又話《阿信的故事》入面，田中裕子教大家要自強不息，唔可以搬廠返大陸。不過唔知係咪錢滾錢太易，四行（遠東、黃金、香港、九龍）合一，金融世界興盛，班員工賺錢太易，唔係全職炒股就走去開物流公司，甚至話定期睇住夏春秋，每個禮拜買個希望（當然隨後換來嘅係失望）都好過堪苦，所以阿爺最後都結業退休。老豆就話，「佳視」結業，三個電視台變番做兩個，就算梁小龍啊、白彪啊、米雪啊，過晒「靚的」，都難掩阿爺嘅傷心，所以間接影響到選擇結業退休。叔公都因為工廠結業，選擇喺當時移民潮下移居多倫多，阿爺心情低落，話後生嗰時成日同叔公去夜總會，嘩！夜總會搞咩？原來係去捧Joe Juinor同黎愛蓮場。所以叔公移民後，阿爺成日播黑膠唱片懷緬過去。

可惜好景不常，港督尤德去世好似帶來警號咁樣，1987年10月

嘅全球股災，單係10月19日就跌超過四百點，搞到股市停牌，停牌七日後重開，單日跌超過千一點，股市由三千幾點跌破兩千點，老豆身家唔見一大半，我哋又由畢架山搬去沙田第一城，來次大屋搬細屋。老豆話嗰次打擊，同聽到「俏黃蓉」翁美玲嘅死訊帶來嘅打擊一樣咁大。老豆話當年翁美玲除咗扮黃蓉維肖維妙外，喺《夾心人》入面嘅黃佩汶都演得非常出色。

今次股災，老豆嚇到連9月先集資嘅長實都放埋，仲自責唔單止學唔到偶像「股壇大亨」大劉嘅十分一，而且損手爛腳，累及家人，搞到無晒鬥志嘅老豆，除咗跑馬嗰日充滿朝氣，成日對住驃叔、熊良錫、卡洛斯大叫：「上呀！上呀！」先特別醒神外，其餘時間都無嚟鬥志，只係日日放工就播阿Lam嘅《數字人生》：

3 0624700

3 0624770

5 34202 13942

4314 0624

填滿一生，全是數字，

誰會真正知是何用意。

煩惱一生，全為數字，

圓滿的掌握問誰可以。

明明创正23，為何彈出41，

誰人能夠預知，

4點34價位暴升變咗1004，

憑號碼來認識，

你的IQ，你的身家，

你的體魄，你的一切。

人與數字有許多怪事，

看看計數機裏幽禁幾多人質。

一場股災隨之而來嘅係混亂局勢，當我喺士多嘅冰水入面抽枝枝裝可樂飲吓，再買枝阿波羅雪條同買番包乖乖或童星媽媽麵食吓，然後走到隔籬惠康門口，入一蚊、兩蚊去抽番個扭蛋，抽番個Q版高達同合金車（不過依家閒閒地一個扭蛋都要二、三十蚊個，差唔多一個早餐咁貴），甚至同朋友仔交換龍珠閃卡嘅時候，原來香港政局正處於風雨之時。1988年11月，除咗電影分級制實行外，政制方面有《雙查方案》出台，阿爺因為個方案太保守，曾經罷買《明

報》。而李柱銘帶頭焚燒《基本法》嗰刻，我雖然得嗰幾歲，但印象好深刻，開始覺得原來政治同自己好似有啲關係咁。

1988年唔單止係我開始感到政治同自己有關，仲第一次感受到自己原來就係香港人。話說我細個嗰時，房間貼滿晒李小龍嘅海報，陳真、唐龍、鄭潮安全部都有。雖然我細個無睇過李小龍嘅戲，但係阿爺話貼滿李小龍海報係想得到佢保祐我快高長大，話咁樣好過啲大陸同志掛毛主席張相做保祐喔。唔知係咪耳濡目染下，對功夫產生興趣。第一次入戲院就係要老豆帶我去金聲戲院，睇成龍主演嘅《警察故事續集》，發覺比阿爺每年鬼節帶我去西環睇人上演潮州劇《目蓮救母》更合我心意，從此就愛上功夫片。睇完戲後，老豆同我講，全世界功夫影星，李小龍、梁小龍、成龍都係香港人，話功夫就係香港代表，要大大聲同人講我係香港人。嗰時我就知道，無錯，我身份就係香港人，因為我哋係打功夫嘅！唔知係咪太沉迷成龍，當我有足夠零用錢，第一次自購戲飛入場，就係中三嗰時入UA戲院睇《我是誰》。

1989年，《基本法》頒佈，接着大陸局勢有變，一班大學生高舉反貪腐、反官倒嘅旗幟進行愛國運動，身體力行力諫中央進行

改革。可惜中央官員一邊話改革開放，一邊對呢啲運動好似好反感咁，唔單止唔讚揚學生們嘅愛國心，仲話佢哋搞事。結果5月28日，老豆帶我去人生第一次遊行，雖然唔係好知咩事，之後老豆見我累，仲帶我搭人生第一次嘅叮叮。嗰時我先知道，原來要出嚟先係表示出對社會關心，先係社會一份子嘅好榜樣。之前嗰晚老豆同姑丈帶我去《民主歌聲獻中華》音樂會，姑姐專登去睇樂隊藍戰士、太極、Beyond，老豆就睇少女歌手周慧敏、梅姐同最欣賞嘅鄧麗君。當年北京政府為咗粉飾太平，高價請鄧麗君上去唱歌，鄧麗君請當時嘅不仁政府食檸檬外，仲喺《民主歌聲獻中華》演出，老豆大讚佢真係女中豪傑，腰骨挺直。6月5日，係我人生第二次參與遊行，全家着晒黑衫黑褲，我見阿爺一路行一路哭，街上全部都係人，大叫：「打倒李鵬！打倒楊尚昆！」有人話好暴力，即刻比阿媽還拖：「夠軍隊對學生開槍咁暴力咩！」當時身邊人話雖然身住香港，但作為中國人，一定要上街反暴政，嗰時我先明白咩叫中國人，第一次真真正正感到自己流住中國人嘅血，感到自己身份係中國人，係龍的傳人，對所有殘害同胞嘅人物權力，都要反抗。

嗰年我住嘅沙田第一城鬧咗一單靈異事件，就係母親偶像之

一，成日俾人叫何B接班人嘅鍾保羅去世。單嘢嚇到我幾日睡不好，而阿媽哭了幾日，因為鍾保羅同曾路得係媽媽最愛嘅DJ，其中一個咁樣走咗，當然傷心啦。唔知1989年係咪傷心嘅一年，當媽打心情好啲，阿嬤偶像任姐又離世，嗰排屋企人日日聽番任白主唱嘅粵曲，不過我只記得其中一首叫《帝女花》：「落街無錢買麵包，靠賒我又怕被人鬧。」(唔知有無記錯歌詞呢？)

1989年對中國人、對龍的傳人，係傷痛嘅一年，但對陳大文來講，係啟發身份認同嘅一年，由透過功夫而認識香港人身份進化到因為關心大陸而認同中國人身份，亦都係開始認識同接觸大陸政府嘅一年。六四慘劇後，好多香港人移民外國，係近年香港第二次嘅移民潮。但老豆話，作為香港人更加要留喺香港，令香港發熱發亮。突然，老豆鬥志重燃，逃離股災陰影，話要為下一代爭取一個美麗社會，要香港人喺香港有話事權。老豆希望香港成為許冠傑首歌《洋紫荊》一樣：

在東方，有粒珍珠閃閃發光，
外地人都嚮往要看看，這獨特社會香港。
在香港，你我的家鄉香港，

艷麗洋紫荊到處盛放，滿眼盡是好風光。

為未來香港，抱着希望，共謀方法，使它永安，

路仍康莊，那有驚惶，望齊心一致，再破萬重浪。

姑姐話六四事件前，佢唔多留意新聞，唔點睇報紙，因為太多字；反而睇漫畫就多，例如日漫嘅《亂馬1/2》(話好鍾意入面嘅九能帶刀)、《龍珠》、《相聚一刻》；港漫《李小龍》、《中華英雄》、《醉拳》。但係1989年後，姑姐就日日關心香港同大陸新聞，擔心異見人士會唔會被秋後算賬。城門隧道通車後幾日，政黨香港民主同盟(港同盟)成立，話要喺1991年嘅三級選舉大勝，搞到姑姐都士氣一振，幫番我哋沙田區港同盟候選人之一劉江華，以及田心選區候選人蔡根培做義工。可惜老豆話港同盟入面唔少只係為選舉利益而整合嘅人，唔少唔係真正嘅民主擁護者，日後必定四分五裂或言行有變。依家回味當年老豆嘅說話，覺得老豆簡直係先知。同年我跟姑姐同老豆去六四燭光晚會，之後又去抗議日本人侵佔釣魚台集會，令中國人身份、炎黃子孫身份更強烈。

因為香港人當年嘅堅持、對公義嘅執着，唔會因為驚而自私自利唔去發聲，連台灣人都讚頌，羅大佑將名曲《東方之珠》重新填詞：

小河彎彎向南流，

流到香江去看一看，

東方之珠我的愛人，

妳的風采是否浪漫依然。

讓海風吹拂了五千年，

每一滴淚珠彷彿都說出妳的尊嚴。

讓海潮伴我來保佑妳，

請別忘記我永遠不變黃色的臉。

1991年，英國政府同中共政府達成新機場計劃後，股市樓市一片向好，老豆好似火鳳凰重生，身價又上漲起來。不過唔知係咪愛國心自1989年後多咗，賺多咗錢無去買樓，反而捐畀華東水災嘅受難同胞。嗰年姑姐識到佢嘅白馬王子，即係後來嘅姑丈。喺九龍城寨清拆嗰日，呢位以前阿爸喺城寨幫襯做牙醫嘅年輕人識到我姑姐，之後日日朝早八點來接姑姐返工，唱嗰首《每天愛你多一些》，成功攻陷姑姐芳心。

記得我當年出世時係橫風橫雨，喺1993年，同樣橫風橫雨嘅日子，一個香港史上首次出現黑雨警告嘅日子，姑丈姑姐嘅結晶品出

世啦，表弟出世啦。姑丈希望表弟好似港督彭定康咁有智慧、咁有能力，幫佢改名叫李智能。

唔知表弟係咪黑星托世，當年多位巨星逝世，包括名導吳楚帆、歌星陳百強、樂手黃家駒。不過表弟十二歲申請身份證嗰時，剛好轉用智能身份證，自此李智能就取代陳大文成為政府通告入面人名嘅樣辦。咁我就知道，我呢位80年代出世嘅陳大文，被大家叫嘅八十後，終有一日要由90年代出世嘅人接棒，唔知到時人哋會叫佢哋做九十後定係另有新稱呼？不過呢班90年代出世，無經歷六四；面對回歸；面對以前香港人白眼大陸人，叫人地「阿燦」，到後來大陸人白眼番香港人，話無佢哋落嚟買名牌同供應東江水，香港一早玩完，我就知道呢班智能身份證一代，將來係處於港英與中共、本土化與大陸化、向左走定向右走、集體回憶與科技發展嘅夾縫之間生存。

不過都唔係全部唔好嘢，當年都有啲好嘢發生，例如有線電視啟播。不過老豆話，香港聲稱自由市場，有競爭，但點解新電視台要收費而唔係免費？點解聲稱自由經濟嘅香港，咁多行業，例如電台電視，係被大財團壟斷同無競爭？當後來夜晚打開電視，唔係

《城市追擊》就係《今日睇真D》，或者兩個台都係播住《包青天》，我就明無選擇真係好慘。

表弟出世我好開心，表弟一歲生日嗰日帶佢去荔園動物園玩，點知個幾月後，成個動物園關門大吉。我開心，但老豆姑姐就為前景擔心。姑姐狂買嘢使錢，話唔係因為購物心態，而係驚回歸後要被逼唱紅歌、着毛主席裝，會無晒自由，所以要及時行樂，一於學許冠傑首歌《話之你九七》。加上記者席揚入牢，老豆好驚內地政治黑暗喺回歸後會降臨香港，本來想舉家移民，但同一時間叔公回流香港，話大難當頭更應留港建設，成功打消老豆移民念頭，不過就齊齊唱《皇后大道東》，話啲歌詞講中晒佢哋心聲：

皇后大道西又皇后大道東，
皇后大道東轉皇后大道中，
皇后大道東上為何無皇宮，
皇后大道中人民如潮湧。
有個貴族朋友在硬幣背後，
青春不變名字叫做皇后，
每次買賣隨我到處去奔走，

面上沒有表情卻匯聚成就。
知己一聲拜拜遠去這都市，
要靠偉大同志搞搞新意思。
照買照賣樓花處處有單位，
但是旺角可能要換換名字。
這個正義朋友面善又友善，
因此批准馬匹一週跑兩天。
百姓也自然要鬥快過終點，
若做大國公民只須身有錢。
知己一聲拜拜遠去這都市，
要靠偉大同志搞搞新意思。
冷暖氣候同樣影響這都市，
但是換季可能靠特異人士。
空即是色，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即是色即是空……
這個漂亮朋友道別亦漂亮，
夜夜電視螢幕繼續舊形象。

到了那日同慶個個要鼓掌，
硬幣上那尊容變烈士銅像。
知己一聲拜拜遠去這都市，
要靠偉大同志搞搞新意思。
會有鐵路城巴也會有的士，
但是路線可能要問問何事。

1995年《蘋果日報》誕生，報界生態大變。1996年李麗珊贏得香港第一面奧運金牌，大家嘅愛香港心、對香港人身份認同又重上新高點，不過望住港英龍獅旗高高升起嗰時，唔知點解個個抱頭大哭，係太開心定唔捨得？

1997年荔園結業，姑丈姑姐同我都好唔捨得大笨象天奴（雖然一早仙遊了）、哈哈鏡，阿爺就話唔捨得當年嘅粵劇場，仲話羅文同梅姐細個都喺嗰度表演。我記得2005年，邱德根有意喺大嶼山重建荔園，點知當時嘅旅遊界議員楊孝華話荔園喺內地同外國都唔屬於名牌而反對。我陳大文真係唔明，呢班人眼中得錢同名牌？唔怪得依家多大陸人來香港買名牌，店鋪可以成隻死狗咁，先出現D&G事件同將軍澳Agnès b餐廳只用簡體字同英文事件啦！咁迪士尼夠

係名牌，最後搞成點？我陳大文就話，呢啲眼中只有錢，而放棄本土化、放棄中華文化嘅商家真係千古罪人。唔怪得天星、皇后碼頭任拆，好多本土意識都因為錢而扭曲，咁樣我哋嘅香港仲算唔算香港呢？唔怪得表弟話，無咗本土特色嘅香港，不如住瓦勞阿圖仲好啦！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了。之後香港就同香港嘅樂壇一樣，一路下滑。樂壇由校長、哥哥、梅姐、羅記嗰時嘅百花齊放到後來四大天王年代，到依家好似得番Eason同Joey，樂壇嘅盛況不斷減弱；而香港則經歷還原惡法、金融風暴、八萬五、二十三條、沙士、人大釋法、天星皇后、高鐵、菜園村、起錨……喺建華八年同蔭權七年，香港好似無咩好嘢發生，真係唔知好似表弟呢班生於夾縫嘅一代會點？依家仲要面對疑似地下黨員治港嘅土共年代，究竟佢哋命運會點？想不了太多，聽番首《命運》算吧：「命運，是否支配一生？」

（本故事純屬虛構，如有雷同實屬巧合）

訪問

小魯、小吳

簡歷

小魯

香港大學國事會成員，1992年在上海出生，2011年8月到香港入讀大學。

小吳

香港大學國事會成員，1992年在北京出生，2011年8月到香港入讀大學。

訪談

筆：你們怎界定自己的身份？

魯：會叫自己中國人，但離開家鄉時會叫自己上海人，在香港多說自己是大陸人，因自己的廣東話不好。不過因國籍和上海出身長大，自自然然叫自己中國人。

吳：身份認同是相同的，不論甚麼籍貫，都是中國人。尤其離開一個地方時，身份認同特別強烈，歸屬感很強。身在內地時，感覺沒那麼強。

筆：你們認為自己愛國嗎？

吳：愛的，雖然在內地跟同學談話時，總會罵中國很多地方不

是，但在外國人面前，卻總會維護中國。

魯：愛國跟愛黨是兩件事情。但要先了解國家的文化傳統歷史，在文化精神上，國家是好的；至於政黨政治那些，就不太好說，因為政府的好壞，每個人的說法也不同，跟愛國不能劃上等號。

筆：人們常說香港是反共基地，你們怎看？

魯：覺得還好，國內尤其是網絡上，私下也有很多反共的說話。當然在香港，反共的說話會直接一點，在國內始終不敢太公開說反共的話。不過發現香港裏面，反共的人多些，很少人支持共產黨。

筆：那麼你們喜不喜歡共產黨的統治？

魯：不算太喜歡，但任何政府有優點，也有缺點，可以理解。相比香港人，自己覺得共產黨沒那麼壞，可能因自己對六四了解不多，始終兩邊對六四的報道也不太一樣。

吳：自己對六四的感受較直接，知道問題出在甚麼地方。

筆：平常有甚麼行為表現出自己熱愛國家和社會？

魯：會專心了解發生的事情、新聞和歷史。

吳：在天災時，對愛國有很強烈的感受，但不會特意作一些很明顯的動作。

筆：唱紅歌、看紅色電影，是否愛國表現？

吳：唱的人、拍的人可能是，但看的人多抱娛樂心態。

魯：有朋友愛黨也愛國，尤其是山東的朋友，每次聽到國歌也會站起來唱。始終在大陸要有好的發展，例如投考公務員與國營機構，要先入黨才有優勢。大陸有兩個必修的政治科，學那些思想修養那些，例如馬列毛思想，但不知道是否真的起到作用，因為自己覺得挺無聊的。

吳：現在網絡很發達，所以那些必修政治科作用不大，大家對商科關注會更大，因為經濟發展吧！

筆：香港和大陸在大學氣氛和政治氣候上有甚麼分別？

魯：分別很大，尤其和清華大學相比，他們的政治氣氛最濃，所以被人說又紅又專。對此感覺不大好，因為大學本應是自由開放的地方，但國內太多大學政治氛圍太濃烈，不能提出太多不同政治觀點。自己來香港大學，就是為了自由，年輕人應多自由思考啊！而香港大學的圖書館很好，有各樣不同的資料。

吳：國內大學氣氛就是這樣，尤其清華大學，因很多將來會當官，學生們也沒得選擇。

魯：不過覺得香港是一個極端，大陸不能說政府壞話，但香港

小魯　　小吳

不會説政府好話。

吳：在香港，有些反對的人只懂説，對實際幫助不大，改變不了甚麼，好像平反六四那些。他們應多點建議。

筆：你們怎看民主、普選那些事？

魯：在大陸是有選舉的，但是有推介名單，不像香港那樣，只是一張空白選票任你填。在大陸，普通人很難左右選舉結果。

吳：在大陸選舉，根本很難知道候選人有甚麼政綱，不及香港那麼透明。其實大陸選舉是執行上出了問題，不透明。

魯：大陸人很多，一人一票不現實，很難宣傳，感覺會挺亂。不過自己也不太了解大陸選舉狀況是甚麼一回事。

筆：現在的中國屬於誰的？

魯：普通人家的孩子在各種方面的機會、資源與待遇也差一點。好像爸爸當官的，兒子便當官。當官的兒子，開車撞了人，通過種種關係，便不會被處分。

吳：中國最好的、最發達的屬於富有一群，最困難的責任屬於平民的，最好的全被富有一群壟斷了。

筆：你們怎看兩地的傳媒？

魯：大陸傳媒也分兩派，像《南方都市報》等，會經常説出中國

有哪裏不好；《人民日報》那些則政治宣傳味重。而香港傳媒言辭較辛辣刻薄，不會給面子的，其實也挺好。

吳：《人民日報》那些像共產黨的發言人。香港的媒體比較商業化，最熱賣的全是娛樂。

筆：你們怎看香港？

魯：香港言論挺自由，不像大陸的網，很多字眼不能發出來。在香港雖然說共產黨好話會給很多人罵，但還是喜歡香港的自由。

吳：香港人會鮮明的表態，但不清楚他們是否真正了解實況。

評論

不只小吳小魯是這樣，筆者不少內地朋友也是這樣，在日常生活中，不多不少對中共統治充滿怨氣，抱有一份埋怨，但和不少香港社運份子所認為，大得有推翻中共的動力與進行萬馬奔騰的茉莉花革命，卻差十萬八千里。香港人雖埋怨政府，但程度未強至要推翻政府不可，所以參與遊行示威的還是少數。可是，當大陸朋友私下談話會大談政府施政不是的時候，他們在外國人、港澳同胞面前，卻每每扮演別的角色，對中共施政也突然寬容起來，處處出口

維護它。原因首先是被中共的「愛國國民教育」潛移默化，把中共等同中國、中共利益等同國民利益，加上在仕途上的政治審核，無形中，不多不少接納了中共就是代表着中國，中共和領導人被說壞話、面子受損，就等於中國人受着外人白眼與屈辱。縱使內地朋友天生的是非判斷觀依稀能令人產生對中共施政的不滿，但無可否認，中共的「愛國國民教育」是成功的，宣傳工作是中共的看家本領。

其次是香港人在很多大陸人心中，和紅鬚綠眼的歐美人一樣，仍被當作外國人看待。這因兩地文化在制度上、信念上、認同普世價值上、教育上與生活方式上等等，還不盡相同。這可以理解到為何中共在回歸後，千方百計要於政策上把兩地同化，使香港易於管理，務求把香港同化成與山東、河北省無異，對中共統治信任貼服。那麼我們就能明白為何中共在香港實行的是「後殖民統治」，香港政府仍是以殖民手法統治人民，只是統治者由英國人換成信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信徒罷了。中共為了同化香港與內地任何一個省市無異，進行「先破後立」，先破壞香港的制度發展，如減慢和推遲香港的民主制度，包括成立臨立會、推翻新九組、成立公司票為主的功能組別來明益大財團、透過人大釋法去削弱司法系統的權威與

權力、還原惡法去削弱公民權利、減弱辦學團體的自主權等等，然後再建立一套有利中共在港統治的制度，使香港更形依靠中共統治及默受中共的治港模式。

另外，為了使香港「追上」內地，中共還推行無形無色無味的殖民政策。除了在人口上「溝淡」土生土長及自幼受西方教育的香港人外，那些自由行、兩地制度同化等政策，也是務使香港「追上」內地。而為了合理化中共蠶食香港文化、歷史、制度的動機，不惜標籤香港為「反共基地」以求出師有名。那麼你就明白，為何愛國愛同胞紀念死難者的六四晚會，會被形容是搞港獨以及作反的活動；為何要求普選會被罵成搞革命搞港獨的惹事生非行為。為了對付香港那些所謂惹事生非的反共行為，中共非蠶食香港固有的制度不可。從軟性角度來看，那些所謂「中港融合」的建議與政策，其實是中共把對西藏、內蒙古、維吾爾等地的殖民伎倆以「經濟」之名，掛羊頭賣狗肉的進行。

小吳小魯對中共有不滿也敢批評，覺得應該嘉許時便嘉許，但從談話中不難發現，她們在評論國內政治生態與中共的時候，以及會談後曾一度考慮拍不拍正面照（對日後返回內地有沒有影響），難免有忌諱，這當然和中共始終有着白色恐怖統治以及言論自由欠缺

保障有關。所以在香港這個相對可以暢所欲言的地方，如果我們，尤其是有識之士，不去講真話、鼓真勁、做實事、收實效，那麼你就是失職和失責。對不公義不發聲與啞巴無異，對不公義不發聲，反之為其塗脂抹粉，就是顛倒黑白喪盡天良。以政治中立為由，不評論強權違反公義的罪行，就是默許罪惡，容忍惡行。

當小魯小吳盛讚香港大學圖書館資料齊全，不像內地的那麼多審查；當她們對國內不怕打壓、敢於發聲的傳媒讚許時，香港有多少傳媒甚至學校及宗教團體卻自我審查、自我閹割，避談強權政府之不義行為以換取到內地宣教機會，把不利政府和中共的言論，為了生計而先自我審查一番，卻忘掉了傳媒人與教育工作者的責任，沒對不公義制度和不平事如實發聲？甚至以政治中立為名去逃避事件！在一個相對自由的空間下，仍然這樣，不禁要問那些自我審查、自我閹割的傳媒人與教育工作者：你們羞愧嗎？

對於來港的內地學生，他們多少也受香港的氣氛影響，但對於沒來港的同胞們，我們可以怎樣向他們宣傳我們所信的一套呢？在網絡時代下，彼此距離近了，我們應多了解他們，透過微博，透過互聯網，相互影響，務求有一天，公義之花會在神州大陸遍地開花。

八十後運動

蔣家健

簡歷

生於1990年，土生土長香港人。

訪談

筆：你會怎界定自己的身份？

蔣：自己在香港出世與長大，和大陸的聯繫不多，會叫自己作香港人。

筆：你對香港的歸屬感好像挺強？

蔣：香港有自己的文化、體制、經濟制度、教育，更有自己的語言，所以歸屬感強。不過自從自由行越來越多，聽到非粵語的情況多了很多，看到不同的文化衝突，開始懷疑自己身處哪裏。

筆：你滿意目前香港的狀況嗎？

蔣：不過不失，但仍有很多要求。例如特首由中央欽點，不是普選出來，故特首做錯事不用對市民負責，只需向中央探路便可。

筆：這是否意味，如果特首是普選出來，你對香港的歸屬感會增加？反之會否減低？

蔣：如果特首是普選出來，一定增加自己對香港的歸屬感。不

過，如果政制倒退，不會減低歸屬感，但會生很多怨氣。

筆：那麼「中國」對於你來說，是些甚麼？

蔣：一個着重錢多於道德、文化的地方。中國處於黨凌駕一切的狀態，文化道德不被重視。而中國還未建立一個良好的制度去保障民生，對人民的訴求不作回應，解決不了很多人民的困境。希望中國早日有民主，會主動回應人民訴求，為人民帶來幸福。

筆：香港也是一個以追求「錢」為尚的社會，你覺得這和大陸有分別嗎？

蔣：香港對自由有一定保障，也保留了很多中國文化、傳統和生活習慣，保留了中國人的特性。相反大陸從文革時起，破壞了很多傳統，對自由又欠缺保障。

筆：對於你來說，現時的香港屬於誰？

蔣：香港雖然有制度，但政府施政不當，監察制度落後，令大地產商、大財團繼續壟斷市場。這使中小企和小市民生存空間狹窄。可是太多人甘願成為大財團的奴才，擦他們的鞋，務求分一杯羹，使情況惡化。

筆：對於你來說，目前中國屬於誰？

蔣：中國現在轉向資本主義，卻造成貧富懸殊，普遍人民生活質素得不到正常的提升，資源被一小部份人壟斷，中國屬於這一小部份人。

筆：你怎看一國兩制？對一國兩制有信心嗎？

蔣：上世紀80年代中央提出一國兩制來穩定香港民心，但現在看來，中國藐視一國兩制的原意，透過不同渠道去矮化香港的國際地位，又設法洗掉港英留下來的文化歷史。所以對一國兩制的發展，感到悲觀。

筆：香港和大陸文化上差別大嗎？差別在哪裏？

蔣：香港受過英國統治，有本身的獨特文化，卻又保留自己的語言和中國傳統，又學習了西方的運作模式。中國和香港不論在制度和生活文化也存在差異，大家應彼此尊重。而香港是中國改革開放、面向世界的榜樣，應繼續保持這角色扮演。

筆：香港有甚麼地方令你最覺得自豪？而中國又有甚麼地方令你覺得自豪？

蔣：香港人的拼搏精神，不論在經濟高潮還是低潮，都保持着，很令人自豪。中國的高科技也令人自豪，可是有人卻利用科技

來造黑心食物害人。

筆：你的偶像是誰？

蔣：我個人沒有所謂的英雄或偶像，因每個人都是獨立個體，不喜歡跟從偶像，正如九十後不是跟從甚麼英雄人物才出來示威，而是為追求更好的未來與制度。

評論

張家健很強調香港的文化歷史，強調香港的制度，強調香港既保留香港文化，又有中國傳統，也吸收了英國文明。這就是香港的歷史，這就是香港的文化特色，是獨一無異的。但我們呢？我們有沒有重視自己的獨特文化？有沒有保護自己的獨有文化？

當大陸在三十多年前進行改革開放，從馬列毛思維走到資本主義，與同樣實踐資本主義的香港，犯上認「錢」為尚的毛病。而當大陸經濟快速發展（當然不要忘記當中的血淚代價、人命代價），香港又回歸了大陸後，在資本主義下，一個以錢以財富量度成敗高低的制度下，較弱的一方必然遭到強勢的一方吞食。這就解釋了為甚麼自由行一通行，內地富戶來港，香港部份商戶放棄了以往的一視同仁標準，或由過往對白種富人卑恭變成對大陸富人卑恭，從D&G事

件、大陸孕婦來港待遇可窺一斑而知全豹。

當然強勢吞食弱勢，有錢的蠶食較窮的，在大家都行資本主義的國度裏，是必然的。但這也因弱勢一方沒去堅持自己，反則為五斗米而折腰，為了錢而出賣自身尊嚴與文化。文化應是互相尊重的，不可因自己較強勢而蠶食較弱的一方，而較弱的一方必須抵抗任何侵蝕自身文化歷史的行為。

香港現正是這樣，不論在政治、經濟、文化，不但沒好好去保護自己，反而為了錢去奉迎。當大家看見那麼多政客不惜出賣香港的司法獨立，出賣由1843年《英皇制誥》已給予的三權分立，出賣了司法機關解釋法律而立法機關製造法律的原則，繞過終審法院而提出人大釋法；當大家看見大商家為了打進內地市場或迎接大陸富貴客人，不惜一改香港待客之道和公平公正原則，這樣抹殺自己文化，實令人心痛。

筆者對大陸政府的後殖民政策是感到憂慮的，因為這樣下去，香港的文化與歷史會破滅。在國內，有大學設立中心去研究台灣的經濟、政治、文化與歷史，台灣學對於大陸乃一獨立學科，可見大陸對台灣的文化歷史政治經濟等種種是相當尊重。相反，大陸沒有大學設專門的中心去研究香港；反之，只把香港放在較低層次的研

究院，還把香港歸納為珠三角與港珠澳的一小部份，而且只研究香港的政治與經濟，對香港的文化和歷史卻不去研究，毫不重視。

可見，如果香港人不去保護自己的文化歷史，內地是不會去理睬你的。這就說明了為何內地的後殖民政策，實質效果除了令商戶收入增加、地產商收多些租，但同時香港的文化與歷史的獨特性卻不斷失去。例如簡體字、殘體字逐步代替繁體字；普通話逐步代替廣東話；內地潛規矩逐步代替香港的文明；香港特色建築不斷拆毀，卻大起一式一樣的商場，連新界綠地也遭殃，為的就是迎接更多從大陸來的客戶；香港特色的村落不斷被剷去，為的就是為建造豪宅或偽豪宅去賺取海外資金與熱錢……這就是我們不去保護自己文化歷史的後果。

香港一早找出東漢文物，唐朝時已在香港建立海軍基地，有獨特的書院私塾，中國廟宇處處。1841年義律侵佔香港，而自1842年羞辱的《南京條約》把香港割讓，把香港定位為與馬六甲等一樣的轉口港及侵佔內陸的橋頭堡開始，香港產生一套中西文化混合的獨有文化。可是我們偏偏為了錢而去賣掉自己文化，賣給文化空洞的中共。

中國本是四大文明古國之一，糅合漢人與蠻夷戎狄的文化，但

從1912年新文化運動、打倒孔家店開始，再到中共立國，一個宣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一個希望自己千秋萬世，不容異己的政府掌政後，不斷摧毀中國的舊有文化，摧毀儒家思想。尤其文革時期，藐視傳統文化，大力批儒批孔到近年的崇英親美，到把舊有的中國文化毀掉，目的是把人民的腦袋洗個空白，以方便管治，使人民較易接受一個千秋萬世的政權的種種宣傳和壓逼。舊有的道德價值觀被破壞殆盡，換來的是空洞的「唯利是圖」主義，只要政權能給你溫飽，能改善你的生活，能改善經濟，縱使行為不道德，對人權民主自由打壓也可接受，使中國進入炫富時代，固有的既得利益者、官二代與富二代能橫行霸道的時代。而那些放在天安門一百天便要搬走的孔子像、孔子和平獎、孔子學院等所謂儒家標誌，淪落為宣傳工具而已。難怪錢穆、唐君毅、牟宗三等文人會提出「反共救國」及1949年後，中國進入新黑暗時代。

在現今普遍教育水平不高、道德教育缺乏，一個「唯利是圖」、只求溫飽的社會，的確是暗黑無光。自從儒家道德被馬列毛思維代替後，所謂整體利益要置於個人利益之上，將把持權勢搜刮利益合理合法化，把中共利益等同整體利益，把西方相信公民社會的一套

換成相信中共政權的一套後，的確瘡痍滿目。道德是上行下效的，有怎樣的政府、怎樣的教育，就有怎樣的官員和人民。政府貪官滿堂，潛規則取代正道，貪腐人脈走捷徑成為習慣，國家自然走向腐敗。可是在香港，一些政客與高官為了討好阿爺，為了討好權貴，不敢得罪強權，不但二十多年前後對六四的態度有一百八十度轉變，更是唯命是從。這種禍國殃民的政客高官們卻聲稱愛國愛港愛民，你說諷刺不？

當改革開放，讓少數人先富起來，就是希望他們富起來，建立小康家庭後，把人力、金錢、資源、技術去造福還是貧窮的國民，使大家一起富起來，建立小康社會。可是那些先富起來的一羣，卻過份保護利益，不欲把利益投放給還是貧窮的同胞，於是在制度和稅制上下手腳，破壞改革的原意，例如基層交稅的比率遠超中產、大眾稅（間接稅）佔稅額的七成、沒有富人稅、故意拖延政治改革等，因而令百分之一人口掌握全國超過四成的財富；一成人口掌約九成財富。改革開放令經濟加速發展並保持上升，同時確保職位增長，但卻欠缺公平分配，令貧富差距更大。

黃之鋒

簡歷

生於1996年，學民思潮召集人，反對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召集人。

訪談

筆：你會怎樣界定自己的身份？

黃：這問題很難答。首先覺得香港人和中國香港人身份並非如外界認為那樣有衝突的。自己生於香港，土生土長，對香港充滿感情，很自然回答自己是香港人。正如北京人會回答自己是北京人那樣。可是每當看到六四的新聞，便感到對自己有切身關係，所以同時會答自己是中國人。

筆：那麼你第一次感到自己的中國人身份是甚麼時候？

黃：就是小朋友時第一次看到有關六四的片段時。

筆：那麼你認為自己愛國嗎？

黃：愛，當然愛國。愛國即關心祖國事情，如果對祖國的事情也不了解，那就難以去愛。只要關注祖國的事情便是愛了，不用以政治立場來區分愛不愛國。我自己不斷嘗試了解國家與自己的關係，因為生活、國家、人生目標是互動的關係。

例如自己於2010年參加六四晚會以及組織學民思潮去反對表面

是教人愛國，但洗腦為實的國民教育等行為，都是嘗試了解祖國的表現。而看書去了解不同事物及培養思想訓練，也是嘗試了解祖國的表現。

筆：那麼你愛港嗎？

黃：愛。和愛國一樣，只是把祖國變成香港而已。當見到好的便要欣賞，見到不好的便要嘗試改變它，使其向好的一面發展。例如從政、上街發聲等行為，就是嘗試把事物事情變得更好。所以大家不要政治冷感，因為政治關乎國家，要了解政治，不要「去政治化」，不要迴避政治議題。

筆：在政治層面上，人們常把自己劃成左中右派，那麼你認為自己屬於哪派？

黃：在習慣上，左派等於親中共，等同親近極權政府。但是對於民主派，習慣上不會用右派來形容，因為外國多以經濟思維分左右。因此在政治上，左是靠近極權，右是靠近自由開放。

我自己在政治立場上偏向右派，偏向自由開放；但經濟層面上偏向左派，偏向基層勞工。或者界定為中間偏左更貼切，因為在經濟層面上，香港政府偏右很久了，令香港變成極右社會，所以自己

會中間偏左，支持最低工資和反對財團壟斷。但自己不是很左，因為社會主義難在香港推動。

筆：那麼你怎看現在的中國？

黃：中國乃祖國。現在中國多只關注對政治、經濟的發展。

先不討論道德問題和剝削勞工那些，單以金錢來計，中國的經濟是有成績的。現在中國像起飛時的香港一樣，經濟發展迅速，但人的本質及道德水平卻很低。而且賺了錢不等於分配均衡，不等於人民享福。經濟雖然繁榮，但分配卻不均衡，資源被少數人壟斷，有一半人民吃不飽。而且凡事講錢，道德水平卻很低，例如小學生選班長，也要賄賂老師、擺酒席拉票。

筆：那麼目前中國最需要做些甚麼？

黃：中國社會要培養公民價值，要重視何謂「人」。在發展經濟與政治同時，要注入「人」的價值，不要只是向錢看。當有了「人」的價值教育，才不會再出現毒奶粉、黑心食物那些事情。在政制方面，太多人把民主定義為普選，卻忽略了公民參與、公民質素也和民主有關。中國要有普選，但更重要是進行公民教育去提升公民價值。最重要是領導人常說要推動民主改革，不要再只講不做。中國

務必加強法律，提高對自由的保障。

筆：在你心中，如何定義「中國」?「中國」是屬於誰的？

黃：有人說中國是「中華民國」，有人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父是孫中山，但天安門掛的卻是毛澤東頭像。現在中國屬於中國共產黨，因為沒有政黨輪替，人民不能選擇。所以現在的中國和中共是分不開的，這樣對人民很不公平。香港人較分得清楚，較能分清國家與執政黨的分別。例如汶川地震、六四，都體現香港人的愛國，但不等於我們連中共也愛。

筆：你認為今天的香港，是屬於誰的？

黃：現在的香港一半屬於人民、一半屬於特權階級。香港特首乃小圈子選出來，市民參與不大，又沒有政黨輪替，太過中央集權，透明度低。香港要建立社區民主，要提升公民權利，不要再像殖民地時代那樣，凡事去政治化，減弱人民的歸屬感。而一些立場常變，例如對六四立場常變的政黨，我們不要支持，它們並不可靠。

筆：誰是你的偶像？

黃：父親吧!父親教自己為何基督徒也要上街，因為宗教信仰是堅持對公義的執着。自己也因而開始了解內地，了解內地怎對不同的宗教進行封殺。

評論

當不少政客為了前途，為了錢途，為了得到權貴庇祐，為了得到長期掌政的中共政府看顧，不惜混淆愛國與愛黨，不惜把擁護中共等同擁護人民，不惜把稍有質疑中共政權的便打成叛國與分裂國家份子；但年紀輕輕的黃之鋒已能分清是非黑白，清楚知道愛國不等於愛黨。

國家從來不屬於任何政權政黨政客甚至特定族群，國家乃屬於領土上的人民的。統治國家應以民為本，當人民有權自由選擇誰代表自己去管理社會、人民的權利受到充份保障，國家才算屬於人民的。目前的香港、目前的中國是否屬於人民，相信大家很清楚。當香港人的公民權利、政治權利得不到充份保障；當香港人不能自由選擇誰去代表自己管理社會，香港還算屬於香港人的嗎？

1991年，立法局通過《人權法案條例》，把保障人權自由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廢除過時與侵害人民權利的《公安條例》，但回歸後，不是民選出來、建制派當道的臨時立法會卻還原《公安條例》(俗稱還原惡法)，還以牴觸《基本法》為由，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第二條第三段、第三條

與第四條廢除，令到很多原本受保障的人權不再受保障！那麼是誰破壞香港領土的主體性？是誰把人民作為主體的定義破壞？可笑的是，中國身為聯合國成員之一，國際公約是行於任何國家法律之前，國際公約是比《基本法》先行，但一些政客為了討好中共政府，還原惡法，把國際公約置於《基本法》之下，他們算是真心為民嗎？

黃之鋒對國情的探求、對六四的執着，都是愛國表現。那些對六四立場二十多年來，隨風轉舵，對犯下罪過的當權者隨聲附和的政客，彷彿已對當年的事情、當年的自己熟視無睹，每當別人問起對六四看法時，不是支吾以對便是說自己所謂的愛國愛港之心不變，相比黃之鋒，愛國對於那些政客來說，只是遞交給中共CV中的一項欄目，而非發自內心的感情。愛國對於他們來說是討好極權政府的工具，而非純真的感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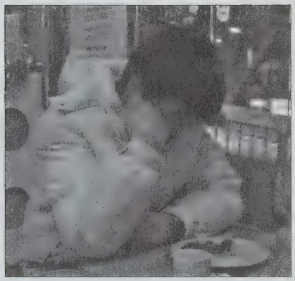
對於某些政客來說，愛國行為便是配合中共的經濟政策，想盡辦法令國家賺錢，把帳目做得漂亮。而一旦有人提出分配公義問題，提出職業道德問題，提出發展同時要保障人民權利等問題時，一切阻慢賺錢程度、阻慢發展速度，間接使帳目變得不好看，便是搞搞震，便是不愛國，甚至蓋上搞港獨之名。在把錢看作一切、時刻想分杯羹的政客充斥社會下，黃之鋒能保有愛國愛民之觀念，是

難得的。

值得嘉許的是黃之鋒知道，民主並不等同普選，民主其實還包括自由法治人權，包括對公民權利的保障，包括對公共空間的保護（一個讓人民充份發表言論、集會、表達、示威自由的空間）。可是當一些所謂民主派政客，說甚麼民主會選出希特拉，只關心選舉模式，不禁令人搖頭歎息。

黃之鋒組織學民思潮，反對有政治陰謀的國民教育，是明白到國民教育根本不能增加人民對國家的感情。不要說甚麼甚麼民主國家也要國民教育，首先，香港並不是民主之地，而且愛國情感是由內而外，不能由外強加到內。再者，國民教育對於一些政客來說，只是「殖民化」工具，為一個不義政權去塗脂抹粉，和港英時代的「順民教育」無異，慢慢透過教育去蠶食人民的獨立思維，經年累月下，變成「良民」，變成易於管治及政治冷感的生物，對不公義不反抗，反而多多包容，只求溫飽和經濟發達，甚至在溫飽和公義之間二選一。可惜的是，頭腦清醒的，又有多少個？

陳當勞



簡歷

生於1997年，十三歲時已開始活躍於社運界，社民連成員。

訪談

筆：你怎界定自己的身份？

陳：我會界定自己是中國人，但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並不代表中國，因為其貪腐，又非民選；在文化方面更破壞中國文化，自己宗族的祠堂就是在文革時被破壞。不過「香港人」這三個字是一個稱呼，談不上身份認同。

筆：那麼你愛國嗎？

陳：愛，我愛中國文化，對中國歷史、建築、文化等很感興趣。而自己生於中國，很希望中國人民能活得好。

筆：在左中右的光譜內，你會怎界定自己的定位？

陳：我認為自己是左派，因為信奉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在資本主義下，工資永遠反映不到勞動應有的重要性與辛勞。勞工可以沒有資本家而自己組織起來，但資本家不能沒有勞工而自己包辦生產，所以我自己信左的一套。我希望經濟制度是平衡的，而非由一

小部份人壟斷，然後他們去風流快活，但低下階層卻生活慘苦。

筆：你認為現在的香港是屬於誰的？

陳：香港現在由極度右傾的人統治着，造成社會利益由一小部份人壟斷，很多商舖被地產霸權欺負，社會貧富懸殊，香港人無時無刻不被逼向地產商奉獻着血汗，例如管理費不是交給領匯就是長實。

筆：你怎看一國兩制這回事？你信任這制度嗎？

陳：雖然的確確立了兩制，但背後卻被一個大勢力操控着。一國兩制下，表面香港人是有話事權，實際上不是。例如政改，背後由中聯辦操控着。一國兩制是獨裁者為應付香港市民而推出的一個不公義制度。

筆：那你認為香港現在需要些甚麼？

陳：在我個人立場，香港需要一場革命去推翻獨裁政權，縱使有流血的可能性。因為推翻獨裁政權，人民才能真正自決，人民才能生活得好。

筆：你的偶像是誰？

陳：我沒有偶像，因為人無完人。沒有一個人說話以及做的事是完全對的。一個人無論曾經得到多少人認同，也總有出錯的一天。如果有偶像，就變成對一個人盲目跟從了。

評論

陳當勞很明顯是一位很有自信、相信左翼思想的少年理論者，在這個政治冷感、讀書風氣不盛行的時代，的確難得。他有一份愛民之心，希望人民能得到溫飽，而且追求的不單是體能上與生理上的溫飽，還在精神上的溫飽。

精神上的溫飽就是思想、行動都可自由自在，當然大前提是不能破壞別人的自由，因為自由與責任是雙胞胎來的。當人權、發聲自由、言論自由被充份保障下，精神上才有條件得到溫飽。當社會上，公共空間得到保護，才能提供讓人民精神溫飽的條件。公共空間就是人人也可在這地方上發揮應有的自由，在同一空間或地方上充滿言論、集會的自由。

在陳當勞的角度，現在香港行得太右，對積極不干預政策抱懷疑態度，認為這樣會令既得利益一群更易壟斷社會的財產與機會，令人民難得溫飽。而筆者認為，政治制度上的重大缺憾，是造成人民不論在生理上，還是心理精神上，也難得溫飽的主因。相信對於不滿獨裁統治的陳當勞來說，他也會認同。當政府不是由人民授權，而是由一個強大之手，一個擁有軍政經大權的集團欽點和授權的，此政府必然也必需向那強權負責。尤其立法會大部份功能組別

由強權那方面控制，而在分組點票下，那班功能組別議員有着生殺大權。可是現實上，由於制度設計，絕大部份的功能組別議席受強權支配左右，那麼變相政府也要依靠功能組別支持，依靠背後的強權，表面上美其名叫精英統治，實際是強權掌握一切。

當政府不是民選出來，不必向人民負責之餘，由於特首由小圈子選出來，而小圈子由強權和大財團組成，政府必須先向強權和大財團們負責。縱使官員們有良心，想先向人民負責，制度上的設計卻不容許他們這樣做，所以長毛梁國雄曾說，不論誰當上小圈子選舉選出來的領導人，不管怎樣，也必然走向無恥，因這是制度使然。而曾蔭權是一好例子，任特首前和後有多大的分別！由於不敢得罪容許他上台的地產商，縱使他自己知道社會上要求復建居屋，也不敢為，到最後一年掌政才敢復建少許而已。

小圈子選舉出來的特首必以強權和大財團利益為先，所以才出現明目張膽的官商勾結生態。你看特首選舉，候選人想當選，必要拉攏大財團，和它們談好利益分配協議與計劃書，所以某某得到四大地產商支持便十拿九穩；某某則靠攏二線大地產商，合謀取四大而代之，但最後也需和大地產商商量好才能上位。在這制度下，小市民怎不被剝削？怎會得到真正溫飽？沒有人民授權的政府，是真

心為民的微乎其微，因人民要得到保障，靠的是制度而非人治。

一個健康文明的社會，管治靠的是制度，靠的是由外而內的監察與監督。政府提出政策，反對派與傳媒找出當中的錯處與不足，然後透過於議會內、示威集會遊行等，把意見和聲音發出，在足夠的途徑下讓政府聽到意見，政府因此知道自己及政策的不足，再提出修改與進步。所以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示威自由、公平而民主的選舉是必須的，因為這才可確保民間的聲音、反對派的聲音、傳媒的觀點能清楚發出，政府和公眾才能知道是甚麼一回事。

當市民認為政府做得不夠與不好，可在下次選舉中，投票表達不滿（反之，如果認為政府做得足夠或可接受，可透過選舉投下信任支持一票），但香港沒有政黨法，政府沒連續性，市民不能透過區議會選舉、立法會選舉等對政府投下不滿以及要求變改的一票。而且，不論香港或是大陸，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示威自由不但保障不足，還在退步之中，示威者被打壓，反對派不被包容，傳媒被「河蟹」，又沒有民主選舉讓市民選擇管治者的變更；香港和大陸只能靠人治，只能靠政府自己發現有錯誤自我修改，而非由人民、反對派與傳媒提醒，只靠由內而外的進步，於是便出現像毛澤東、董

建華、曾蔭權管治的亂象。

回歸前，香港人並非當家作主，公共空間不完整，民主自由保障不足；楊慕琦計劃胎死腹中、《麥建時報告書》隔靴騷癢、彭定康政改來得太遲，港英時代香港人自由人權保障進步得太慢。可是，回歸後，香港人當家作主了，在公共空間上，在自由人權的保障上，卻不進反退。2011年李克強訪港，市民穿六四T恤被或許是秘密警察或國安或神秘黑衣人強行帶走、記者採訪被警察公然阻止，發生國際笑話的「黑影事件」、政府發出新聞稿代替讓記者採訪；2012年3月16日特首候選人選舉論壇，有記者在完全沒阻礙任何人情況下拍攝外面示威情況，被警察公然推撞和阻止採訪甚至拘捕；有市民與大學生到帶有預設立場、在科學館舉行的替補方案公眾諮詢會，因不滿政府先定立場、扮作諮詢而入場內示威，在沒有毀壞任何物件下被控刑事毀壞罪成；只是拿着咪高峰說了幾句話，被控在公眾集會中擾亂秩序罪成；示威遊行被捕者不斷增加等等。以上種種都是倒退的例子。

有人說反對聲音要包容，要互相尊重，但實情是自己與大家的權利被剝削及不被保障，於是作出反抗，反被政治檢控。要包容，永遠不是被侵害的弱勢包容強權，而應該是有權有勢有保安工具有

警察的強權去包容反抗行為與反對聲音。強權要求反抗者反過去先包容強權的行為，是本末倒置。

陳當勞不像大多數香港人，他對一國兩制抱有懷疑態度，甚至可算是否定態度。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一國兩制是誰定的？定立期間，港人有權發聲以及被諮詢嗎？一國兩制由中共政府定立，但中共多次不守承諾的表現，令人對此制度抱有懷疑是合情合理。在《中英聯合聲明》的七份外交密函及當年的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主任姬鵬飛的說話都指，中共政府表明2007年後，如果香港人希望實行雙普選，乃香港內政，中共不會干預（一開始是定在2011年後，但經1988年焚燒《基本法》的抗爭，中共讓步到2007年）；可是回歸後，當支持07/08雙普選的聲音佔多數時，卻被中共以人大釋法來否決，被中共干預了，到後來爭取2012雙普選，又被中共干預否定；加上懷疑乃地下共產黨員的人公然被委任為行政會議成員多年及參選特首（當中共等同政府、等同中國時，如果由共產黨員治港，那便是中共政府統治香港，而非高度自治），還有中共多次推翻承諾，大家對其設立的一國兩制抱有懷疑是正常的。

V煞仔

簡歷

生於1991年，土生土長的香港人。

訪談

筆：你怎界定自己的身份？

V：當然是香港人，生於斯長於斯，歸屬感強。或喜歡別人叫自己做「高登仔」，而非被人標籤為偏激與衝動的一群。

筆：你怎看現在的香港？

V：香港年年在改變，年年在被大陸同化中，已經不是以前認識的香港。不論在社會或個人或經濟，大家只重視個人利益，人際間變得陌生。

筆：你有沒有嘗試改變社會現狀？

V：趁自己還沒被時間及生活壓逼，會多做有意義的事，例如參與社運，希望社會有改變。但很多時社運被傳媒扭曲與斷章取義，被描繪成暴力和搞事。

筆：你參與社會有甚麼成果做到？或目前有沒有成績？

V：在社會處於弱勢下，暫時未改變到社會，但改變了自己。自己思想變得更見批判和多聽不同聲音。雖然社會大多數人對政治

冷漠，但自己不會放棄。

筆：你以V煞仔的形象參與社運，務求改變社會與政府。為何你會選擇以V煞形象出現？

V：我很慶幸生於資訊發達的年代，以及在討論區與不同人論政。自己因發現為何民建聯那麼多人討厭，為何民建聯做着那麼多討人厭的事而開始關心政治。

我在2011年的六四晚會開始參與社運，在同年七一開始接觸V煞一群，發現大家理念相似，望行革命路線，也同時希望香港變回一個屬於大家的地方，而非只屬於擁有特權的一群。理想的香港是一個屬於市民、真正港人治港，以及擁有一個屬於人民與聽人民意見的政府。

筆：那麼你覺得自己愛國嗎？

V：我愛國但不愛黨。我愛這地方、這裏的文化。自己是炎黃子孫，但中國被中共統治下，找不到歸屬感，因為上至政府，下至市民，都失去了自己的文化底蘊。

筆：你怎看現在的大陸？

V：現在的大陸比香港更冷漠，可能與消息被壓制得太緊要有關，可惜大陸同胞活在一個連知道真相的權利也沒有的國度。中共

政府作了很多不公義的事，很想推翻它，希望恢復真正的中國。香港也有類似情況，走向極權。

大陸屬於中共的，靠一個大話蓋過一個大話去控制市民，人命不被重視，領導人是生是死也不知。

筆：你怎看一國兩制？

V：一國兩制是一個假承諾，是一個安撫香港人的甜言蜜語。香港靠《基本法》做事，但《基本法》制肘了很多市民應有的權利。

筆：你有沒有偶像？

V：我的偶像是一班肯為自己爭取的市民，為理念而爭取，為自己爭取而不用活在陰謀下。

評論

V煞仔提到對大陸同化香港的憂慮，作為香港人的我們，不禁會問，這有甚麼不好？或認為這是很正常不過的事，因大家都是華夏民族。首先，大陸同化是否等於民族文化同化？現在的所謂同化，只是中共同化，在制度上、在人權自由上、在經濟上的同化，而非中華民族文化的同化。這也是因建國後，中華文化的保存進入

一個艱難期，更遑論發揚之。所以這才出現有香港人抗拒所謂的兩地同化，因此舉不但保存不了中華文化，反令到香港的獨特文化受到破壞。

香港曾經是殖民地，雖是不幸，但確令香港變成中華文化加西方文化的混合體。加上人民的反抗爭取的成果（包括多次公民抗命、反英鬥爭），港英政府參考英國政制與管治政策，香港除了文化上乃中西混集外，經濟金融制度也貌似西方的，言論自由與人權相對大陸較有保障，教育普及，大量人才出現，官員相對清廉（當然指麥理浩時代打後的香港）；香港不論在當年改革開放、經濟金融以及人民幣面向世界，都作為中國大陸的參考，作為先行者示範的作用，所以香港需要的是保持其獨特性，而非被同化。

當大陸參考了香港的制度作改革開放，經濟發展突飛猛進，人才方面又培訓出任志剛與陳馮富珍等國際領袖；現可於政制上、制度上、加上言論自由配合教育普及下，讓學識與言論混合一起而令社會進步等等，都是大陸的參考。當然，這也必須有賴香港不斷求進步，參考價值與作用才越大。但在同化下，香港在清廉、政制、制度、自由保障、教育獨立、司法等方面竟不進反退，才出現有港人提出反抗同化論。陳雲的城邦自治學說，很大程度也建基於此。

這因為文化愛好者會抗拒破壞中華文化政權作出的同化。

V煞仔透過參與社運，期望香港有改變。社運人士就是找出政府施政不足，找出制度缺憾，然後透過社運提出改變之聲。可是透過小圈子選出來的政府，根本不用面對人民，如果掌政者乃一心胸狹窄、面黑小氣之徒，會覺得人民透過社運、透過示威遊行，而非私下提出不滿與改變，會令到自己顏面無存，因而打壓社運（相信大家可以理解為何近來對社運的打壓多了強了），甚至透過河蟹傳媒和公關手段，標籤社運為暴力、搞事、非理性、不禮貌、激進等負面形象，務求令市民對社運份子產生負面印象、討厭社運份子、忽視社運人士的訴求，更不理會訴求是否合理。政府打壓抹黑社運人士，除了為自己施政不足和制度缺漏等去轉移視線，也是抹去改進的動力。可憐很多人只懂指責被醜化了的社運人士，只會說議會抗爭是搞事與教壞細路，只會說街頭抗爭是不理性與暴力，卻沒去反抗制度的缺憾與政府施政的流弊。但在強權不斷打壓抹黑、市民不諒解與對政治冷感；身陷難關又難取得成績下，還有人堅持社運，是值得尊敬的。

V煞仔指出香港和大陸都是屬於擁有特權的一群，即強權與地產霸權一群。更令人搖頭的是，一班利慾薰心之徒，希望從滴漏效

應而瓜分人民成果，不惜甘作趨炎附勢的政客或服務特權階級，再配合河蟹傳媒與政治制度偏頗他們，令社會不斷被特權階級和其爪牙侵蝕。所以不論香港或大陸，面對的不是經濟發展快慢、大小的問題，而是分配是否公平的問題。可是制度缺憾造成官商同體，一起壟斷經濟成果與剝削人民勞動成果。所以如果想社會不再屬於特權階級，要靠建立民主政制、司法完善獨立、人權自由被肯定，如此才可免於人民財產再被官商同體搶去。

V煞仔除了對由中共設計的一國兩制不信任外，也對《基本法》不信任，而這是很多香港人忽略的。當年起草《基本法》的五十九位委員，其中三十六位代表大陸，二十三位代表香港，究竟他們能否真正反映港人意見？能否真正顧及香港利益？可是多年來，甚少人對此有質疑，但從多次人大釋法事件、二十三條事件等，不禁令人質疑，所以有人否定《基本法》，也是正常之事。

筆者更對港人治港有質疑，因港人治港應是由信奉普世價值、能釐清和保護香港價值（包括自由、人權、公民權、民主等信念），而非只擁有三粒星身份證，但沒香港價值信念的人治港。

黃　進

簡歷

生於1993年的香港人，最後一屆中七學生。

訪談

筆：你怎界定自己的身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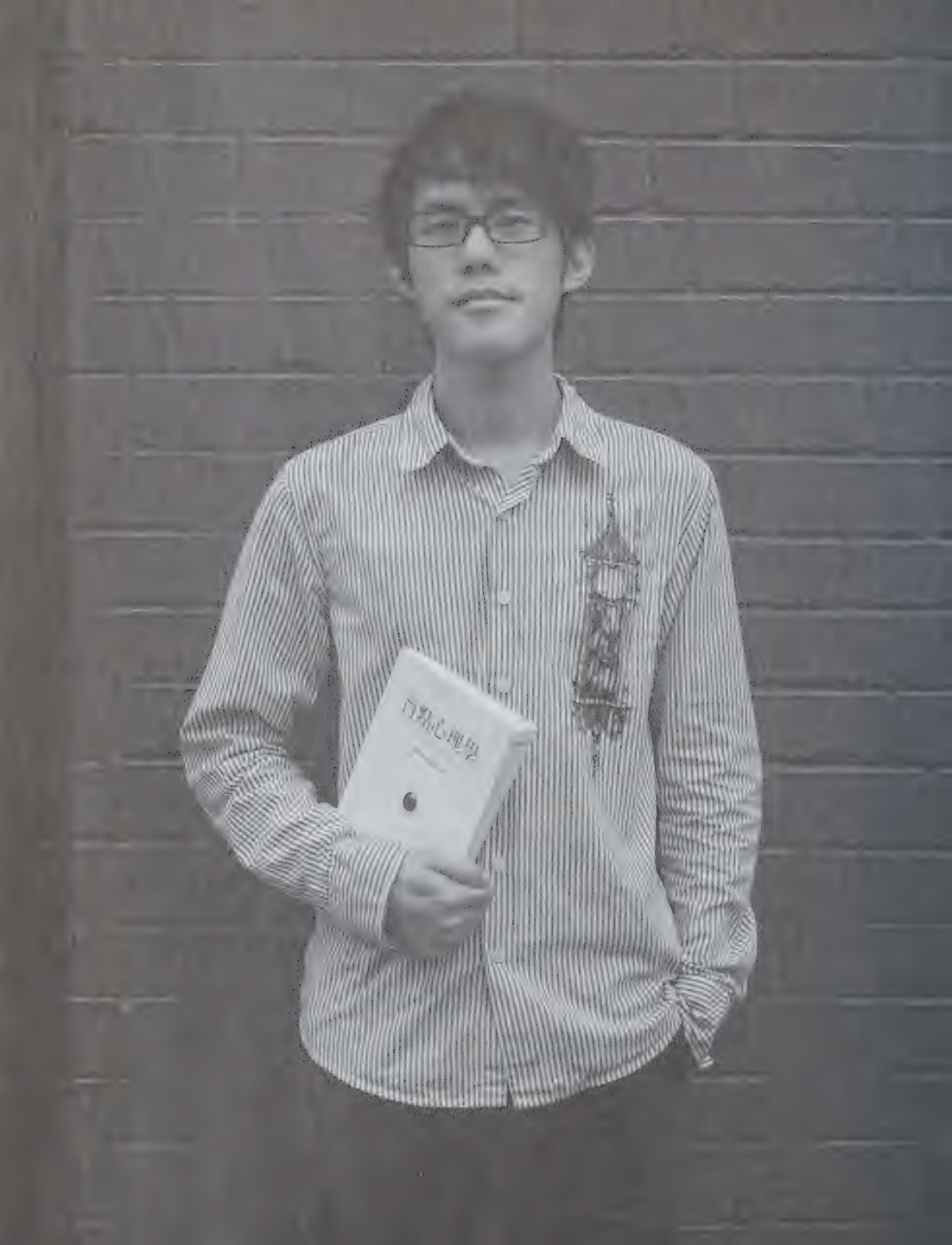
黃：我會說自己是人，因為世界大同，不會說中國人那麼狹隘。除了血緣外，不論制度和文化，與內地很大不同，加上看見專制的中共打壓自由、逼害人民，對此不感自豪。理想是消除國界，共同建立一個民主制度。

筆：那你怎看愛國或對中國人身份感自豪的人？

黃：愛國的人分兩類的，一種是又愛國又支持中共，另一種是愛國但不支持中共。我認為真正愛國的人，根本不可能支持中共，他們是愛黨多於愛國。

筆：你怎看現在的香港？

黃：很多上一代人從內地來港，對民主、人權、自由認識不多；而新一代的地道香港人，追求民主、人權、自由的又不多。自回歸以來，香港的自由、民主、人權在倒退，可是竟然那麼少人關心。以前是溫水煮蛙，現在已是滾水煮蛙了，立法會在保皇派護航



下否決支持新聞自由章程、港台被政府牽制、替補機制的假諮詢事件，可見香港已一步一步倒退。

筆：那你認為香港怎樣才可得救？

黃：長遠要從教育做起，不要所謂的國民教育，要公民教育。短期可以有激烈抗爭，如包圍立法會去喚醒市民，讓人們接觸抗爭者的訴求。

筆：那你愛港嗎？

黃：我都是以世界公民身份看世界，支持整個地球的民主運動，不會優先看待任何地區或國家。自由民主乃普世價值，要為此打破民族界限。

筆：那你怎看中國人？

黃：自己把中國人分為三種。第一種是自私的，他們只顧自己；第二種是有私的，只愛自己的同胞、國家、城市；第三種是無私的，愛全世界。中國人大部份是頭兩種，但西方人則第三種較多。這是因中國幾千年來的教育都沒有教「無私」概念，也因經濟狀況不佳，會先求溫飽，不會理會甚麼叫無私。香港也是經濟起步後才注意普世價值。我體諒中國人狀況，但不代表認同。

筆：那麼你認為人民在中國裏有甚麼地位？

黃：人民在中國從來是不值錢的一群，人命不受重視，你死你事，我活我的，國家沒有人權的意識。但隨着互聯網發展，人民開始接觸到「人權」這兩字，開始懂得爭取權益。當人命被看為最重要的事，那個國家才稱得上有文明。

筆：你怎看一國兩制？

黃：一國兩制是必須的，但明顯內地未銜接到香港。香港制度比內地文明，最少有表面的法治與民主，自由、人權即使在倒退中，也比內地好。所以應是內地跟隨香港才能進步。

筆：你覺得香港屬於誰的？

黃：政治方面，由於政府不是普選出來，只能聽中央話，因此是中央的。但整體上看，香港屬於李嘉誠為首的大財團，香港市民生活每部份都被財團壟斷，市民選擇權被剝削，美國也是這樣。

筆：中國則屬於誰？

黃：中國屬於專制統治的中共，而西方屬於大家族的。自己很矛盾，如果強勢政府現在落台，會讓西方有機可乘，入侵經濟。

筆：你有沒有偶像？

黃：自己不會崇拜任何人，這不是民主，因民主是獨立精神。民主會支持人，但不會崇拜，因崇拜會使權力膨漲，人民變得盲目。

評論

黃進是少數以世界大同、以地球村身份看自己的人。他宏觀地看自己和世界，脱離民族主義的枷鎖，認為民主是任何民族、任何地方都需要的。

黃進看不過以愛國愛黨或愛黨為實、愛國為名之徒。愛國，支持自己民族在中國是普遍的，至於為何有人會愛黨？筆者見解，對很多人來說，表明愛黨或以行動證明愛黨，是一種手段多於心態。因愛黨可為其仕途、收入帶來利益。

愛黨不要緊，誰人不關心自己的利益？但如果因為利益、因為愛黨，而對黨政府內的腐敗行為默不作聲，同時打壓異見，只懂說「明天會更好」，那麼那些人肯定不愛民。當我們談愛國時，不應忽略了愛民，因國家的根本是人民，人民活得不好，人民不被尊重，國家會興盛和平嗎？

黃進談到香港人很政治冷感，對身邊事關心不多。這因資本主

義一切乃以金錢為量度單位，在資本主義的國度，人民必關心錢為先，當關心錢也不夠時間，自然無暇關心政治與身邊的事。加上殖民港英政府和後殖民特區政府，因先天不足，沒民意授權，不敢大力推行公民教育與政治教育，以防人民質疑政權，不接受無民意授權的政府統治。所以不論前後殖民政府，為求人民少關心錢以外的事，皆行愚民教育與順民政策，不談政治，只談經濟；不談公義，只談利益；不談時政，只談風月；不談出聲反抗，只談默默耕耘。難怪黃進說，長遠來說，要修正教育方向，才能啟迪民智。

黃進對現在香港的狀況已近絕望，表明感到回歸後，原本不是很強的自由、民主、人權不斷在倒退中。由路祥安、鄭耀宗干預港大民調開始，至近年吳志森、成名、鍾庭耀因文章與取態不合聖意，被中共發動傳媒攻勢，以數十文章大力鞭撻之，雖則言論自由下，以文以理說人乃正常之事，可是內裏不少是抹黑、大扣港獨造反帽子，這才叫人心寒，而以文維生之士，淪落做政治打手，情何以堪，這根本和中共一向對付異己的手法一脈相承。

先從異己的文章、言行，盡量找出錯處，抓出人家的小辮子，然後就說他錯誤，再否定他的一切。例如艾未未因不聽話，便說他

裸體藝術不雅，甚至逃稅，再否定他的一切政治主張；又如趙連海，說他在法院外示威乃激進行為，從而否定他為結石寶寶討回公道的行為。中共一貫方法是異己只要有一點錯，便整個人也是錯。

五區公投後，政府為報復，不惜在無諮詢下推出替補機制，一個引發十多萬人上街的敗政。到後來政府因民意反彈才進行諮詢，但公眾諮詢又不夠公開透明，故被質疑安排大比數支持政府意見的市民進諮詢會現場，非真誠諮詢與聽不同聲音，引起一班市民反抗，那班無法進入會場的市民為了堅持為無聲者發聲與揭破政府無心諮詢，不惜衝入場內發言，令林瑞麟落荒而逃。事後有五名示威者被檢控，包括當天被人叉頸以武力對待的長毛梁國雄、只是拿着咪發言的文化人黃洋達（持票入場，在台上拿着咪高峰發言而已），兩位只是走在人堆中進場的大學生與一位中年社民連成員，最後被判入獄兩個月及三星期，開白色恐怖之風，創近年政治打壓高峰。這樣不但顯示自由、人權倒退，連司法也倒退，開始淪為工具，實令香港蒙羞。若把此案和Amina案、胡仙案、畢架山一號富婆毆打印傭案相比，就明白今次是政治打壓了。

大家意見可以不同，但強權政府對不同意見的處理手法必須公

平，給與的機會要平等，不侵蝕異見聲音，那麼不同聲音便不會強烈反抗。可惜為爭取發聲機會而反抗的人，現在卻要坐政治獄。

黃進提到中國人多只關心自己民族與國家，與西方較整體地看世界不同。不過，西方不少國家也盛行民族主義，非洲如是，歐美也如是，不是民族先行就是宗教先行，或語系先行，所以才出現愛爾蘭共和軍、魁北克要求獨立、蘇格蘭要求獨立、泰米爾游擊隊、光頭黨、3K黨、哈馬斯、伊斯蘭兄弟會、艾沙比組織、真主黨等，甚至各種滅絕人性的種族屠殺。不過，較富裕、較民主、較文明、較均富、整體人民生活水平較高的國家，對世界與別國的關心是多些，對政治較熱情，看「科尼2012」行動在哪些國家較流行便可知。而中國因財富分配問題、溫飽問題，以及漣漪信念（以宗族和自己人為中心，先問血統才問對錯的信念），才會對世界較不關心。

黃進說到，在中國，人命是不值錢的。從人民上訪的待遇、人命在大大小小的車禍上不被重視可見，只要不是有錢人，人民的生命是卑賤的。有錢人條命才矜貴，無錢便是賤命，幾千年來也如是，可悲可悲！

黃進縱使對中共有千萬不滿，但目前不希望推倒它，其實，這

也是很多大陸人的想法。究竟革命以外，有沒有任何短期方案或逐步行事的方法？筆者當然認為，行民主才能為解決問題提供平台，因為國家要長治久安，要不斷進步，靠的是制度，而不是人治。中共現在推行的是人治式的集體統治，源自1956年，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鄧小平在《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強調「集體領導」，不要再「個人崇拜」，和列寧主義中的「民主集中制」差不多。在鄧小平再得勢後，集體統治沿用至今。

但從國情來看，集體領導還適用嗎？即使不革命推倒極權，也可以改變體制來把政府由上而下的管治變成由下而上，雖然首要中共自動自覺改體制，是有點不切實際。現在中共大可從「民主集中制」走到「民主開放制」，因確立制度已有一定脈絡。且地大物博的中國，其實不適用集中制，不利把政令下達地區使行之有效，集中制難把中央權力伸延到各地方去，才出現「政令不出中南海」情況。例如中央要地方大建保障房，但地方政府陽奉陰違；地方貪腐頻頻，借債連連，連中央也吃驚。

但如果實行民主開放制，地方政府才能相對實行中央的指導，要透過民主開放制去加強官員責任與權力來源，來自人民認可。地

方領導由人民選出，再間選中央政府，這樣由下而上的民主開放制，由各地民選官員推選，能使中央官員更了解各地實情，及打破權力終身制，令太子黨、官二代、富二代治國情況斷裂；官員要靠人民支持，而非父蔭，這樣國家管理會更貼近民心，人民實況才能上達中央。大躍進就是因地方政府不是由人民授權，而是要靠向中央邀功，所有送進中央的報告皆說「形勢一片大好」，才導致大飢荒和造成十年白幹。

說到底，如果大家怕革命，要逐步改革的話，行「民主開放制」不失為一個建議，勉強做到1960年9月提出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吧！

莊澤權

簡歷

生於1990年的香港人，青年民建聯成員。

訪談

筆：你怎界定自己的身份？

莊：我會界定為中國香港人。香港是一個特別的地方，有歷史留下的特別情況，又是中國一部份，所以是中國香港人。

筆：你覺得自己愛國嗎？

莊：愛。愛國不需要原因，因是自己祖國。香港和中華民族是不可分離。自己看不同的書，在2000年後，世界格局面臨重整，中國人面對角色調整，中國傳統可適應世界調整。

筆：你心中的中國傳統是甚麼？

莊：文化素養、家庭倫理、待人接物、追求真誠，都是中國的傳統。

筆：現在的香港和中國發揮到中國傳統嗎？

莊：中國傳統價值仍在人的心裏面，但一些問題令這些內在美德不能完全發揮。中國過去積弱，令人變得現實，認為要先解決當下的事，才去談美德。加上政治事件，包括大陸上世紀60年代與1989年發生的事也有影響，令大家不願意說出自己的想法，令社會

分化，出現矛盾，包括建制與民主派間的不信任。矛盾加深不利中國發展。

筆：你覺得時下的九十後愛國嗎？

莊：感覺九十後不夠愛國。整體上他們沒經歷過國家的事，好像北京奧運只是一次性的激情，一次性事件不能帶動九十後對國家認同。而且香港缺乏國民教育，殖民地時已開始迴避國民教育，但國民教育不是洗腦，因學生可從不同媒體接受不同資訊。國民教育可建立國民意識，正確看待國民這件事。

筆：你怎看別人説某些人愛國又愛黨？

莊：自己身處親建制政黨，大家有共同血脈與文化，會正面鼓勵國家發展，但看到不正確的事也會發聲。中共作為執政黨，有其貢獻，也有其過失，例如八九「六四」是嚴重過失，要正視。目前中共作為執政黨是有利國家發展，可逐步改革，避免分歧。中國太大，改革是困難的，人口太多，所以改革要逐步才成。

筆：香港現在屬於誰？

莊：香港人要先承認一國兩制。在一國下，政治上有歸屬問題，香港歸屬中國的，但香港未來應由香港人決定。當大家都愛國，命運掌握於香港人手上是應該的。

筆：你怎看現在的香港？

莊：香港正處於樽頸位，長治久安之後，處於高不成、低不就的狀況。香港現在由第三產業、由地產主導，有些人用地產霸權、金融霸權形容此情況。現在樓價太高，年輕人難負擔，但又不能讓樓價大跌，所以改變是困難的，要有調整期，而在調整期間，必有代價，如恆指下跌等。可是政府太因循，不敢進行調整。自己參與青年民建聯，就是希望從政治入手，為香港出力。

筆：你怎看現在的中國？

莊：現在的中國在進步中，這是顯著的。自己隔一年回內地一次，見到很多進步地方，人民素質也有進步。政治方面，八十後、九十後太不了解內地，太人云亦云，例如反高鐵中，很多不知事情是甚麼一回事。他們以為內地政制進步慢，但其實不是，政府對人民訴求是有回應的，例如烏坎村事件。而且經濟發展很快，雖然有不完善的地方，有貪腐，但中央領導人視野長遠，以及內地學生思想不封閉，令社會進步。

筆：中國現在屬於誰的？

莊：中國由民族、完整國家與人民組成，三樣同樣重要。要人民生活好，民族才能抬頭，要領土統一，國家才完整。

筆：你有偶像嗎？

莊：其實九十後較自我，少有偶像。自己較欣賞全方位看社會的人，不只着重地區主義。曾鈺成是我欣賞的人之一。

評論

莊澤權乃一以民族出發的愛國者，他熱愛中華民族，不過中國是一多民族國家，有時過份強調中華民族，會引起少數民族的離心，這是立志從政者要小心的。筆者欣賞莊澤權擁護中華文化、道德觀，相信所有同樣擁護中華文化、道德觀的人，對現在不少道德淪陷的情況出現，如溫州動車事件、我爸是李剛事件、躲貓貓事件、小悅悅事件、石家莊官二代撞死人事件等，以及黨員官員為求上位，不少連老師家人也批鬥的缺德情況汗顏與心痛。

這是中共上台後，對傳統道德打壓的後遺症，以便用一套由中共建立的價值觀取而代之，可是在道德真空下，官員官二代富二代腐敗不堪者比比皆是，可是我們的祖國卻被他們統治着，資源被他們壟斷着。富二代成為了燒錢、炫富、欺壓、吸毒性愛雜交派對的代言人，施寅寅、胡斌、劉航、馮紹峰、孟晨、林衞等名字多不勝數；李建國、張高麗、儲波、陸浩、梁保華、陳良宇等貪腐官員，

不論官階大小，充斥官場；「裸死」官員、「公共情婦」、「性賄賂」、天上人間、少女被姦、冤情無處訴反被打壓等，也盡帶出官場貪、色、腐對人民之禍。筆者希望不論建制或是民主派，都要像莊澤權一樣，是其是，非其非，控訴腐敗之徒掌政之禍。

莊澤權提到對民主及建制兩派分裂，沒共同為香港進言之擔憂。筆者諒解他的擔憂，不過，有強權的建制派，如不先去包容弱勢發聲者，則不利兩派互為諒解。為被滅聲者、弱勢、少數發聲的一方，卻因為苦無發聲渠道或聲音不被重視，而走去反抗示威與公民抗命，卻被標籤為激進搞事，不被強權包容，反被司法打擊。這當然不利政府所謂的和諧，但帶頭破壞和諧的是政策傾斜、不給予異見者話語權的政府。被剝奪話語權的，必作反抗行為以發聲，他們被視為少數，不是相同聲音的人數少，而是只得少數人願意以衝擊與公民抗命行為去為被滅聲者發聲而已。而且香港有一奇怪現象，乃當經濟民生出現問題時，輿論和當權者會把責任推向無權力的反對派和泛民，說他們搞亂香港，儘管雙方在七成至九成的民生議題上立場一致，卻不會先把責任放在有實權的政府和建制同盟身上。這和外國完全相反，除非反對派在議會佔多數，否則若出現經濟民生問題，責任必在政府身上，而非反對派。所以如果要不同派

別充份合作或諒解，首要條件是不同聲音的持份量被充份保護與保障。當聲音可以表達而不被打壓，大家發聲的機會平等，掌政者聆聽時不偏頗、不作假諮詢，矛盾便大減。

莊澤權雖為建制派人士，但他能正視還未解決的六四慘劇，比很多因為害怕得罪極權、影響仕途，而轉而討好強權、巴結權貴，在六四表態上，二十多年前後有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如梁振英之流，莊澤權是非常值得尊重的。從他的言論中，他對中共政府，尤其中共中央領導人充滿信心，相信他們能逐步帶領國家改革，也相信他們設立的一國兩制對香港有利。當然，筆者相信的是制度，而非人治，因人會變，可變好也可因權力而變壞；但制度不會變，只要制度良好，被制度牽制與監察之人，即使才能低劣或道德敗壞，也必被限制以及受制度懲罰。

莊澤權提出一個觀點，是他認為內地很多學生的思想並非如大家想像中封閉。筆者其實也看到不少學生思想開放，但可悲的是，相對資訊不自由的大陸尚可出現思想開放的學生；在資訊流通自由的香港，思想守舊退步之徒卻日多，怎不叫人心痛？要人民生活好，不只是物質生活有保障，連尊嚴與精神也被保障才叫生活好。那麼大家認為大陸及香港的人民，生活算好不算好？

司徒子朗

簡歷

生於1994年的香港人。

訪談

筆：你怎界定自己的身份？

司徒：我是在香港的中國人。香港乃地理位置，中國乃民族。

筆：你認為中國人和香港人的身份，像鍾庭耀的調查那樣，可以分開的嗎？

司徒：可以，因香港人不一定個個都是華人，而兩地生活模式大不同。身份不只是由種族決定的。

筆：你怎看鍾庭耀關於身份認同的調查？

司徒：文字遊戲而已，意義不大。因每個人的身份認同，在不同場合給的答案可以不同。當有時沒答是某些身份，不等於不認同那個身份。例如答自己是中學生時，不等於否認中國人和香港人身份。

筆：那你愛國麼？

司徒：自己對中國文化、文學、歷史認同，是愛國的。愛國應從歷史文化角度出發，而不由政權出發，因政權會變。

筆：你怎看目前的中國？

司徒：經濟發展迅速，但文化沒有進步，人文文化也不是朝着好的方向走。中央與地方政府不接軌，人權保障落後，但自己對中國的將來是樂觀的。

筆：對於近期中港矛盾，香港人喜歡內地同胞嗎？

司徒：有不太喜歡的感覺。例如香港人聽到街上說普通話的人，會有怪的感覺；感覺有些香港人太感性，認為內地人都在搶香港的利益而仇恨他們。當然內地人的行為，有些是討厭的，但這和他們的生活文化有關。我們應教育他們，而非譴責他們。我沒有不喜歡內地同胞的看法，而香港人也有不善的地方，只是接受的教育較多。

筆：香港是否有本土意識？

司徒：香港很多本土意識建基於排外，如說別人是蝗蟲。本土意識應由保育、保護自己的文化出發。香港乃多元文化的地方，中西交匯，不過一些過份資本主義的，就不值得宣傳。我們應宣傳普世價值多於本土意識，才合乎香港乃多文化交匯的狀況。

筆：那麼你怎看城邦論？

司徒：在現階段，陳雲的城邦論意義不是很大，因香港連基本民主也未做好。當香港不再過度資本主義，而建立一套好的文化，加上民主，城邦意識才能運行。可是現實上，香港難和大陸保持距離，城邦論實現的機會不大。

筆：你怎看一國兩制？

司徒：當主權在大陸手中，基礎便不穩，因大陸的制度常變，所以一國兩制難實行。而且一國兩制從不是香港人自己選擇的制度，是別人強加的。

筆：香港對於中國來說，扮演着甚麼角色？

司徒：香港以前乃革命基地，現在應是向大陸宣揚普世價值的基地，把自由人權主義宣揚到大陸去。

筆：台灣總統大選後，很多人也說台灣值得香港去學習，你怎看這觀點？

司徒：香港應學台灣民進黨當年的抗爭方式，雖然有點激烈，但目標清晰，一步一步行。香港現在的抗爭只針對個別政策，沒長遠理念。

筆：哪種模式最適合未來中國？

司徒：台灣那種民主模式，加上保障自由，便適合未來中國。而聯邦制則合乎未來的發展。

筆：現在的中國屬於誰？

司徒：政權屬於中共，文化則屬於全世界。

筆：現在香港屬於誰？

司徒：香港的政權屬於共產黨，不過有賴健全的傳媒與有限度選舉，才使香港人保持一些權力。

筆：你有沒有偶像？

司徒：沒有。人始終有缺點，如果追隨一個人會很奇怪。應學習別人的優點和貢獻，而非只崇拜一個人的所有。

評論

當郝鐵川說中國人與香港人身份不能分開時，司徒子朗指出中國人與香港人身份可以分開。其實籍貫身份與國籍身份是兩個身份但卻直接關連，兩個身份都和出生地與血緣有關。

人，是不只有一個身份，你可以是A君的兒子也可以是B君的父親，正如你可以是中國人，但又同是香港人或上海人。當你說

你是A君的兒子時，不等於不是B君的父親，這取決於你在不同時刻、場合、環境、對象的取態。而在不同場合、經濟狀況、政治氣候、提問的對象，你回答身份認同問題時，會有不同答案，只是取向與偏好上有先後高低之別。所以港大或其他機構多年來對身份認同的調查不但不是不科學，而是非常科學，把時、人、地三者也拉上的一個調查。當中共與中國混淆；而香港因做過殖民地而又沒有獨立，或像紐西蘭、加拿大、澳洲般作「自治領」，然後任聯邦國等，香港是有着特別的環境，令香港人的身份有着獨特的價值與意義。這些價值與意義會令香港人對自己身份的取向或偏好的先後高低取態，因政、經、時、地、人而變。

所以類似的身份調查，不但科學，而且重要，對管治者有着極具意義的參考價值。這類調查非但不像郝鐵川形容般那麼負面，相反卻有助政府對不同時候氣候的民情民意更能掌握。如果敵視類似民意，政府與人民會更疏離，對民心掌握不足，施政便不能緊貼人民所需。

司徒子朗慨嘆中國政府對人權保障落後，但相對於人權上保障得較好的香港，中國政府可作為參考，從而令國內同胞受惠，令同

胞們的基本權利不受剝奪。所以香港不但不要令人權保障倒退，更要有進步，故此對於那些還原公安惡法、法庭以荒謬的「共同行事」條例引入示威之中以把司法變成打壓異己工具、種種政治打壓，香港人不但要反對，還要反抗，因這對國內同胞也有着深厚意義。

正如司徒子朗指出，香港從前是革命基地，有份促進立國、脱離帝皇建制；在改革開放，香港又成為中國經濟轉型與面向世界的參考，現在不但可助人民幣面向世界，在政治制度推進、司法改革與人權推動，香港也有提供幫助的使命。即使在細節的政策上，香港對中國政府也有帶頭作用，所以回歸後我們不需妄自菲薄，反之要積極改進自己，繼續作領導與參考作用。例如環保上，香港環保份子對土地保護意見、土地保護政策，若引進內地，對類似大躍進與改革開放後的過度開發，造成泥石流與毀滅性破壞環境植披，甚至過度伐木、血煤血礦、破壞水源等等（可惜國內政府的四荒破壞：砍光、燒光、偷光、開光，幾十年來不斷加劇，導致泥石流處處），香港的成功可作內地環境保護改善的參考，從而改善同胞的生活質素。

司徒子朗說聽到街上越來越多人說普通話時會有奇怪感覺，

大家會有疑問，回歸後這是必然的事，為何現在越來越多港人不喜歡人們說普通話？其實香港人當然並不反對普通話，但當自身的語言，尤其不只是地方語言，而是自古而來極流行的廣東話受到威脅，甚至因政治經濟氣候而面臨被取代威脅，人們自然對突然具侵略性的普通話存反彈感。

近年中共政府在廣東大開「推普機」，廣東話在教育機構與媒體上的位置不斷被壓縮；香港也因迎接自由行和國內政策指標，而逐漸以簡體字與普通話取代繁體字與廣東話（而非並行），香港人對此反感是正常的。正如港英時代英文壓住廣東話及中文，香港人也出現反抗，導致金文泰港督辦漢立中學、貝路港督時開設中文電台、柏立基港督時成立中文大學、推行中文運動等，都是香港人保護中文與廣東話運動的成果。可惜現在卻有人認為以簡代繁並沒問題，可見中華文化也因時代改變，漸而模糊化了。

對於不同文化，香港作為中西文化交匯點，是會包容的。但當自身文化被侵略與威脅時，便會出現反彈和反抗。保家衞國、保護傳統文化、保留鄉親鄰里乃中國人傳統，香港人沒受思想荼毒下，是會保護被侵蝕中的自身文化。

當自由行興盛帶來營商文化改變的副作用、種票改變政治環境、不守規矩的文化擴展、生育醫療等資源不足的情況下被分薄而出現緊絀，香港人有保護自身文化的行動是正常的，對不肯入鄉隨俗的事情作出指點也是正常。當然這些指點有否過火、有否忽略人家的文化背景是另一個問題了，而香港應實行像汶萊的保護主義還是新加坡的輸入主義，還是兩者整合，則留待大家自發己見了。

因此保護行為不代表不包容，而這個大千世界所以這麼多姿多采，是因由各種文化組成。

司徒子朗認為香港的民主派或反對派不及台灣民進黨般清晰堅定，這當然與兩地政治氣候不同有關。

相對於當年台灣在野勢力受到的政治打壓和逼害，香港民主派可說是在溫室長大。溫室長大的相對上較易讓步、怕壓逼，較易動搖是正常的，因為面對的打壓不多，而反抗力不像台灣般那麼大。而台灣從前的反對派的確如司徒子朗所說，目標清晰。台灣當年的在野派有長遠、中期和短期目標。長遠希望建立公義社會（他們認為有需要與任何在公義上有不良紀錄的權力疏遠，避免自身保護公義的能力薄弱），中期推行政治輪替，短期乃反對國民黨專權。

相反，香港的在野派或反對派，目標不清晰，長期目標是甚麼，中期的與短期的又是甚麼，確不夠明確。我們只知香港民主派的目標是爭取雙普選，但當中的細節定義各有不同，所以原則上相對薄弱，易陷入妥協或滿足於中途站的圈套。

香港的民主派就是錯把目標定於選舉而非建立公義社會（最少給人是這印象），令到民主派過份着重於選票，所以當出現一些與多數性選票取態有關的事，與某些民主、自由、人權的價值有衝突，民主派會較易自動着重於前者。例如長毛、毓民的議會抗爭及一些人士的公民抗命行為，因破壞了「秩序」和不於原有的遊戲框架內玩，被市民認為是教壞細路和不適合，有些民主派便會與這些行為劃清界線，甚至譴責，而非互相扶持。太着重於選票令到民主派的抗爭意識不堅定，甚至抗爭力度不知不覺削弱了，這對打破社會的犬儒氛圍毫無幫助，因為作為在野派，不是要跟隨民意，隨波逐流，而是應帶領民意，進入新思潮。

香港的民主派就是因定位錯誤，只懂於強權定下的規矩框架內走，處處受牽制以致成果不多。香港民主派太被動接招，而不是主動出擊，不太懂化被動為主動，所以多年來，民主派爭取的成果不

足。也由於目標不長遠，只懂着重選舉，而令團結性受選票影響，民主派處於散沙局面。

香港的民主派或反對派或在野派應把長遠目標定在建立一個保護普世價值的公義社會，而非只着重於選舉和能否參與選舉的問題，如此才不會被選票牽着鼻子走，和不會出現當普選實現、民主派當權、六四被平反，民主派便再沒有存在價值的問題了。民主派每年只在春秋二祭（六四、七一）例行公事的所謂抗爭，卻多年來沒有把行動帶入新的境界，太過不思進取、安於現狀。在美國、台灣等相對民主程度高的地方，因公義社會沒有完全建立，不論當權派和反對派也各自努力着。也請大家記着，香港甚至大陸有今天的進步和成績，是前人不斷付出血汗甚至生命而爭取回來的，我們不能因有點成績或進步而卻步，也不能因此自滿。

鄧翠莎、葉梓鋒

簡歷

鄧翠莎

生於1996年的香港女子，現任中學生聯盟主席（2012年）。

葉梓鋒

生於1994年的香港男子，香港電台政壇新秀第八期成員。

訪談

筆：你們怎界定自己的身份？

鄧：中國香港人。雖然在中國出世，想中國變得更好，但感覺中國與香港不同，這因法治方面香港較好與及曾受英國管治有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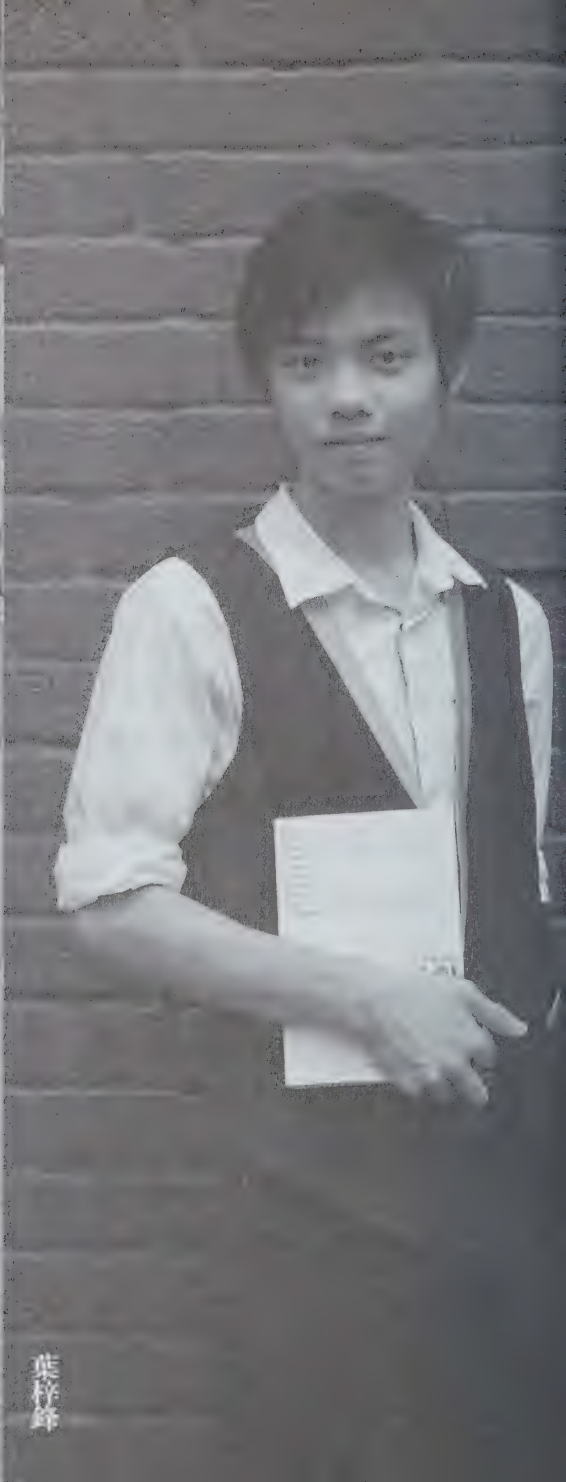
葉：我會界定自己是世界公民，不受國以國限制。感覺上對於中國人身份較負面，因與不尊重法治與人的操守有關。

筆：怎看一國兩制？

鄧：抱懷疑態度。小圈子制度不能代表民意，政府受到中央制肘，例如政府不敢提六四。香港很難有高度自治。

葉：一國下根本不能有兩制。經濟還可以，但政治上不可能，從小圈子選舉已反映香港不是高度自治。這樣的一國兩制反而使香

鄭翠沙



葉梓鋒

港問題叢生。反之陳雲的香港自治「城邦論」，甚至香港獨立是可以考慮的。一個國家不代表只能由一個民族成立，一個民族不代表只能成立一個國家，南韓與北韓是好例子，中國大陸與台灣實際上也因制度不同，其實是兩個國家。

香港要獨立有困難，因香港欠缺水、糧、電，但這些問題可以解決的。例如進口食物、輸電、海水化淡。

筆：怎看現今的中國？

鄧：經濟發展迅速，工業進步，是欣賞的。但人民質素在禮貌上缺乏，而且政治腐敗，社會問題多多，黑心食物、假奶粉、為了發展而破壞環境的行為很不要得。

葉：經濟上是成功的，在世界上行社會主義國家中最成功的。改革開放令中國走上大國之路。可是政治上跟不上經濟發展，令後果嚴重。反貪腐在胡耀邦後無以為繼，太子黨不喜歡政治改革，這都令經濟與政治發展失衡。

雖然環境保護上因參加了減排計劃而有所進步，文化保護開始在條例上落手，但人文價值觀太向錢看，放棄了道德原則，而先富起來的人利用和踐踏法治去保護既得利益，使人民質素與道德每況愈下。外交積極，但遇上貿易糾紛，處理手法不夠成熟，而常常外

交凌駕法治人道，如敘利亞問題上，不譴責敘利亞政府的暴力殘殺行為。

整體上的發展可以接受，但很多方面要改善。

筆：怎看香港？

鄧：對政治失望，對政制發展失望。爭取普選多年，但連確實的方式如何、真正的落實日期也沒有。當看見疑似土共在反對聲那麼大下也可當特首，很傷心。

經濟與環境保護方面做得不錯，但空氣污染情況還需更落力去改善。而人文質素在上升，越來越多人遇到不滿會發聲，不再冷感。

葉：資本主義的營運是好的，令人奮鬥心出現，增加社會生產。但同時帶來不少問題，我們應反思資本主義路線應否調整，如工時過長要立法規管、工資跟不上經濟增幅。

政治發展空間很大，但香港被中共一黨統治，處處限制香港政治發展與各種選舉令真正普選遙遙無期。民主派沒做好在野反對派角色；建制派只懂處理民生問題，但政治上不理民意，做着損害自由、人權的事，又不敢向中央爭取香港人應有的民主。可能政治上由泛民管治，保護香港核心價值，而民生交由建制派去做會好些。

法治要以法律為本，不會因涉案者身份或案件性質而影響判

決，可是近年很多政治事件令司法判決時加上政治考慮。如果連司法獨立也捍衛不到，香港就會失敗。司法獨立是吸引外資助因，因法律能保護企業財產。

社會上分配不均衡，分配分首次分配，即工資；二次分配，即社會福利；三次分配，即無償奉獻。可是首次分配不均衡，打工仔得不到應得的；二次分配也不平衡，令大部份利益落入高層與老闆手中。

整體上香港太着重經濟發展而忽略人民生活質素，例如工時太長，假期又少。而教育太以考試主導，只有知識而沒有生活常識，應該減少考試比率，增加實體學習。

筆：香港屬於誰的？

鄧：現在的香港屬於中國政府，政府運作由中國政府操控，港人治港有名無實。梁振英上台後，前景令人擔憂。

葉：香港應該屬於香港人的，但就像劉天賜所說，香港人奴性太重，不太關心社會及不多懂自行作主。而政制發展主權在中央政府，特首要中央喜歡才可以做。難道真是要香港獨立才能真正港人治港？香港人太少參與反抗活動，有不滿但只懂認命，不會出來抗爭，香港人實在太悲哀了。

筆：你們有甚麼行為去愛護香港，才使香港不那麼悲哀？

鄧：每年中學生聯盟也會參與六四集會與七一遊行，希望香港有改變。

葉：多關心社會時事，有不滿就要出來，不要認命。所以自己參加過維園行動，參加政壇新秀與中學生聯盟。自己也會在討論區論政，交流意見與表達聲音。由於政府只聽建制內的聲音，要進入建制內發聲才能真正改變社會。

筆：你們有沒有偶像？

鄧：沒有。看不到有想法與自己類似的人。

葉：沒有。因為偶像背後意思是盲目追隨，當年人民太盲目追隨毛澤東，造成文化大革命。我們可以有學習對象，要用批判思維思考。

評論

葉梓鋒提到香港可以獨立。「港獨」這議題，不管社會怎發展、經濟怎進步，都是敏感話題，彷彿碰不得。但在成熟的社會，地區獨立問題是可以碰、可以談的，當這些問題可以談，這個社會才算

成熟。所以港獨可以談，就像加拿大魁北克透過公投自決是否獨立、當年愛爾蘭獨立於英國、多年來蘇格蘭爭取獨立、黑山脱離塞爾維亞而獨立、斯洛伐克當年和平脱離捷克，皆見到在文明國度中，地區獨立不但可以談，甚至可以碰，只要不是用暴力手段，不是要求武力獨立便可，反可避免戰爭。而談獨立不等於一定獨立，現在的魁北克與蘇格蘭便是好例子。所以談港獨是合法的，至於是否合情合理，大家各自提出理據吧。

可是有些人卻動不動就把港獨説成談不得與不合法，是不文明行為。例如當年劉慧卿只是説台灣前途應交由台灣人民自決、陳巧文提出西藏前途應交由西藏人民自決，便被打成搞分裂搞獨立，彷彿談也不能談。首先，人民自決不等於會獨立，當然，應是當地人民自決還是整個中國的人民決定，大家可各提己見，但不讓人談是不合道理；看當年梁振英那樣公開挑戰劉慧卿，雖然當中的譴責成份不太合理，甚至有點霸道，但這樣公開辯論，其實是好的，所以政府絕不能以強權打壓談港獨的人。

更不堪的是很多沒談港獨、沒主張港獨的人，往往因政權限制——港獨是談不得的事，而把不同意見的人，橫蠻的扣上搞港

獨的帽子，例如當年李柱銘只是到美國說香港狀況，就被徐四民、梁振英等人扣上港獨帽子，連談也不能談。那麼當年毛澤東引入蘇聯支持、孫中山引入日本支持、昂山素姬引入英國支持，他們又是漢奸或緬奸？而孫中山當年成立洪門組織，因不容於當時的封建政權，而被稱為黑社會，有些人卻因此指責孫中山搞黑社會，但搞不清孫中山那種黑社會和現在那些搞黃賭毒賣翻版維生的黑社會是兩碼子的事，真是搞笑。大家又看看，有些民主派人士爭取雙普選，或爭取公投法，又被一些建制中人亂扣上港獨帽子，意圖把他們抹黑醜化，除了顯示搞抹黑的人水平低外，根本顯示不了甚麼。如果有道理，何需搞抹黑與扣帽子呢？

葉梓鋒提到政治發展與經濟發展，不能一個快而一個慢，否則就像現在的中國那樣，問題叢生。中國大陸就是因為只着重GDP而忽略其他事項，以GDP治國，除了一些地方於GDP報告上造手腳，也令很多事情受忽略，例如環境與人文文化的保護被忽略，城市設計只着重「高大空」而使現代城市走向同一模樣，毫無特色之餘又破壞被認為沒有經濟價值的歷史建築。例子包括年年有、月月有、無日無之的血煤血礦事件，黑心食物層出不窮，豆腐渣建築，假磚頭

建房等等，受害的是人民，失去的是人民生命財產。

當政治改革追不上經濟，落後的制度跟不上經濟發展，使國家靠的不是制度，而是關係。這就出現外資來華必先學會「恭喜」二字，商家做生意只能靠關係拉攏和金錢籠絡，使貪腐處處、官商勾結，甚至勒索商家行為處處，再甚是人民要用尊嚴來賣錢。當政治制度追不上經濟發展，政治監管落後，便使監察貪官的行動慢而落後，處於被動，也使冤案處處，上訪人民眾多且受無理打壓。三公（公款吃喝、公車私用、公費出國）問題也因政治監察不足而多不勝數，卻同時大量山區（青海、雲南、寧夏、廣西為主）兒童吃不飽、長不高，很多山區兒童只得城市兒童六成的熱量吸收、發育平均慢三年，三農（農村、農民、農業）問題嚴重，也是基於政治發展追不上而惡化。而政治監督追不上，乃因新聞自由被壓制，記者被定位為黨的喉舌多於人民的喉舌，把黨和人民錯位地對立了；也因「真理部」，即中央宣傳部給傳媒過多的不合時宜規條。

當政治制度及新聞自由保障追上經濟發展，人民的生活才能真正被保障。正如1945年《新華日報》所說：「新聞自由是民主的標幟；沒有新聞自由便沒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是新聞自由的基礎，沒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聞自由，決不可能。」當

前是人民有免於恐懼的自由，「有罪推定」的司法觀改變，政協要找出問題多於只是拍手，人大是監察施政多於只是舉手，那麼政治制度才算追得上經濟。可是不論大陸或香港，這些方面還做得不夠。

葉梓鋒和鄧翠莎也覺大陸人現在很多太向錢看。其實這是資本主義下，以財富論成敗的必然現象，以及批儒批孔導致道德真空，令人民以拜慾主義代之——拜金、拜權、拜名、拜利，凡事以金權名利而非道德尊嚴公義量度，才造成那麼多缺乏私德的行為。也因類似雷鋒式的犧牲主義代替道德主義，黨教化人民生出來便是虧欠國家（其實是黨），要為國（黨）捐軀才能報答，從而使人民感到自卑，當遇上不合理不公義便因自己從小被教育是虧欠了國家而啞忍，不是去爭取權利，覺得自己無資格問政府要些甚麼。這種不重視人民權利的宣傳，是令到人權不彰顯的原因之一。

葉梓鋒提到香港的民主派沒有做好在野派的角色。事實上，除了因定位模糊、太被選票牽制，更弊的是二十多年來，民主派沒有給市民足夠信心相信民主派是有能力執政，所以往往覺得民主派只懂反對，甚至為反而反。當然民主派是有提出政策，只是傳媒因公眾覺得政策討論較悶而少去報道。不能否認的是民主派從無顯示出能代替香港政府班子執政的能力，所以不論董建華政府與曾蔭權

政府多麼不濟，民主派的得分也不高。不論梁家傑參選特首還是何俊仁參選，沒有給出一個民主派的長遠執政方案，只是停留於叫口號，如保護核心價值或對政府的失誤提出小修小補而已。也因此，香港的民主派往往只在吃六四和七一老本，當那年經濟較好、政治較穩定，民主派便會流失大量支持。經歷過那麼多次選舉，無一套接班機制，了無生氣，怎不及人食老本之感？如果同當年台灣在野民進黨展現的執政能力，或是日本在野民主黨等相比，香港的民主派在長遠規劃與政策研究，實在差得太遠。只是公民黨和社民連的出現，才在細節政策研究或長遠理念有較清晰的定位，可是還遠遠不夠。看區議會選舉，社民連只是在地區政策跟資源雄厚的建制派比併，看不出能把甚麼社會民主主義帶進區議會，就知民主派在選舉上難有突破。長毛、毓民、大班的成功，是他們能把議會抗爭和高水準的辯論能力帶入議會，才成為民主派的異數。但在政策和長遠藍圖方面，整體上，不論溫和民主派還是前進民主派，也做得不夠。這方面，民建聯和新民黨是做得相對較紮實的。

社運情侶——葉志行、何潔明

簡歷

葉志行

1989年在香港出生的男子。

何潔明

1991年在香港出生的女子。

訪談

筆：「香港人」這三個字，對你們來說是甚麼？

葉：如果別人問我是甚麼人，我會很直接答是香港人，因為自己在香港紮根。香港人指今代人，一班在香港出世的人，和上一代下來的有不同。

何：香港人是難民潮後那代，土生土長那代。

筆：香港的利益是甚麼？

葉：對香港好的就是利益。但利益是甚麼？很多人認為經濟與安居樂業就是利益，但這些是應有的事，不是利益。利益是地方能夠持續發展，包括有選舉權及表達自由。

筆：本土意識是甚麼？

葉：是怎「運用」香港這地方。天星皇后等事件，啓發大家要保護香港的產物，表達歸屬感。

何：香港是一個整體，一個「本土」。香港人想捍衞這個整體，一個大家一起生活的地方。高鐵摧毀菜園村，大家出來保護它，就是在保護這個整體。

筆：你們怎界定自己的身份？

葉：我會答中國人。從小在入境時已填中國人。不管政權怎變，這個國家也是屬於我們的。

何：我會答香港住的中國人。當見到自己國家發生一些如六四事件，如劉曉波被打壓的事件，會很心痛，因為發生在自己的國家。如果相同的事發生在外國，心痛程度相對沒那麼大。

筆：甚麼叫愛國？

何：愛國是當政權做錯事，自己會感到失望及出來反抗，希望有改善。當國家有普天同慶的事也會驕傲，例如北京奧運，但感覺有點矛盾。

葉：在香港住的，愛國心不會那麼強烈，因這代人長大於殖民

地教育，對國家的感覺不是那麼實在。但愛國是對國家有期望，希望國家有轉變，例如希望國家由不民主走向民主。

筆：現在的中國屬於誰？

葉：現在的中國屬於共產黨，控制整個國家。以共產主義包裝資本主義，一方面扼殺自由市場，一方面又把教育變成政治宣傳工具，使大陸的進步力量很卑微，即使常見的抗暴、罷工，也不是追求制度改變，而是自身利益而已。

中國由不同民族與板塊組成，其實應是一聯邦，卻由一黨專政，使人民誤以為中共等於中國。

何：中國現在看來是屬於中共的，因中國被黨控制，人民不能向此say no。中國應屬於中國人民的，應該有結社自由、人權保障、民主選舉才對。

筆：現在的香港屬於誰？

葉：現在的香港屬於一班有錢人。他們壟斷私營市場，又參與公營市場。如果他們撤資，香港便失去很多，香港前途決定在有錢人身上。

何：我覺得香港屬於一半半，一半屬於中共，一半屬於有錢

人，而他們卻互相利益輸送。他們通過功能組別與中共舉手機器去交換利益。當民主出現，他們交換利益的手段便難立足。

筆：你們怎看一國兩制？

葉：一國兩制是給台灣看的模式。但香港的民主政制在回歸後一路倒退，所以一國兩制的作用已失效。人大釋法已讓人們知道，所有決定權在中國，香港只有一國一制。

何：一國兩制是一個謊話，已騙不了台灣人。

筆：你們有甚麼愛國愛港的行為？

何：運用言論、結社自由，珍惜香港作為中國最自由的堡壘，為中國發生的不平事上街。

葉：我會向人民解釋，中共不等於中國，中共做錯事，不應由中國人民負責。以及行使公民權利，去遊行、集會、示威、投票，要把香港變得更好。

筆：你們認為自己屬於左、中還是右？

何：自己是中間偏左，認為街頭行動要與議會並行，我不會推翻資本主義制度，但會反對地產霸權。

葉：政治上自己是偏右的，經濟上則是偏左。對議會的投票被

中共控制很無奈，議會有形無實。

筆：中國目前最需要甚麼？

葉：由香港角度出發，中國需要改革戶籍制度以及要照顧弱勢，不能只顧經濟發展。

何：教育最需要。不是要國民教育，要一個會灌輸普世價值的教育。可是中國教育從根柢已出現問題，可能要中共落台才能實行。

筆：香港最需要甚麼？

葉：公帑要運用得公平，分配也要公平，要照顧市面的日常需要。

何：要解決地產霸權的問題。香港的衣食住行全被地產商操控，市民得不到真正需要的。

筆：你們有沒有偶像？

葉：陶君行，他會抗爭，也很照顧每位抗爭人士，即使是不認識的，他也會照顧。

何：長毛梁國雄，他堅守街頭抗爭之餘，又可把聲音帶回議會內。他長期關注基層，會親力親為。他很有骨氣，不會因為選票而去改變理念及討好人。長毛多年走來始終如一。

評論

看到這對社運情侶，筆者想起文學家李潔非的話：「直接、真實、自主，不接受禁忌、告誡、阻止。」他們這樣真摯的表達己見與對社會的承擔，在這個後封建時代體制下也能出現這想法，也能堅持在社運街頭上去改變社會，令人感動鼓舞。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越多年輕人醒覺，肯負上匹夫之責，社會還會是這麼冷漠自私嗎？他們令筆者想起上世紀60年代郭世英、70年代末胡耀邦的朝氣。

有人說要改變社會的人很偏激，有人說走上街頭抗爭很偏激，有人說反對政府很偏激，有人說不滿中共很偏激，儘管你是憑良心辦事也好，對於這些被指為偏激的行為，可看看以下三位人士在不同場合的回應：

袁騰飛：有人說你太偏激，我笑回：它們能餓死幾千萬人，你不覺恨嗎？它們能整死幾千萬人，你不覺痛嗎？它們能拿槍對着人民，你不覺怕嗎？它們能讓孩子在火中燒，你不覺悲嗎？它們能強拆、強趕、封殺、失蹤……它們能吃喝萬億元，卻說醫療教育還沒實力……它們做的事，你不覺偏激，而我只是寫出來，就偏激了。

潘小濤：他說出動防暴隊、摧淚彈，動輒使用胡椒噴霧，你不

說他偏激；他說要用行政手段阻撓商台續牌，扼殺言論自由，你不說他偏激；現在我只是批評一下他，擔心將來的香港面目全非，你就說我偏激了，這是甚麼邏輯呀?!

Ed Leung：他說要為二十三條立法，你不覺得不安嗎？他涉嫌提倡用防暴隊甚至解放軍武力對付和平示威人士，你不覺得驚慌嗎？他經常使用自己身份向學術人員施壓，你不覺得過份嗎？他動不動就發律師信給批評他的傳媒，你不為此擔憂嗎？他及他背後的勢力集團，使用駭客破壞一個沒有法定約束力的民意調查，打電話公然恐嚇傳媒，私自改動專欄作家的政論文章，甚至涉嫌與黑勢力牽連去干預選舉……這一切一切，不只偏激，而且暴力、恐怖！但你說那些說話大聲（或說幾句粗話），示威遊行後繼續靜坐抗議，最多向官員辱罵，或向他們所在範圍附近拋擲物件表達不滿的人是偏激、是暴力？這是甚麼邏輯呢？

筆者：當中央再次違反承諾，不但以人大釋法否決07/08雙普選，對2012雙普選的做法再次照辦煮碗；然後有人提出五區公投，以和平的投票去表達意見，你卻說後者偏激？當政府在預設立場下提出替補機制，在人民越抗爭，政府越是打壓的情況下，然後十多萬人上街與衝擊所謂的諮詢論壇，你卻說後者偏激？當政府因制度

使然而被地產霸權與極權控制，令整個社會也遭殃，於是有人在街頭及議會上抗爭，你卻說後者偏激？當內地出現種種問題，貪腐處處，很多人民受苦，少數先富起來的人為保剝削得回來的大眾利益而去打壓貧苦一群，然後有人為貧苦的人發聲，如艾未未、劉曉波、趙連海、黃綺、胡佳，你卻說發聲的人偏激？

就如哲學家李小龍在月亮高掛的晚上發出一拳後說：「你們只見拳頭，不見月亮。」意指人們只懂說眼前的動作很偏激，卻看不見遠處的環境造成甚麼局面，是看不清事實、睇不透形勢、看不見遠因。

何潔明說愛國等於當政權做錯事，自己會感到失望及出來反抗，希望有改善。這就是為何人們要出來抗爭的原因。對於那些常勸我的人（包括身邊的人在內），說中國 / 中共有「進步」啦，比起帝制時期有好大進步，應該讓它繼續進步，不應該指責它，但進步並非從天而降，也不是政權會自動自我修補，而是千百年來，有人提出改變之聲而爭取回來的，他們付上血汗，甚至生命。如果只享受成果，而對不足處默不作聲，你不但自私，而且冷血。

改變是為了我們的下代而爭取的，如果想我們的後代可在更好的環境下長大，我們必須爭取改變。如果只是默不作聲，就等如讓世世代代生活於缺憾的社會中。你願意你的後代這樣做人嗎？

香港學專家洪清田說過，改變永遠不是來自沉默的大多數，而是醒覺或前進的一群。儘管他們是少數，可能只得人口的半成到一成，甚或更少，但由於意志堅定，他們帶來的改變力量，永遠不可小覷。辛亥革命、延安起義參與的人有多少？縱使只是少數一群，但力量壯大，影響深遠。香港的政黨，尤其是黨員少的民主派，卻不懂向前進，發揮潛在力量，反而跟沉默大多數一群的規則去走，結果改變不成反被牽着走。你看申請副局長一事，民主派的窘態便可知；又或政改一役，只懂鸚鵡學舌，跟建制派一套去走，結果力量反而在內裏崩潰。

誠然很多香港人是不敢去抗爭甚至發聲，如果是怕，也請在選舉投票時，投那些願意抗爭和願意改變的。也有很多大陸朋友怕得罪中共而不敢抗爭，究竟有沒有緩衝建議可行？既可抗爭，又不得失中共？其實國內目前的氣候，相對上是較以前開放，這是多年來很多人用血用生命用自由爭取回來的成果，而在目前環境下，中共對於「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的抗爭，在某程度上是許可的，如果抗爭的人夠團結與堅定，烏坎村就是一個好例子。

中共希望自己能千秋萬代，雖然歷史已證明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每個政權也有終結時，但中共還是想透過有限度改革而去延續

統治，所以中共對「結束一黨專政」的要求特別反感，是其底線。那麼有沒有緩衝處呢？雖然筆者認為民主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但對於緩衝處雖不完全認同，但還是有的。中共怕政黨輪替，不行政黨輪替，那麼可行「派別輪替」，即中共內的派別輪替。首先人民要出來爭取中共由所謂的民主集中制走到民主開放制，像烏坎村那樣容許地方有不設門檻的選舉，容許人民選擇自己的代表。這些代表權力來自人民，然後可成立不同派系或根本是現有中共派系內的從政人。由於有一人一票的持續定期競爭與權力來自人民，如果想繼續當官，必須照顧人民利益。然後那些民選出來的、當選但又由不同派系組成的地方政府，再間選中央政府出來，哪個派系票數最多，就上台執政；而落敗的派系則擔當監察掌政派系的角色，提出不同意見及當施政出現問題時，提出補救方法。對於那些怕再進入內戰及想保留中共統治的人，這種人民授權的間選中央與派系輪替，確實會大大改善目前情況。

筆者相信這是革命外另一條路，當然也要人民出來發聲爭取才可。當然，把制定憲法的過程和權力交回給人民，才是最長治久安的方法。信奉社會主義的人在內地還是多數的，這緩衝方法會令不少人接受，但最終應是政黨輪替還是派系輪替較好較現實，交由人

民決定最好。

當人民在選擇代表上有say，自己能參與施政，不管是多黨制還是一黨多派系制，人民有say才會有歸屬感，政權才能真正鞏固。那便不需再靠打壓，和靠千億維穩費，把不滿掃在檯下，才能繼續執政。因越打壓，民心越反彈，社會便越不穩，那只是惡性循環，故此大力變革，看來無可避免。

葉志行說到香港現在由有錢人壟斷，香港的前途被他們把持了，如果他們撤資，香港後果不堪設想。現在出現這情況，是由於多年來制度上的傾斜與分配被人壟斷，造成資源倒向一群人身上，令他們的影響力隨着權力增大，形成地產霸權和地產黨。而香港的好壞全憑他們有否良心決定。這就是為何那麼多人要求改變制度，因為要真正和諧，不是打壓不同聲音或有權力的去剝削不同意見的發表，而是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大家在一個公開公平的社會有均等的權利與發言權，社會才和諧。目前不少人期望有位有才能的人作救世主，改變香港那種貧富懸殊、市民買不起樓的情況，是不切實際的。因香港的小圈子制度是由地產黨與強權把持着，小圈子選出來的領導人必然被地產黨與強權制肘着，成為它們的代言人，被逼幫它們於社會上挖大眾的成果與利益；然而所謂經濟發展也只

是造大個餅去挖更多利益，真正大眾能得益不在於經濟增長而在於分配制度是否合理。

在2012年的特首選舉，不少市民認為只要選出最好的一個，選出政綱最漂亮的一位（不管最終會否實現），香港便有希望，所以應該給當選者一個機會，縱使三位候選人各有不足，同是爛蘋果，只要選出最不爛的便可。首先這是看不見缺憾制度是會限制當選人的理念與能力，因最終話事權在地產黨與強權中，而這班既得利益集團，卻充滿人性的自私，所以不管當選人能力多大、梁振英能力多高，結果還是發揮不出來及被逼萬事也得向擁有實權的一群妥協。曾蔭權已是一個好例子，他任特首前，大家不是覺得他能力高、英明神武的嗎？為何他管治下的七年，香港還是這樣？甚至比人稱「老懵董」的建華伯伯更差？如果我們只顧期望梁振英有所作為而忽略制度的缺憾，那就中招了。當反對聲音不能彰顯，反受各種政治打壓；當傳媒被河蟹而不能充份發揮監察作用，不管領導人能力多麼超卓，最終社會也會走向衰敗，毛澤東不是一個好例子嗎？在沒有輪替、沒有反對聲音下，那麼一個舉世無雙的英雄人物，不也是把國家統治得這樣那樣？

所以我們不要信「人治」，而要信制度，因只有制度才是恆久

的，社會是屬於人民，香港是屬於大家，香港的未來是屬於年輕人的，正如毛澤東所說：「年輕人啊！世界是屬於你們的，也屬於我們的，但終歸是你們的。」年輕人們不要再相信小圈子出來的「最沒有爛透的爛蘋果」，而應該走出來反對這個缺憾制度，爭取真正的民主。大家要相信自己有能力改變社會，因將來是靠你們來建設，社會是你們的，像戴卓爾夫人說：「人的一生要必有所為。」年輕人也要有所作為，才無悔這一生。所以有人問為何梁振英未上台已經要反對他，這除了是因觀察他六四過後二十三年的行為、小圈子選出來的香港政府十五年的表現、中國建國後六十三年來的狀況外，也因如果梁振英是民選出來的，反對他的人是不會遊行，而是一方面接受結果，一方面堅守崗位繼續努力，就像台灣一樣，民進黨與蔡英文敗選，但因有民主制度保障，他們輸了便再接再勵；相反，香港因沒有民主制度，才出現特首未上台就抗爭反對的局面。

人和行屍走肉的分別，是後者只懂食飯、睡覺、拉屎，而前者會多了以行動來改善屬於自己的社會。

何偉樂

簡歷

生於1990年的香港男子，第一位自由黨九十後成員。

訪談

筆：你怎界定自己的身份？

何：香港人當然叫香港人，正如福建人叫自己做福建人。在上世紀90年代已叫自己中國人，回歸後也改不了。

筆：那麼你愛國嗎？

何：愛，正如我愛香港一樣，但不等於香港及中國發生的所有事情，我都能接受，或認為已發生的事沒有改善空間而不理它。愛國不等於愛黨，有不能接受的事情發生，便要改善它。

筆：你對現在的香港有甚麼看法？

何：香港有好的地方未被人廣泛認識，但也有不好的地方，總之人們有很多不同意見，但缺乏渠道表達。很多人因此轉而在網上表達意見，這也因網上的自由度大。當權的沒有真正了解民情，可能連打工仔用膳時間多少也不清楚，對市民消費狀況也不掌握。

政府很多時都會聽意見，但問題是有沒有用心去聽，或聽了後作出改善，只改小小一步然後便停止了。例如自己以前是運動員，近兩年東亞運與申請舉辦亞運，引起社會關注運動發展。政府是有聽各界意見，但之後改動很少，面目依然，只照顧一小群精英運動員。

但這幾年關心社會的人多了，例如大家對興建高鐵、政改、種票事件也會提出自己意見。不過大家應針對政策和整個官僚結構而非個人，可罵政策和官僚結構，但最好不要罵人。

筆：你對現在的中國有甚麼看法？

何：本身對中國沒有負面感覺，但任何國家，包括美國，也有改善空間。中國在行政管理要改善，但非一朝一夕便能成功，美國也是人民多年的爭取下才有今天成果，所以爭取的路是漫長的。

國內發展得很快，所以行政上也要跟着變，不能停。但發現發展同時忽略了保育，對文化與文物的保護忽略了。

筆：甚麼事令你加深了對自己的身份認同？

何：自己以前曾入香港運動員的機制訓練，但因體育總會內的

種種政治因素而要退出，覺得自己投放了那麼多年時間，到頭來政府連一句「唔該」也沒有就叫我走了。這時發現身為香港人，要關注制度的不足和社會的問題，要改善制度，要優化它，不能停步。

筆：你有沒有偶像？

何：我的偶像是徐小鳳和甄妮，覺得舊歌很有深度和共鳴。

評論

何偉樂一句「香港人當然叫香港人」，率直之餘又反映出，出生在較自由國度的社會及殖民地長大下，那種以大整體民族作包裝的無形枷鎖是較少的。司法獨立的意思就是法律按道理與道德觀定義，不受政治與經濟因素轉變而有所遷就；最原始的身份認同其實就是根據地緣與血緣，而政治與經濟因素影響是後天的，所以香港人身份是香港人，就是這麼簡單了。

所以甚麼回歸後，要甚麼所謂的政治正確，隨着政治氣候轉變而在身份上也有轉變，或再自稱香港人而不是中國人或中國香港人，就被扣上不愛國及政治不正確之名，是無謂的，因為即使改了口，或不改口，不等於認同政權的一切。但也由於政治氣候大轉

變，的確有人會因此在對最基本的身份認同上出現了改變，那就值得研究的，所以一直以來鍾庭耀類似的調查——政治氣候轉變對民情的影響，是有研究意義的。

何偉樂提到喜歡在網上表達意見，因為網上的自由度較大。這除了反映科技如何帶動時代生態轉變外，也有點可悲的是，香港一直說要製造一個言論自由的國度，可惜多年來，也不及一個新興的互聯網給人民帶來信心。這可能因主流媒體帶給人民的認同感較弱，故此保護網上自由有其必要性。市民除了留言表達意見，甚至會改圖改歌等「二次創作」，以輕鬆形式表達沉重意見，從第四屆特首選舉大戰期間的各種改圖改歌便可感受一二吧！

在大陸，因加設了防火牆與綠壩監控，即使翻牆下，國內同胞享受不到應有的網上表達意見與吸收資訊自由，更弊的是甚至沒有免於恐懼的自由，隨時因意見不合而被捕或人間蒸發。所以在香港，維護網上自由很重要，但近來政府有意收緊二次創作空間及以保護兒童之名去收緊網上自由，爭取落實網民稱的「網絡二十三條」，再加上「纏擾法」或會出台，以及把「共同行事」放在示威來作控罪、還原非法集結罪等惡法，在這非民選及不歡迎異見的政府管

治下，不令人聯想到是把二十三條分件上就奇怪了!這種項莊舞劍，志在沛公的手段；這種要縮壓言論自由空間的做法，如果市民稍一不慎，就上當的了。

何偉樂要求政府多聽意見與聽了要有所行動。首先，即使政府在一些民生議題是真心聽意見，但由於官僚體制內的層層關卡，會令到想改也困難，或即使肯改，也要經過很多複雜程序，令改變步伐很慢，到改變了後的新政策可能已經不合時宜和追不上時代步伐了。這全因一路以來政府高官閉門造車，在官僚體制的象牙塔內聽意見所造成。特首很少落區，一落就變成追星活動或恩賜，這當然是落區前先叫友好的地區團體安排一定「粉絲」，又舉牌又叫口號又爭相合照，營造出民望不高的特首受歡迎的氣氛，從而感染一些政治立場不深的市民。很多市民在回歸十多年，沒有普選特首下，還覺得特首和港督一樣高高在上而非人民公僕，不管做得好不好，願意落區見他們便是恩賜。這種勞師動眾的落區，不是面子工程麼？所謂的聆聽民意有幾多是真情，幾多是敷衍的假意，就不得而知了。但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日後政府施政好壞，就是反映事實的時候。

筆者也發現很多時政府的公聽會或諮詢會，如果涉及的政治因素越多，或涉及內地政府的因素越多，做騷成份越大。例如粵港自駕遊的公聽會，舉行時已鐵定一個月後會開始實行及登記，那麼這不是假諮詢是甚麼？替補機制的諮詢預設立場，除了沒有維持現狀的選擇外，文件還很有導向性，說搞五區補選／公投就是浪費公帑，那麼政府諮詢不同意見的誠意有多少，真令人存疑。而多次關於政改方案的諮詢，便已證實越是政治含量高的，其諮詢誠意越低，這種假諮詢的做法，不但不能平息不同意見的不滿，反添怨恨，徒增矛盾。

何偉樂對於香港政府體育政策的不滿，筆者是感受到的，不論文化或是體育，對於政府來說只是「假大空」的面子工程，所以推廣文化要建所謂的地標西九，但文化政策配套卻落後非常。體育方面則分甚麼精英運動與非精英運動，兩者待遇天淵之別，不論資金資助和設施配合，兩者分別很大。政府以獎牌紀錄來決定哪些是精英運動，哪些不是；對於政府來說，體育發展只是「面子工程」，視乎能否令特區政府叨光而已。所以多次在亞運為香港帶來獎牌的桌球項目，就因2014年仁川亞運沒有納入，政府便把桌球踢出精英運動

行列，桌球發展因而失去大量資助，連港青隊也隨時因此要解散。當桌球運動員有好成績，政府便出來叨光，相反便把它掃到一邊去，不但看出政府的功利，也看出政府在體育投資上是沒有長遠規劃的。

即使政府把體育當作面子工程辦，標準也很落後。中國有姚明，台灣有林書豪，日本有中田英壽，南韓有朴智星，香港也有個傅家俊。可是傅家俊多年來於桌球的個人成就不屬於政府關係，也改變不了桌球面對此厄運。可見政府的標準是那麼奇怪。也難怪那麼受歡迎的足球，多年來也不被政府重視。民政局與霍大少，難怪你們多年來傷透廣大體育迷的心了。

何偉樂提到中國有很大的改善空間，而身為中國人的我們，是有責任推動中國進步，不能袖手旁觀，見有點兒進步就收貨收聲。可是當大家指出國內政府很多的不足時，不少官員與親政府議員，都會答：「美國也有這問題，美國的人權也很不堪！」等類似轉移視線的話，然後說「中國是有問題，但已在改善中，慢慢耐心等吧!」等類似答案。

中國是大家的祖國，而中國人傳統上以地域、血緣出發，就像

當自己鄉里和外人爭執時，手指總是指向自己人為先，才再問是非對錯。這種心態除了導致動不動把外來者的不同行為看不過眼外，也會先要求自己人生活好些，才去關心外人。因此對國情也如是，先對中國的種種產生不滿，然後要求改善，才理會別的國家與民族發生的事，乃正常不過；正如對於倫敦舉辦奧運，大家的興奮程度遠比不上北京奧運。可是當官的像小學生般抱怨為何人家只指責自己而不指責別人的心態，卻是要不得的。這種諉過於人的心態，就是令前進動力大減的原因之一，會令國家倒退。

另有一種官僚的答法是，中國情況已在進步中，中國人口眾多，改變不能一步登天，要慢慢的一步一步來。首先這是扣帽子方法，因世上根本沒有一步到位的解決方法，如果有，世界和平了。但如果見到問題也不出聲，只會助長問題蔓延，令情況惡化。人民發聲只是希望情況能被政府看見，然後作出改善；如果連聲也不出，情況只會惡化，從而令更多人受苦。

當指出問題，又有人會說，先搞好經濟，才處理政治問題。但其實，要先改善政治，才有利經濟。當年改革開放，除了大搞經濟特區、經濟開放區與開放十四個貿易港口外，政府還下放權力，

讓農村成立承包制，開始發展類似私有企業的模式，令經濟開始走上起飛路線。由此可見，權力下放給農民、基層人民，不但可增加農村生產力，更可改善農民收入，對經濟與民生皆有利。現今歐美不景氣、人口老化，靠出口的中國要減少對歐美的依賴及開拓新市場；投資市場也因熱錢帶來的外來資金炒作強勁，國內融資過盛，使物價房價升得過猛，人民因而受苦。中國是時候由投資出口型轉作消費生產服務型。但這需要提高人民與民企的生產力，要有公平競爭環境給民企，不再國企壟斷、給民工合理財富分配、增加民工權益。而這全需要中央下放政治權力，釋放國企特權，不再官商一體壟斷，以及在政治制度上改革去保障人民權力來源。

所以政治改革，是從制度上把權力由國企、高官、既得利益階層下放到民工、民企、基層。因此政治與經濟不能分開而行，而推動政治改革，必須大家發聲發力才會實現，因為改變永不會從天而降，而是靠大家合力爭取，不管前路多難行，甚至遇上既得利益階層的政治打壓，為國為民為了下一代，大家也不要放棄，要發聲出力的爭取！

六四真相
國民教育

Tommy

簡歷

生於1994年，香港中學生聯合委員會、香港學生發展委員會成員。

訪談

筆：你怎界定自己的身份？

T：我會界定自己為中國香港人，但又以香港為先。雖然香港是中國一部份，但對中國感覺較遠，本土意識比國家意識強烈。

筆：那麼本土是甚麼？

T：本土是香港的文化，而其他地方是沒有的。香港有中西文化交流的獨特背景。自由方面，也比大陸與澳門多。

筆：你怎看目前的中國？為何對中國的感覺較遠？

T：國家發展雖好，但社會發展追不上經濟發展，功績抵不過錯失。黑心食品、打壓民意、打壓維權的事實在太多。

筆：中國的定義是甚麼？

T：中國只是一個領土、疆界問題。一個中國可以是中華民國，也可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要有自主權才算真正國家。每個地方和省應有自己的體制與法律。

筆：那麼中國的少數民族在你心中是否中國人？如何看西藏和新疆問題？

T：少數民族也是中國人，他們住在中國領土，有份參與國家發展。他們應有權自決將來。某程度上，西藏和新疆人的「獨立」，未必真的想脫離中國領土而獨立，只是想跟中共保持距離，只想有自主權與民主。

筆：你如何看兩岸問題？

T：台灣的人民有自主權，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有民主。這些大陸都欠奉，所以大陸難強行要台灣接軌。

中共奪權後，因不許反對聲音挑戰，主打維穩，打擊反對勢力，令人錯覺中共得到大部份人支持。不像以前，不斷發展後，中共說甚麼便等同人民需要甚麼，令政策與人民不斷疏遠。當經濟發展停滯，人民得不到經濟利益，便會要求制度改革。

筆：你愛國嗎？

T：自己愛國，但不是那些看到國旗升起便會哭的人。當見到國家出現不平事，會發聲，香港跟大陸密不可分，經濟上要接大陸軌，但政治上不能。

筆：怎看城邦論？

T：即使香港自治，在經濟與社會也跟大陸有緊密關係，是無法自我封閉，最大問題究竟香港和大陸是從屬還是平權關係？因這會影響香港的議價力。

筆：中國未來應走甚麼模式？

T：應該模仿美國的聯邦制，因領土太廣了。現實上，地方政府也是自己管自己，非樣樣聽命於中央。地方應有一套民主制度去管治，以地方民主去支持中央，有民主才是向人民負責。可是中國沒有地方民主，派系不斷鬥爭。

筆：怎看少數民族與新移民在香港生活遇到困難的景況？

T：香港人應以平常心看待新移民和少數民族，他們支持了基層工種的供應，也為香港提供動力和更加多元性，豐富香港的文化。但政府和地區配套對他們支援不足，教育制度對他們不友善，令他們難以增值和向上流，結果讓人看不起。香港的政黨大多避開處理他們的問題，令他們更被排擠。

筆：你覺得香港人有甚麼特徵？

T：香港人適應力強，心態調整快。現在香港比回歸前差了，

是管治制度出問題，並非香港人心態弱了或能力差了。香港人要多出來爭取才有改善機會。

評論

Tommy定義的中國是領土和疆界，又認為中國應仿傚美國行聯邦制，每個省應有自己的法律。

每個省有自己的法律與自主的管治，叫做state。不同的state會組成一個國家叫united state。而領土則是country，即國家體積的大小。一個國家的英文叫nation，nation的特色是有自己的民族和特性，這些特性包括歷史、文化、社會習俗。每個國家都應該尊重和保護自己的特性，否則就枉稱國家了。中國的文化是中華文化，信奉儒家思想，主張仁義禮愛，以四書五經（《論語》、《孟子》、《大學》、《中庸》、《詩經》、《尚書》、《禮記》、《周易》、《春秋》）為典範。國家的最高統治，即人民要效忠的，不應是政府，而是憲法，像美國一樣。憲法乃一保障每個人民平等機會、權利、自由的憲章，不會因政府轉變、政黨輪替或法律修改而有變，因人權定義是不變的。國民效忠的是憲法而不是政府，權利才能真正被尊重和保

障，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才能較為和諧。所以中共不應以人民不效忠中共或中央政府，便視為異己和政治犯，反應制定一套真正保障人民的憲法，才能長治久安。否則單靠維穩與打壓異見，較難鞏固統治與構建和諧社會。憲法上，自由人權保障和民主制度可學台灣，法治可學香港，所以香港法治不能倒退，否則不利整個中國同步前進。

由於中國領土遼闊，當中有很多不同民族，所以美國的聯邦制或俄羅斯的邦聯制是融合少數民族的最佳統治模式，讓每個省和民族自治區去保留自己的文化特性，因應特性而有不同法律，卻同時有一個統一憲法管治着，去保障每個省的權利和劃定義務。對於少數民族區的統治，讓它們成為真正的state，再成為united state的一部份才是最佳統治方法。不管是元朝的高壓統治，還是清朝的高壓懷柔並施，甚或是吳忠信、盛世才、王震的政治高壓而經濟懷柔統治，都證明是失敗。只有放權給少數民族自己管理自己領土、制定自己法律，再用一個統一憲法去保障他們，讓他們放心維持在united state內，才是上策。當然對於民族主義者，如新疆的「東突厥伊斯蘭運動」、「東突厥斯坦解放組織」等組織想以民族立國，是難以避免，但如果真是放手新疆人自治，加上經濟利益，相信民族

分離主義難以盛行。不論在西藏或新疆，縱使有強大的經濟援助，由於不是讓他們真正自治與自建法律，對當地特性有欠尊重，入派武警駐守當地廟宇、長期監控宗教人士、把少數民族土地收歸國有（例如上世紀50年代在西藏的土地改革促成後來的西藏暴動）、以漢語為官方語言去取代當地語言與打壓當地宗教，都令當地人認為被打壓，因打壓他們的文化宗教就等於打壓他們。即使經濟上幫了他們，也會認為是資源被侵略，加上在人口政策上，當地沒話事權，便認為是中共殖民和漢人入侵了。因此在少數民族建立state才是最佳方法。

如果中共想更得人心，或一個政府要真正得到人心，必須尊重自己民族的文化特性。可是50年代的反封建、反資產階級運動，和後來的文化大革命，都破壞了很多華夏文化，以及強行以馬列思想取代中華文化原有思想，全是得失人心之舉。例如反儒反孔、反穿旗袍（看現在的中國人還能分清旗袍與和服嗎？）、反道德倫理、以拼音取代漢字、以簡體強行全面取代繁體、打擊地方語言、打擊地方宗教、大拆胡同與四合院，都令nation失色，這便反映在民心上。另外，不管中國大陸和香港都應立檔案法，因這是尊重歷史的要素，可是目前兩地也沒有，令nation或state的特色褪下。

陳倩瑩

簡歷

生於1989年，第五十四屆學聯秘書長。

訪談

筆：你如何界定自己的身份？

陳：中國人，因喜歡中國，但討厭中共。

筆：為何討厭中共？

陳：中共屠殺自己子民，把國家弄得污煙瘴氣，而官員貪腐，所以追求結束一黨專政。中共只是披着共產黨的皮，內裏卻是行着官僚資本主義，一路剝削着人民。

筆：你愛國嗎？

陳：因為愛國，才關心國家。愛國家的土地和人民。自己是因為關注維權事件、人民被強拆逼遷，才參與社運。

筆：你怎看香港？

陳：香港從殖民地到回歸後，也只是一隻棋子。香港從未自主過，人民生活得沒尊嚴。但只要大家不再犬儒、不再妥協，香港還

是有希望的。香港從來都處於民主與封建之間，以及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

自己在香港出世，不選擇離開，要追求更美好的社會，所以參加社運。香港人要爭取自己的模式，不要放棄自己的本土性和獨特性，不要盲目追隨國內的模式，才有出路。

筆：你怎看一國兩制？

陳：一國兩制名存實亡，所謂的民主回歸從來無實現。現在西環滲透選舉，地下黨員任高官治港，把一國兩制變成一國一制。

現在梁振英做特首，政治打壓只會越來越大，對前景悲觀。法治已成為政治工具，司法制度走向崩壞，可是大部份人還未意識到這回事，還未意識到香港的人權保障不斷崩壞，而令社會受損。

筆：怎看城邦論？

陳：城邦論是看準香港人恐共心理，以及對身份的疑惑。可是香港根本難從大陸分割出來，難以抗拒大陸入侵，城邦論因此並非香港的出路。城邦論雖然容易包裝，但內裏太多排斥主義和保守民粹主義。

筆：你認為香港的出路在哪？

陳：只要泛左翼大團結，反抗那些控制、壟斷經濟的少數人，便可從源頭解決貧窮問題。左翼要懂得組織群眾，把理念帶到人民內，去打破現在損害人民的經濟制度。

筆：真正的社會應該屬於誰？

陳：屬於所有人的，因人是平等的，權利是平等的。當政府是人民授權，作為代理人去謀福祉，平衡各方利益。當社會是人民權利平等，才適合人民居住。可是不論香港或大陸的制度，還未做到權利平等保障。

筆：你怎看香港的社運？

陳：香港的社運太強調行動者，而缺乏組織或組織欠缺成熟，這因對傳統組織失望。而且香港社運的參與人數並沒有建立群眾基礎，只看議題能否吸引群眾。香港社運接觸的群眾少，教育市民的機會少，所以人數不能壯大。社運份子要做好組織工作，要說服大多數人，要擴充接觸人的渠道。因現在是搞改革，不是革命。革命由少數人發動，改革則要先說服大多數人。

評論

陳倩瑩是2011年9月1日，在科學館舉行的替補機制論壇，事後五位被法庭判以擾亂公眾秩序罪的其中一位。當天她跟着人群進入科學館，沒有破壞任何公物，也沒有傷害任何人，可是卻因跟長毛梁國雄打過招呼，而被法庭作為「證據」，以「共同行事」之名判罪。當然，其實五位被定罪者當天也沒有破壞任何公物或傷害任何人，反而是長毛曾被人武力對待，有相為證，但施以武力的人不知是否因立場和政府一樣，而沒被檢控。陳倩瑩是被政治打壓的活生生例子，所以對香港司法變成政治工具的體會特別深。

訪問中也可見到她對大部份人對政治打壓事件冷漠失望，對只有少數人參與社運和參與抗爭失望，以及對從政者的犬儒失望。這可能因科學館事件後，作為泛民大黨的民主黨，竟因為免流失保守市民選票，不但沒有向市民解釋當天科學館究竟發生甚麼一回事、政府如何借那件事作政治打壓，反而譴責當天參與抗爭的人，使被政治打壓者雪上加霜。連反對派政黨也那麼犬儒，難怪陳倩瑩失望。

陳倩瑩提到不論中國或香港，對人權保障也遠遠不足。這當然是制度落後、司法不完善的問題。大陸景況相信大家也清楚，受冤

的人民有冤無路訴，反被地方政府壓逼；到京上訪又困難重重且受打壓，例子多不勝數，成書的、上報的多如天上繁星。這全因國內體制和監察制度過於落後，追不上經濟改革。而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回歸十五年，竟還沒有完全跟國際公約的《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條約》接軌，令人民權利保障較為落後。加上沒有成立獨立於政府的維護人權機構，更使人權被剝削的事例此起彼落。

特區政府一直以有關機構已經完善保障及促進香港人權為由，反對成立一個獨立於政府的維護人權機構。可是近年的政治打壓越來越多，包括馮炳德事件、楊匡事件；新聞自由倒退，包括中聯辦外常設置固定採訪區去限制記者活動範圍、黑影事件、記者採訪特首候選人論壇外的示威而差點被捕等等。由此可見政府的說法根本不成立，且有說謊成份。一日不成立維護人權的獨立機構，就正如被批為「自己人查自己人」的警監會到現為無實權的監警會，所謂保障人權的政府部門，只是無牙老虎和受政府立場干擾，淪為政治工具。香港一天不成立維護人權的獨立機構，一天也不能稱為真正有心維護人權，那麼陳倩瑩口中的人民權利平等便沒法保障。

陳倩瑩談到香港的社運缺乏組織性。的確香港的社運缺乏連

續性，正如她說的，只是建基於事件。香港的政黨，除了個別建制派大黨外，在組織性的確很弱，這因它們從沒長遠規劃，卻反過來要求政府有長遠規劃；看到政府的不濟，卻看不到自己的不足。沒長遠規劃以致被動的從政治事件或政府政策失誤得分，沒有一層一層的組織起來，不像當年的國民黨或共產黨，不論工廠、街頭、村落，總有自己的衞星組織去領導支持者。因此香港的政黨從沒法像國共兩黨般帶動改革，更遑論搞革命，它們只能對政府出錯提出建議而已。

香港社會組織鬆散，一來是因香港沒反對政黨提出藍圖作組織參考；二來因為想維護思想的自主性和獨立性，甚至是抗拒人為領導的組織和政黨，包括抗拒社民連和人民力量。當然鬆散組織有其好處，但力量凝聚是會較慢，不及魅力型寡頭領導組織那麼快速。所以目前來說，香港的社運還不盛行，除非個別議題搞得大。但筆者見到有社運人士，開始從土地自主生活入手去宣揚社會價值，如土地正義聯盟，是一種較長遠規劃的抗爭，或像社民連般是打着爭取社民主義治國旗號那麼長遠，或人民力量的魅力吸引群眾型組織，都會為香港社運帶來新氣象。

陳倩瑩提到香港處於共產主義與市場主義之間，而中共又只是披着共產主義外皮，內裏卻是行着官僚資本主義。其實改革開放出現，是因過往完全打壓走資路線行不通，需要適當的吸納一些市場經濟主義，如土地承包制、自由港的出現。尤其1992年鄧小平南巡，大叫誰不改革便要下台，確定經濟改革模式是混入市場經濟。翌年中央確定中國行具有市場經濟特色的社會主義，順應潮流跟世界的經濟接軌。可是同一時間，政治改革沒如期進行，政治改革追不上，沒有良好的監察制度與司法制度落後，形成官商間大量貪腐行為出現。即使改革開放令借貸擴業等經濟活動大增、經濟成果大為增長，卻因制度欠奉，在成果分配一環嚴重落後，經濟成果只落入官員以及和官員關係良好的企業內，普羅人民分享的成果比實際應得的少，這就是陳倩瑩口中，官僚資本主義出現的原因。

Koey

簡歷

1995年出世的中五學生。

訪談

筆：你怎界定自己的身份？

K：血統上是中國人，但也叫自己是香港人。香港的方向、文化、發展都跟大陸很不同，乃兩個不同世界，不能勉強一體化。回歸後只是人流交往多了，沒有走向同化。

筆：那麼中港一體化是否好事？

K：不希望一體化，因為大陸那邊權力腐化、黑心食物處處、人權自由度低。相反香港很多方面比大陸好。

筆：香港能改變大陸嗎？

K：很難，因為中共在大陸獨大。大陸要改變，要中共內部有人肯改，但機會不大。而且香港不斷倒退，被大陸的腐敗不斷荼毒。香港本身已有很多事擔憂不已，根本無暇改變大陸。再者，香港人缺乏求變的心，遑論有興暇去改變大陸。

筆：你愛國嗎？

K：一定愛，因中國是自己的國家，例如領土紛爭，會站在中國人那邊。在外國人眼中，中國的名聲是怎樣，他們便怎看你。所以真心想中國好和改變，不合理的事情不要再發生。

筆：你認為大陸同胞有何共同特質？

K：他們分兩種，一種是窮的農民，一種是富有的，過着奢華生活。但他們都貪小便宜，窮的因為教育落後與道德規範欠奉，在缺乏物質時，便會貪，即使不道德的工作也會做。富有的人很多暴發戶，卻斤斤計較，貪錢、權、色，身上有錢，但心態無變。

筆：那你愛港嗎？

K：愛，啊，不不，不怎愛。因為人的質素差，思考不全面，對社會不關心。政府使人疲於奔命，令人很難互相溝通，或無時間溝通。香港人沒有自己的方向，只想靠外面。政府沒有方向，只懂依賴大陸，自身沒有解決能力。無奈自己生於香港，也希望香港人能有改變。

筆：香港人如何思考不全面？

K：很多香港人思考很片面。例如學生，溫書做功課已經無時間，何來有時間看新聞與關心身邊事？即使看報紙也只看一份，眼

光不夠闊，無意中被與權力巴結的媒體洗腦。這使學生缺乏批判思考和不懂深思。好像很多同學不知「拉布」是何物，只懂一味說不好或不知。學生腦裏只有考試、找份好工、娛樂，但沒有社會視野，對事物無立場無看法。上班一族則太忙，返工已耗盡精力，對身邊事根本不想理會，有時間也只會休息或娛樂去。

筆：你理想中的香港是怎樣的？

K：人們不冷漠、關心身邊事、勇於表達意見、有批判思考、盡公民責任。政府不再庸俗、管治班子不再無能、政府不要再自找麻煩。但這個理想很難實現。

筆：誰在香港搞這些麻煩出來？

K：政府自己製造很多麻煩，單是民主改革已搞得一塌糊塗。又例如高官為了面子，竟然以修改版權條例為名，去打壓二次創作，把二次創作刑事化，結果令網民憤怒。

建制派為了自身利益，不斷單方面灌輸錯的概念，用錯的資訊誤導人，令不多思考的市民誤信他們。

泛民主派主流太溫文，得個講字，只懂要選票和做騷，根本改變不了現實。

筆：香港的出路在哪？

K：自己對香港很絕望。香港甚麼都要高級，事件、景觀都是公式化，只懂搞旅遊與吸引外資。政府太短視，不懂從內在改變。香港文化被抹殺，音樂藝術工作者沒地方做音樂藝術，即使西九也像是名牌集中地去吸引人來shopping多於去欣賞音樂藝術。香港的路太單向了，只靠金融，香港只會不斷衰退。

筆：甚麼人或事可以改變香港？

K：激進派是很重要的，他們是有條件創造改變。可是香港人卻覺得他們很煩。加上傳媒多自我審查，沒有完全報道事實，又沒灌輸正確價值觀，使市民不支持激進派，甚至指責他們無理搞事，以及漠視他們爭取到的成果。

激進派不懂包裝自己去吸引人民支持，只懂慨嘆人民不支持是民智未開，是沒有用的。當然單靠激進派去帶領改變是不夠的，還要大家關心社會，勇於找出真相；傳媒不再偏袒強權。

筆：你理想的中國是怎樣？

K：中國地大物博，應分區統治，因中央管不了太大的地方。地方由民主選舉，再間選中央政府。中央管大目標，地方政府管地

方事務。官員風氣要改，不能再把貪污當為理所當然的事。官僚要改，不要只聽order辦事，卻不聽民意。不能再一黨獨大，不可行暴政。當人民意見能上達，政府透過選舉去了解人民，中國便會走向好的一面。

筆：你有何熱愛社會的表現？

K：參與遊行，例如反地產霸權、六四、七一、反對版權修訂條例。參與聯署，例如反替補機制、反國民教育。

筆：你有沒有偶像？

K：沒有政治偶像，因對事不對人，只看政治人物對每件事的取向。

評論

Koey說到香港人思考不全面，對社會不關心。誠然，因朝九晚九，加上人天性較自我，故有時間都是及時行樂，較少去主動關心別的事物，除非自己利益受損，也遑論多花時間吸收不同知識。

由於時間緊逼，香港人較喜歡接收快餐式訊息，在最短時間吸取最多樣化訊息。例如半小時新聞內接收香港、國際、體育消息；

報紙只讀標題，或精簡的免費報；看精簡但話題多元的雜誌。由於時間緊逼，有時間也奉獻給工作、家人與娛樂，所以缺乏時間去消化那些訊息，把之轉化為知識。可是又因訊息多元，數量多，往往便錯過那些未怎經消化的訊息，只重量而不重質。但缺乏知識，其實是難以分析訊息的真偽與準確性，形成思考不全面，更遑論把知識昇華為智慧了。

當個別訊息佔據在太多傳媒裏，民眾便以為那些是真理，縱使當中不少是錯誤的。例如當大部份報章都把拉布等同浪費公帑和癱瘓議會，民眾便認為這是事實。那不是因訊息的準確性而成為權威，而是訊息發放途徑大小才是其能否成為權威的關鍵。

政府的法案要先在不同的委員會議通過，如財務委員會、內務委員會；立法會大會拉布是不會影響這些法案。而立法會大會有權優先處理其他議案，在處理後才再處理被拉布的議案。這表示即使長久拉布，對其他議案影響也非常有限，根本不會出現政府被癱瘓的情況。不管有沒有拉布，議員與官員的薪津也是同樣支付，所以抗爭政府不義行為的拉布，除了要議員開OT及用多些電外，額外支出不多，浪費公帑之罪名不成立。相反，那些議員收了人工，卻

不開會、不投票、不發言，甚至導致流會，才是真正浪費公帑。這是近期一個訊息不等同知識或真理的例子，可是卻又很多人把此訊息視為真理，以為拉布的議員有破壞無建設。

民主派在立法會，因不公義制度，即使有多數人授權投票，在立法會內也只是少數。對於種種不合人權的惡法，民主派是有責任盡他們所能去阻止誕生，包括議會抗爭，包括拉布，此乃合法合理合情。市民投票給民主派，除了要他們建設香港外，還要盡力反抗任何強權打壓民主自由的行為。反之，如果不盡力反抗，便是坐以待斃，乃失責行為。所以激進派議員拉布，反而是負責任行為。

Koey指激進民主派可為悶局的香港帶來改變。誠然他們的求變決心與新穎手法（對比主流民主派）的確帶來更大改變的機會，可是由於激進民主派還處於幼兒期，有時處理手法或宣傳手法未達理想，才和不少民眾產生隔膜，尤其是保守及經濟環境較好的一群。再加上因他們與強權政府作對、與專權中共作對，傳媒甚少願意正面報道激進民主派，甚至有些刻意醜化他們，令絕大部份訊息也是攻擊激進民主派，令民眾不多接受他們。

「暴力」、「衝擊」就是他們常背負的罪名。「暴力」是強權政府害

怕激進派行動帶來改變，從而令既得利益者需要交還剝削民眾的利益，於是安下來的罪名。甚麼叫暴力？乃強者以自身優勢去欺壓弱者，如猛男強暴少女（不合法不合理）、大財團老闆因生意不佳而刁難安份守己的員工（合法但不合情），即強勢者強逼弱者去接受不願意的東西。不合法不合理的欺壓，有法律可以制裁，但那些合法但不合理的欺壓，就叫制度暴力。

激進派根本是制度暴力下的產物。激進派是因不公平制度下的受害者及弱者，未能對抗制度暴力才作出抗爭。而激進民主派正是為弱者抗爭，要求制度改變，消除制度暴力。可是在不公平制度下，在制度暴力下，這些反抗行為不乎合當權者訂下的秩序，故被冠以「暴力」罪名。例如聲討擁護不公平制度的黨派是暴力、議會抗爭又被叫暴力。這些不公平制度下的秩序其實只是假秩序，當中沒有公義成份，例如立法會主席可任意終止少數派和反對派的辯論，只是為保護當權者利益的假秩序。真正秩序保護的是人性尊嚴與人性個體，可是有錢有權代表一切的社會，充滿的是假秩序，沒錢沒權的不斷受欺壓；弱者聯合起來作出反抗卻被稱為暴力，可見當中的荒謬。

衝擊乃被欺壓者為討回公義的一種手法而已，乃正常途徑。傳媒被強權壟斷時，弱勢無法從正常途徑發表意見或得到重視，只好作出一些出位行為，例如議會內扔雞蛋、拉布、搶咪等去先吸引中立者注意，再求取中立者支持以壯大談判籌碼，雖然未必合法，但合乎公義精神。衝擊也是當人的尊嚴與權利受損時，向欺壓者作出的反抗。

正由於制度不公平欠民主，政商勾結共同欺壓着不少市民，但不少政黨和傳媒為求利益或不想失去得到的利益，甘願作政商爪牙，卻因資源充足，打扮成道貌岸然的樣子，再控制大部份訊息傳達，令少作深入分析的民眾誤以為他們真心為民，卻沒發現他們只是為人民幣服務，而非為人民服務。

真正欺壓人的被說為「正義」、「為人民服務」，而被欺壓者作出反抗被指為「暴力」、「搞事」，這也是訊息被壟斷，民眾欠時間全面思考而導致。因此激進派的拉布、議會抗爭才被指為無聊、搞事、暴力。拉布乃票數為多數，但因制度存在分組點票與功能組別，於立法會被扭曲為少數派，在面對損害人權的法案時，無奈作出的不合作運動與反抗。此乃合法合情，在立法會內除了侮辱別人外，議

會規則保證議員們可暢所欲言的，包括英國議會或美國議會採用的羅伯特議事規則，都是這樣的，以保障少數派。所以曾鈺成任由一己喜好去終止合法的拉布，根本是天大笑話，更遑論英美議會如要終止辯論，在美國，要最少十六名議員動議，五分三議員通過，才可限制議員發言。只有侵害他人身體與侮辱別人才稱得上是議會暴力。可是工聯會的潘佩璆議員公然叫拉布的議員做拉布狗，還說這是搞笑行為而已；民建聯議員陳克勤叫人在二次創作上把拉布議員的人頭放在狗的身上，這種侮辱才叫暴力，但他們偏偏嚴人寬己，水平甚低。

而用三百元，甚至五百元聘請臨記充當反對拉布的示威人士，當中包括疑似江湖人士、失業人士、金毛飛、熱褲少女、小孩、老伯、大嬸，不但迎合那班民建聯立法會議員的反拉布騷，更向支持拉布者投扔水樽、雨傘、出手推撞記者，這才是真正暴力。

這些收錢的反拉布人士，除了有錢收外，還有免費午餐享用，且只是做騷數小時便走，不像那些自發支持拉布市民不管下雨也捱通宵，聘請數百人要花數十萬，十分浪費。反拉布的組織和政治團體為何不把那些錢用於民生正途？當建制派常說激進派暴力，究竟

它們有否反思？

民建聯議員葉國謙指拉布是少數議員壓逼多數議員的行為，但他不明白由於多數不一定對，及投票時有絕對優勢，拉布是對少數派的保護和讓他們辯護的好機會。而香港立法會荒謬之處是多數票的民主派因制度不公反成議會少數，何以葉國謙不立刻撥亂反正？反而多次支持拖延民主進程？這些議員是為人民服務，還是為人民幣服務，大家有目共睹。

對於這種打壓拉布的議員，幫助強權壓逼少數弱者所為，評論員鮑偉聰說：「走去強暴人，唔容許被強暴者投訴，還無恥地問人有沒有快感一樣可惡！」況且以民建聯為首的建制派，在1999年的立法會上，就曾經實施拉布，成功殺掉市政局與區域市政局，令康樂文化藝術管理不斷退步，成為千古罪人。當年連現在的民建聯副主席也大讚拉布的必要，為何今天別人拉布就不能，甚至要被批鬥？民建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拉布的好處是見盡一班議員不吃人間煙火，只是通宵OT，一件香港打工仔見怪不怪的事，對他們來說卻像打仗般嚴重，又要做面膜、吃滋潤食品、帶乘搭長途飛機的配備、拉筋、公然不合議事規

則的看電影（如工聯會議員黃國健看《九品芝麻官》）和看演唱會（如工聯會議員葉偉明看梁靜茹演唱會）、睡覺（如民建聯議員黃定光、工聯會議員潘佩璆）等，貽笑大方。

更不堪是，他們不但OT困難，要準時上班更難，才使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被逼多次從球證角色變為球員角色，落場參與一起打茅波，除懷疑接order與黃宜宏議員合謀終止辯論外，還在2012年5月18日那天，早上8時39分，因天雨關係，突然推遲開會時間半小時。雖然8時55分，天文台掛上黃雨警告，一個幼兒園學生都不能因此而遲到半分鐘的警告，立法會議員卻可因此遲到半小時，目的為了有足夠的建制派議員開會，以免流會。可見，議員水平之低，令人咋舌。同時，這使我們看到激進民主派在不民主社會下，存在的必要性。

香港立法會最弊之處是有名無實，有多數選票的民主派因制度設計不公，反而成為議會少數派，其聲音不被重視也沒有影響力，令激進的走向街頭抗爭；較錫身的則採取法律途徑、司法覆核等方法去聲討制度缺失。不義的制度設計，造成迫上梁山之餘，也破壞了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的原意！

阿　花

簡歷

生於1991年的女生，自稱讀完書好似無讀過的低下階層人。

訪談

筆：你怎界定自己的身份？

花：我會界定自己為中國香港人。即使彼此法律、文化不同，但始終脫離不了中國人身份。而標榜香港，是因兩地有天淵之別。

筆：怎為之中國？

花：中國是中共的地方，有黑暗的感覺。中共的統治手法黑暗，人民不能想講甚麼便講甚麼。

筆：怎為之香港？

花：香港表面上自由，但實際上思想和法律等也被無理限制。例如政治體制受中共操縱、經濟體系非真正的自主、言論及網上言論不斷被政府收窄。可能遲些連形式上的言論自由也會失去。

香港的制度根本是個非真正自由的制度，只重視商業，把人培訓成商業工具。人們只有錢途，而沒有前途。

筆：你理想的社會制度是怎樣？

花：理想的社會是以自由、公平為依歸。每人的政治地位要平等，資源分配要平均，政府要幫助低下階層免受大財團控制。

筆：香港面對最大的問題是甚麼？

花：資源分配不平均，以及人們太向錢看。自己並不反對自由市場，但政府見到大財團壟斷與社會出現不公義，也不肯出手。例如領匯上市，出現種種不公，政府沒做過甚麼作對應。這個靠錢搵錢而致富的社會，令到勞力成果大打折扣，商家壟斷分配。

筆：你對梁振英政府有甚麼期望？

花：沒有期望，反而絕望。不多恐懼他的背景，但恐懼他的鐵腕手段、對自由人權法治的漠視。

筆：怎為之一個國家？

花：政府由人民認可，國家由人民建造，人民選擇自己的生活。可是現在中國政府沒有人民認可，政治法治落後。

筆：甚麼是中華文化？

花：文化乃一層一層的發展，而中華文化已有幾千年的發展。百家爭鳴時代開始發展了中國的哲學，包括人性價值、繁體字文化，都是幾千年來的演化，不容中共政府亂去以權力消滅。

筆：怎看西藏、新疆問題？

花：那是人權問題。每人天生都享有宗教自由，不能因宗教不同而被打壓。中共對人的基本信仰自由也不尊重，把少數民族扣上分裂帽子，打壓地區文化，以為給人兩餐飽飯便可為所欲為。

筆：你為何參與社運？

花：啟蒙老師乃中學老師，向自己講解人的價值和自主。人應為自主而不應為錢奔波。自從參與反高鐵集會後，熱心參與社會活動。最近更與朋友組成組織「鍵盤戰線」，反對被稱為「網絡二十三條」的《版權修訂條例》，要保護二次創作權利，反對建制派和政府的聯手打壓。

筆：你怎看別人稱你為社運女神？

花：其實不論叫我女神，或甚麼西西娘子，都是性別定位問題而已。自己很怕上位，也怕被人指自己博上位，初初對那些稱號是反感的，因不想憑此上位。社運是平權運動，應男女兩邊一起做，不用因性別而過份把人定位。

筆：怎為之「年青人」？

花：年青人不應由年齡而定，而應由心態而定。熱血、有抱

負、有衝勁、少少幼稚才是年青人。那些只為「錢途」而工作的人，不是年青人。有理想有抱負才能緩和社會腐敗之像；少少幼稚才能顛覆社會現有的形態與價值觀。

筆：你有沒有偶像？

花：父親是我的偶像。初初以為他是建制的，因家規多，及參加反高鐵集會時，家人反對。但後來家人發現自己熱心參與社會，會一生一世的去爭取理想，父親縱會擔心，卻無限支持與欣賞，以及提點自己的表現。希望將來能像父親一樣，可以擔起一頭家，又支持子女爭取理想。

評論

在現今的科技時代，互聯網世界的重要性，可以說是與現實世界並列，因此阿花指出網上言論和平常言論一樣，要被保護，不能收窄。可惜特區政府和建制派議員，仿傚內地政府，不斷以不同理由，如「保護兒童」、「保護版權持有人」等似是而非的藉口，對網上言論空間不斷進行逐步式的收窄，希望以溫水煮蛙的形式，假道德之名，來進行不道德的命令，即趕絕網上任何不利當權者的異見。

大陸有防火牆和綠壩，莫不以保護兒童等道德之名去試圖趕絕反對聲音。可惜特區政府不知是否受強權牽制，或建制派部份議員自甘奴才，為了獻媚而自割言論自由的口，不惜收緊網上言論自由，推出《版權修訂條例》等「網絡二十三條」，包括竟然把歐美國家也豁免，甚至鼓勵的二次創作刑事化，把至多是不禮貌但富有創意和表達自由的做法刑事化，可謂走向專政。

當中大力支持政府的民建聯更是其身不正，它們在2008年立法會選舉，擅自拿了組合「農夫」的歌，改改歌詞便當作宣傳歌曲，弄得組合「農夫」打電話給民建聯，希望它們下次用別人的歌曲前先通知一聲。可是民建聯有關方面不是不理會就是否認，弄得組合「農夫」哭笑不得。而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鑑林更說「有本事就自己創作」，除了曲解二次創作不是創作外，更被人發現有口話人，無口話自己。在他的海報上，竟然被發現抄襲電影《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的字句與標題以作宣傳。更甚是它們的立法會議員陳克勤在拉布事件上，不惜一面反對二次創作，一面叫人以二次創作去羞辱拉布的議員，叫人把議員的頭放在狗身上。

二次創作包括改圖、改歌詞、改電影橋段，例如甘小文的漫

畫足球員、賀歲片和搞笑片最愛拿別的電影片段改編、改歌曲歌詞等，這些都可能被視為刑事罪，十分荒謬，難怪文藝界與不少作曲家和歌手也大力反對政府的「網絡二十三條」。特區政府好學不學，在網絡管理上竟學被稱為「病態四國」之一的中國（SICK，S代表Syria敘利亞，I代表Iran伊朗，C代表China中國，K代表North Korea朝鮮。這四個國家都在網絡進行過份限制，包括不容許Facebook），因此阿花才要被逼組成「鍵盤戰線」與政府抗衡。

阿花認為香港人太向錢看，香港的經濟結構令到人民只能從「錢途」和「前途」、「餬口」和「理想」之間二選其一。這是強權扭曲資本主義制度所造成，令社會以權力和財富判成敗，把權力、財富、地位、成就連成一體。「錢」、「貪」、「權」、「靚」、「新」成為社會特性，五光十色和糜爛代表好，安份守己和保育守舊代表落後。社會成為拜慾社會，拜金、拜權、拜名、拜利、拜色，作為成功的量度標準，卻看低道德、仁義、廉恥、公平、貞潔，社會笑貧不笑娼。更不要說甚麼普世價值，如自由、民主、人權、平等、公義會得到重視。當權者認為只要給人民三餐溫飽和足夠享樂便是盡責，便不用談人權自由等普世價值。可憐的政府和其爪牙卻不知，只有

自由人權平等公義，才能建立一個讓人溫飽的平台。沒有平等與公義，只有有權者欺凌無權者，只有貧富懸殊，沒有大家溫飽；沒有民主，政府根本難以明白人民所需，遑論滿足民生。沒有自由，不容抗爭，只會令腐敗蔓延而人民不能脱離苦難；沒有程序公義，政府只求效率，只有辦事的快，卻沒有惠民的效。

可是一路以來，領導人也不明此理，阿花對梁振英政府感絕望，不是懷疑他的雄心壯志和能力，而是由於他不相信普世價值，行事只着眼所謂的成就，暗地推崇拜權拜利主義，卻不知和諧社會是需要公義平等自由來提供養份。例如梁振英為求力保愛將羅范椒芬，不惜破壞誠信，公然講大話説競選後不會聘請她，怎知一當選便聘請她為候任特首辦主管，公開食言。更甚是她有機會進入行政會議成員之列。這是為求方便自己，而不惜破壞誠信的例子。

羅太劣迹斑斑和霸道是她不受歡迎的原因，當年教改用心良好，但處理得一塌糊塗。她甚至公然打電話給當時的教育學院院長莫禮時，要求他要教授葉建源不再批評教改，公然干預學術自由，為的是求行政效率和消滅異見，這是不重視道德和普世價值所致。到後來打電話給曾蔭權政府，在調查梁振英西九醜聞上施壓；為教

科書商而打電話給教育局施壓（因報道指教科書商在特首選舉有三票投了給梁振英），以及打電話給公務員事務局施壓，要求她的候任特首辦主管之位不用受公務員條例規管，可見她故態復萌。此人若再當權，必成香港之害。

再者梁振英政府在聘請非專才也非香港永久居民的陳冉為候任特首辦項目主任時，為了免被指責除了專才才可聘請非永久居民，不惜講大話，說陳冉之位乃不是公職的候任特首辦政治助理一拆三，可是他們從沒向公務員事務局申請，沒經過審議與通過，完全違反程序公義，可見這個政府為求方便，不守公義，不守法規與沒有誠信。至於處理五司十四局改組，荒謬的以可變的競選政綱當作政策（但競選時缺乏內容細節），不想諮詢公眾，在最少用多三億六千萬公帑的政策上不欲諮詢，不理內容細節有否流弊，想強行通過，梁振英還說諮詢公眾是蹉跎歲月，羅范椒芬以不需事事諮詢為由，反對諮詢，只求快但犧牲公義。最後在民意壓力下才勉強進行一場立法會公眾諮詢，既不全面，只為求過關。這樣辦事，怪不得阿花也絕望了。

阿花最失望是當社會出現不公義時，政府竟袖手旁觀。政府可

惡之處是對於大財團聯合強權的吸血大聯盟，在不斷剝奪香港普羅大眾的勞動成果時，不但不制止，反因不民主制度而成為吸血大聯盟的代言人與打手。當民眾不滿，要求改革不民主制度，爭取人權自由獲得保障，以及向吸血大聯盟反抗時，反被政府打壓。政府與建制派乃吸血大聯盟的幫兇，對地鐵加價、領匯上市、巴士加價，只懂小罵大幫忙，甚至鼎力支持，害苦民生。

對於爭取民主公義的團體，政府動不動就政治檢控，抹黑對方是暴力團體（例如扔蕉乃教壞細路，拉鐵馬是暴力青年），但實質他們並沒做過甚麼傷害別人的事，還以不傷害別人為底線。由於他們是反對制度暴力，政府為了面子，反去打壓他們，令社會在人權自由的保護，隨着民生不斷倒退。政府責任是保障民主，改善民生，但現在只顧服務大財團，與站在不公平制度一邊，代表權貴多於代表人民，打壓爭取公義的團體，不是真正為人民服務。正因此，才越來越多像阿花一樣的青年人，走上反抗政府不義行為之路。

阿花說到她的啟蒙老師是其中學的老師，筆者也十分欣賞。教育不是為了賺錢餬口，乃傳道、授業、解惑，希望更多的教師能像阿花的中學老師那樣吧！

邱嘉俞

簡歷

1992年出生，末代中七學生，FM101成員。

訪談

筆：你怎界定自己的身份？

邱：自己乃國際主義的人，因此很少界定自己是甚麼人。從來也認為國界限制了人口流動，國家的存在則限制了為人口而服務而已，令所有事情只講人口政策。理想的世界內，不應存在國家，應消除階級與不公。

筆：那麼你愛中國嗎？別人問你是否愛國，你會怎樣回答？

邱：我愛任何國家的人，包括中國人。明白中國人罵中國發生的事情和罵中國政府罵得很厲害，也只是愛之深的表現。罵，不是出於排拒，而是基於愛。而自己熱愛中國文化，例如古詩與中國文字。

筆：在意識形態上，你認為自己是左？是中？是右？

邱：我是左傾的，追求公平、自由、民主、人權。我不是不接受議會民主，因西方民主的一人一票不是出路，但真的不能接受資

產階級控制下的議會民主。我們不要任何人或任何領袖幫我們作決定，我信奉國際共產主義，但不是朝鮮與大陸那種國家社會主義與專權主義的混合體。

人們會說直接民主無效率，但效和率根本不能並存，只能從快和有效當中二選一。我會認為有效比做得快重要。而且人民懂得快慢與控制節奏，當事情是緊急的，自然會調節審議與商討的速度。代議制度是不相信人有調節速度的本能與天性。

筆：你的理想制度是怎樣的？

邱：我先舉兩個例子，首先是墨西哥的Zatatista。它是一個自治區，十多二十年前和墨西哥政府抗爭成功後，進入無政府狀態，行共產制。雖有貿易，但能自給自足。乃一個講求平等為先的地方，多年來是左翼學習的對象。可惜他們的成功，還未引伸到別的地方。第二個例子是哥本哈根的自由城Christiana Town。他們也是一個自治區，無領袖，行共產制。內裏人民生活平等，凡事一起商討，例如即使興建一間住屋，大大小小問題也一起討論。這兩個地方是桃花源，希望能引伸到全世界。

社區根本不需要代議民主，就如學校裏不需要有班長那樣，

當權力交給了別人，則很多東西也會相繼給了別人，包括利益與原則。解決事情根本可以從商討達成，不需投票。

合作社模式是最好的，沒有階級之分，沒有人被剝削，沒有人被欺壓。例如為何一定要指定某些人洗廁所？為何不是大家輪流洗？為何一定要男主外、女主內？為何不可輪流或一起主外主內？為何秩序一定要由資產階級定下去保護它們利益？為何有人會有比別人多的權力？

筆：人們常說中國和香港那麼多人，根本不能大家一起坐下商討去解決問題。你怎看這說法？會不會人多就無法實行直接民主？

邱：社區自治是很簡單的事，根本無需擔憂。只是人們冷漠，不理身邊事，以及缺乏想像力，才以為直接民主只是空想而無法實現。人多不等於亂，人多不是重點，最重要是有甚麼想做。先由各社區自己先商討，然後跟別的社區一起商討便成。雖然社區間的商討需要代議士，但這和現今議會制度的代議士不同，因現今的是代人作決定，只是所謂的聽了別人意見後，就自己決定如何代大家表態，個人色彩很重；直接民主那種社區代議士只是訊息傳達者，沒權擅自改變社區達成的共識。只要有溝通，便能有最終共識，而且

共識不代表只得一條出路，不是那麼單一。每人分工也不同，只要包容決定便可，有時比投票更快能解決問題。如果真是沒有共識，想法那麼不一樣，就要分開，分成不同的社區了。例如古時希臘，每個社區或團體的人為數不多，甚至很多只得數人。

筆：你在做些甚麼去嘗試達到理想？

邱：自己在兆基創意書院讀書，當時有學生議會。自己和數位朋友提出直接民主，人人權利相等，以student voice代替議會制度。Student voice即放一枝咪高峰在中間，誰人，不論老師或同學，想發表意見就到咪前說出來，大家一起商討、一起決策。這樣便不會有人權力大，有人權力小，便沒有階級之分，便沒有少數被壓逼的情況出現。Student voice的模式很成功，期望能引伸到整個社會。

我不是故意不光顧大集團的那種左翼，消費選擇只會出於財政考慮，因小店鋪也是資產階級呢！我不贊同修正主義，不贊同小修小補，只求改變。不過自己仍是學生，未投入勞動市場，未能搞工運，所以先宣傳資本主義帶來的問題與自己理想的制度。

評論

邱嘉俞推崇直接民主，大家可能覺得她很傻，甚至聽都未聽過甚麼叫直接民主。但如果細聽邱嘉俞的解釋，以及哥本哈根自由城的例子，大家還會否覺得直接民主是天荒夜譚？邱嘉俞不會人云亦云，懂得自己思考何謂理想，然後盡努力去達成全民直接民主模式的理想，可謂「理想派」。在一個講求以錢財論成敗、凡事講求成績、講求多快好省如此現實與殘酷的社會下，究竟還有多少人是「理想派」？

不知是否社會太不公平、太現實、太勢利，人們好像習慣了認命與將貨就價，例如明明自己沒權選擇領導人，對領導人諸多不滿，都不會出來抗議，只會輕嘆反正以後日子也是這些人領導社會，何必抗議，只好配合認命，從沒出來力爭改變。有些錢的，兩餐無憂的，則會認為有得吃飽玩樂便算了，不要理會社會那麼多，身體力行的爭取理想，反被笑為傻仔甚至被不明所意的人大罵為搞事者。生活拮据的，則絕望放棄，或只為溫飽而戰，理想？太遙遠了。所以像邱嘉俞這些理想追求者，真是社會清泉，難能可貴。

可惜現實社會大家將貨就價，民主也要被扭曲或左切右斬的，

直到權貴們同意，再說甚麼民主也要符合國情、國家以經濟發展模式作主，其他只是配套，或甚麼富有國家特色的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等，又或像清代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總之就是因現實而要理想遷就，或因理想制度要實現需要付出太多而多加調整。這些則為「現實派」。究竟大家希望我們的下一代是「理想派」還是「現實派」？

邱嘉俞不認為代議民主能解決社會問題，也認為現今的社會太講效率。好像香港的立法會、行政，一味講求快，講求效率，所以政府提出五司十四局改組，如果立法會議員諸多質問與查詢，提出修訂與質疑，便是不講效率，便是與民為敵；議員為了不坐以待斃，反對自己認為不應通過的法案而去拉布，就是無聊與無效率。可是，大家對政府改組或其他政策質疑，可能是從根本大方向反對，所以想盡辦法，包括拉布，就是講求「效率」的行為。因效率不單講速率，不單要快，還要有效！從大方向反對就是認為那個政策會無效，甚至有害，會做成浪費，便反對之；如果反對的人不夠，便提出理據去說服別人；如果時間不夠或因制度不公而令反對無效，便要議會抗爭，甚至議會外的抗爭。

即使大方向認同政府的政策，也可提出質詢與修訂，因為大方向正確，不代表細節合理，所以不可以像羅范椒芬那樣說「先通過，後檢討」，待政策實行了一段時間才檢討，只要現階段盡快通過去實行政策便算了。中國大陸很多這種先通過後檢討的情況，往往因此出錯，賠上人命與金錢。例如溫州動車事件，只一味求快快的通車，少去實驗，結果發生慘劇。又例如經濟只求一味加速發展，沒有配套跟進，結果大量血煤血礦，大量煤礦工死亡，大量生態被毀。又例如三峽水壩為求盡快建成落實，沒有事前做足質詢論證，結果弄致今天破壞生態與造成洪災的局面。

所以好像梁振英政府想於（2012年）7月1日前通過政府改組，一來先天性不是民選政府而缺乏足夠人民授權，但為求急就章而沒按正常程序，就大型政策，一個最少涉及用多三億六千萬的政策去做廣泛的全民諮詢，被質疑為不重視民間聲音或沒去好好收集不同且大量的意見。梁振英說就此事全民諮詢會導致七一前難達成改組，不利新政府施政，以此為由認為全民諮詢乃蹉跎歲月，是假設大部份人也贊同多花三億六千萬去加大政府架構以及有點視民意如無物，認為諮詢是多餘，與曾蔭權的視民望如浮雲類似。羅范椒芬

可能也是太急於要通過改組，竟說事有輕重，不是事事都要諮詢市民。但羅范椒芬是否認為改組政府架構，一件影響後世政府的大事屬於小事，所以不用大型諮詢？但如果是小事，何必花上最少三億六千萬？如果是小事，不盡快通過又怎會影響政府施政？是否暗示政府能力有限？但改組是大事，那麼大事便要全民諮詢。政府乃市民的公僕，所以政府每用公帑的一文一分一毫，也要得到市民同意。如果政府是民選的，便是得到人民授權，但開支重大的，為了令社會和諧與讓人民了解如何使用那些開支，還是會先充份諮詢人民，讓他們理解和同意後，才會運用那些開支。如今改組影響深遠與需花上大量公帑，是要全民諮詢的。估計羅太心情太急，才一時說錯話，正如她當年可能太着緊教改，不希望太多反對聲音，便打電話給當時的教育學院院長莫禮時，要他向葉健源等教授施壓，不惜干預學術自由而要批評教改的教授收聲。

立法會的責任是監察政府施政表現，以及制衡政府權力，防止政府專橫與濫權。縱使梁振英政府是用心良好，為求方便新政府施政，不作全面全民諮詢就想通過改組，甚至為求加快通過進度，竟然一反常態，要求先通過撥款才交給立法會大會審議，有點霸王硬

上弓。可是這些行為就像梁振英沒先向公務員事務局申請、審議、通過便聘請非香港永久居民陳冉做候任政府辦項目主任一樣，違反程序公義。而當執政者習慣違反程序公義，便是走向專橫與濫權。很多獨裁者便是由此開始，儘管他們的心也是以服務人民為本。最後在權力膨漲與缺乏立法機構監察與制衡下，施政走向錯失。所以立法會議員對梁振英政府那麼急於改組的行為而提出大量質詢與修訂，一來有精益求精的作用，把細節修改得妥當，務求運作時盡量少出錯；二來就是提醒政府不要習慣走違反程序公義的道路，免走向專橫濫權。這正是講球「效率」的表現，非像羅范椒芬口中的「玩嘢」。因「效率」不只是講求速率，還講求效果與功率。事前盡量質詢就是務求政策運行時會得到最大的效果與功率。如果在質詢後認為物非所值，預期效果低下，政府便要擱置議案，修改後才再動議。

所以代議政制，立法會除了保障少數派的發言權，免經過流血才得出結論，還有制衡與監察之作用，英國的上議院最多能三次要求下議院再審議法案，拖延立法時間，就是希望所有政策能三思而後行。可是目前香港只一味講求快，只講速率，而不講功率，這種把立法會當成橡皮圖章，只是配合行政的快，而討厭質詢，扭曲立

法會的監察與制衡原意，會進一步破壞行政立法關係。

所以當大家常說民主不是靈丹妙藥，立法會全民直選也不代表能解決所有事情，而用此為藉口去拖延普選實行，就是不明白立法會的真正功能。立法會真正功能是反映不同聲音，發出不同意見，去監察與制衡政府。

正正是代議政制也不代表能解決問題，所以才有人像邱嘉俞那樣，信奉直接民主，認為是達成共識與解決問題的最好制度。當然，在講求快和認為人多便會慢的社會下，直接民主並不容於多數人心中。

香港目前最悲哀的就是代議政制，因制度上不公，有功能組別與分組點票模式存在，令少數人能否決多數人的代議士決定，只因他們刻着「功能組別」四字，便高人一等，有着生殺大權，可是偏偏多年來表現最不濟的，卻又是功能組別的議員們。試問一班長期不需經過普選誕生，不需經過全民監察的代議士表現又怎會好呢？所以一些在社會上得到大部份人支持的政策，如勞工應等同白領享有十七天而非十二天公眾假期、檢討強積金（例如檢討行政收費制度）、港鐵車站加設洗手間等議案，也因功能組別議員的反對而不獲

通過，因此沒有普選下，民生也未必得到保障。所以那些不支持取消功能組別與分組點票，或盡量拖延普選的政客，是否真心為民？大家自己明白。

邱嘉俞說到現在的國家政府只為人口服務，只作人口政策。人口政策就是講求規劃，因應人口的轉變與預測，而對人口就各樣事情的供需求，例如住屋、就業、教育、醫療、社區設施等政策有所調整。人口政策也包括照顧人的生活需求，安居樂業是基本條件，雖然沒有多少政府能做到。因此要滿足人民的衣食住行，就必須發展經濟，讓有足夠的錢去養活人民。可是很多發展中大國，就忽略了另一點，就是住與行，讓人民生活在一個安適環境，這包括治安良好與環境清新優美。很多發展大國犯下只顧發展經濟，而忽略環境與治安的毛病，令國家收入雖然是多了，但人民生活質素沒有全面的改善。例如大陸政府講求四個現代化，工業、農業、科技、國防，但忽略了環保與保育。現在則太講城市化，而忽略農鄉。例如上世紀90年代中期為求發展經濟與鼓勵借貸，導致壞賬過多，很多地方政府無法還債便向農民妄加徵稅，忽視農民權利。現在則過度發展城市而漠視農村存在的重要性，令農民、農村、農業不盛，落

後英國的農業發展一百五十年，落後美國的則有一百多年。農業人口佔勞動人口比例不斷下降、農業增加值佔GDP不斷下降、農業生產率落後就是實證。

而當政府只重視人口政策，便會忽視人性政策。人性政策即尊重社會價值與精神文化，就是尊重與保護和諧、快樂，這些需要建築於法治、公平、公義之上，而公平公義則建基於保障制度平等、保障人權、保障自由之下。人口政策照顧生理需求，而人性政策是照顧心理需求，兩者兼備與做好，才能達至安居樂業與和諧快樂的景象。

後記

對於下一代、對於年輕人、對於九十後、對於夾縫一代，不論事大事小，我們總因他們年少關係，便假定他們無知，希望他們的思路跟成年人一模一樣。當我們常以為自己經驗和知識比夾縫一代多，便認為他們思想不成熟時，有沒有嘗試了解他們究竟在想甚麼？我們知不知道他們究竟怎看自己身處的社會？他們怎看香港和祖國？當我們認為他們應該叫自己做中國香港人、中國人或香港人時，其實了不了解，我們社會將來主人翁是生長於夾縫的一群，他們是怎樣界定和看待自己的身份？筆者寫此書的原因，就是希望拉近生於夾縫的他們和大家的距離，讓我們知道他們究竟是否我們所想的無知、思想不成熟、人云亦云的一群？以及憑此書，表達筆者對主宰社會未來的九十後之寄望。

從書中各九十後的訪問中可見，不論左中右，不論親建制還是民主派支持者，都不約而同的認同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普世價值，也是香港的核心價值，甚至適用於中國大陸。因此九十後，以及我們追求普世價值、保護核心價值，是應份的。即使從功利主義看，即使只向錢看，民主、法治、自由等價值，也是有利的。

一個司法制度健全、法治獨立的社會，不論自家企業還是外

資，其資源財產都能得到充份保障，有利吸引外地與本地資金投入，對經濟發展有利。所以如真的希望香港和中國持續良好發展，我們都應追求司法獨立、法治健全。當社會有一個民主制度，令當權者的權力來自人民授權，政府必尊重人民意願；當社會有良好法制去保障不同聲音以表達自由，人民能隨心發聲，訴求會被尊重，那麼社會必定和諧。這樣便不需要花龐大的維穩費，以及政府不需要打壓不同聲音，社會也必定做到和而不同、同舟共濟。

有充足自由讓人表達意見，而政府因主權在民而細心聆聽，這樣還會出現高壓統治嗎？只有缺乏健全法制去保護表達自由以及不尊重民意的政府，才會用高壓手段打壓不同聲音，隨之而來的是社會環境不穩定，導致不利投資、嚇走資金。所以當懷疑有人在行政會議上提出用防暴隊，甚至解放軍去對付反對二十三條的市民，才會令商家那麼震驚和擔憂。因此，即使在功利主義下，只顧經濟投資，民主法治與其關係是相輔相成的，必須爭取保護之。這就印證到為何不管我們把自己界定為香港人、中國人或是世界公民，都同樣追求民主、自由、法治、人權，而對種種欲打壓這些價值的人士討伐之。

在大陸，這些價值固然未得到彰顯，但為了經濟利益還是希望構建公義社會，儘管手法不同，我們也會爭取之。而我們身處的香港又怎樣？在小圈子選舉下，政府由大富豪集團與強權或推舉或欽點的選出來，因此政府只是大富豪集團與強權組成的吸血聯盟代理人（即一班即使不斷造大經濟個餅，卻透過政策傾斜而造成不公平的分配，令利益倒向它們，且不斷蠶食着香港人的努力與成果的一班既得利益者組成的聯盟，而這班既得利益者大多是地產霸權與強權的話事人），所以不論由誰做特首、誰帶領政府，不管是外表慈祥的董伯伯或是曾經被高度評價的曾蔭權所領導的政府，最後都是剝奪普羅大眾利益，以及傾向吸血大聯盟。在這個背景下，有人因被壓迫而反抗，有人因不值普世價值被摧殘而走上表達異見之路。

還有一個核心價值，不論左中右的夾縫一代也會擁護，也是中國人自古以來教育的傳統美德——良知是也。良知凌駕一切制度與權力，不論治國、立人、辦事，以良知來作判斷是最基本的。不論利益多大、權力多高、錢財多廣，也不應蓋過良知。1991年9月，德國統一後的柏林法庭上演柏林圍牆守衛案。接受審判的是四位三十歲不到的前東德柏林圍牆守衛。1989年前一個冬夜裏，兩位約

二十歲的東德年輕人一起偷偷攀爬柏林圍牆，企圖逃向自由國度的西德時，卻慘被圍牆守衛射殺。短短九個月後，圍牆倒下，那些殺了人的守衛在法庭受審。柏林法庭最終的判決是殺人罪名成立，判刑三年半。守衛的律師辯稱，守衛們只是執行命令的人，根本沒有選擇的權利，罪不在他們。法官當庭指出：「東德的法律要你殺人，可是你明明知道這些唾棄獨裁而逃亡的人是無辜的，明知他無辜而殺他，就是有罪。作為警察，不執行上級命令是有錯的，但是打不準是無罪的。作為一個心智健全的人，此時此刻，你有能力把槍口抬高一厘米，這是你應主動承擔的良心義務。」

2012年，美國德州一名男子，為了拯救正被色魔侵犯的五歲女兒，赤手空拳將色魔打死，檢察部門以「暴力傷人有理」為由，決定不起訴女童的父親。辯方律師指，被告沒殺人意圖，他只是為了保護女兒才出手傷人，德州法例規定在阻止性侵犯案時，任何人可使用致命力量。檢察官麥克明權衡輕重後，最終宣佈不起訴女童父親，當地居民都讚揚當局的決定。但在這個世界上，良知是最高的價值，是不允許用任何藉口來無視的。但現在當權者與政客們，有多少真是本着良知做事?有多少是憑良心出發？可惜大多是利慾薰

心，令糊塗顛倒的政令無日無之。

昂山素姬深受愛戴，除了因她的學識，主因是她對良知的執着。為了下一代，我們應以身作則，以良知作行事判斷。香港人多年來要求中共平反當年天安門慘案；關心趙連海、劉曉波、李旺陽等人的情況，不是關係利益，乃出於良知。這不是香港人以人權為名去干預內地行政，而乃以良知出發去為國家內違反公義的事發聲。可是連無權者大聲問當權者一句「聽到嗎？」也是擾亂秩序，試問怎不叫人心傷？

法治則是要保護人權與達致社會公義。所以為何政府要受立法會制衡、行政要由獨立的司法去監察以避免專橫，法治應用以追求社會的公義，以求和諧；因此制度的平等、一致性的執法是必須的。可是立法會可不經充份授權與合理程序便剪布、政府的諮詢常先定立場（例如替補機制不能選擇保留原有方案）、政府不作充份諮詢便推行政策、多次不守程序公義的行事和官員處事、立法會組成制度不公、問責官非民選出來、選擇性的政治檢控與運用司法打壓異己，都破壞法治應是保護人權與達致社會公義的戒律，確叫人擔心。

當我們運用知識經驗去作出是非黑白判斷後，發現大眾應有的

利益、社會本來的共同美好，被吸血大聯盟與其代理人摧殘時，要在一個民主程度、制度保障不足的情況之下發出異見與反對聲音，是需要很大的勇氣。可是很多香港人是那麼「一等良民」，在謊言世界中仍然那麼逆來順受；被壓迫也不敢反抗，還以「順民」自居，以「顧全大局」作藉口來欺騙自己，實質上卻是默受溫水煮蛙。把自己推向死角的人民佔大多數時，那些敢於發表異見的，只是少數，而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更被打成「激進少數」。

我們見到不義制度亦默不作聲，見到大財團在官界允許甚至勾結下形成霸權，也不表態不出聲不反抗，他們更把矛頭指向出聲的社運人士與反抗的市民，說他們在「搞事」，容許權貴為他們扣上「暴力」的帽子；對反霸權的政團政客，又說他們「教壞細路」。我們實在是容不下抗爭的雞蛋，卻容得下霸道的高牆。因此香港才出現「凡是派」(凡阿爺的說話都說是) 政客，他們依靠那個打壓人權、限制自由、懼怕真話、懼怕民主的極權獨裁政權，幹着剝削香港核心價值的行為，卻包裝成為人民服務的外表。為何大家對此反而可以接受？我們想不想下一代也是這樣？

已去世的音樂家黃家駒說過：「生命不在乎得到甚麼，只在乎做

過甚麼。」「我們可以抱怨，但也要同時爭取改變；否則只抱怨而不爭取，你只是在抱怨而已。」「我不知道甚麼是大事小事，我只知道甚麼是應該做的事。」我們的態度可以是很多種，可以憤怒，可以不滿，可以欣賞，可以滿意；但我們不能只停留於態度，我們還要有行動，因為不行動，你是不會得到你想得和應得的東西。

所以我們即使不夠道德勇氣出來發表異見，也應支持勇敢的他們，或最少不要打壓他們。因此如果我們不去聽他們有否道理，反叫他們收聲，反叫他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們就是自私；如果我們不理會被打壓的同胞，為了自身安全而不去聲援他們，我們就是冷漠；當我們因為怕事，縱使不滿也不發聲，我們就是犬儒。

自私、冷漠、犬儒就是對社會不關心，當大家不關心時，它會變成怎樣？

請看台灣作家龍應台在《不會鬧事的一代》一文中曾引用《紐約客》雜誌的文章：

「我的母親生在柏林，僥幸逃過猶太人的大屠殺。今年母親節，我請她去看場電影。這部影片非常賣座，故事好像與非洲的黑人有關。排隊買票的行列很長。有一個年輕白人在行列間來往發散傳單，勸大家不

要買票，因為這部片子是南非製作的。排隊的人大概想的都和我一樣：怪了；不看由我自己決定，不用你來告訴我。所以沒人理他。

「入場之後，燈黑了電影正要開始，前座的兩個年輕女孩突然站起來面對觀眾，大聲地演講，解釋這部影片如何蔑視南非黑人的慘況，希望大家抵制。觀眾中噓聲四起，有人不耐煩地大叫：這裏是美國；你要抗議到外面去！也有生氣的聲音喊着：我們付了五塊錢電影票讓我們自己決定愛看不看！然而有個微弱的聲音說：聽聽她們說甚麼也好！

「但是群眾的喊聲愈來愈大：『出去！出去！』坐在我身邊的母親顯得很難過，她轉身對我說：『那兩個年輕女孩竟然願意花十塊錢買票進入一個人人喊打的地方來——或許她們真有點道理也說不定。』

「在大家的鼓掌聲中，戲院的工作人員很粗暴地把那兩個女生抬走了。燈又黑下來，但是沒幾分鐘，一個年輕人，帶着濃厚的英國腔，站起來說：這是一部充滿種族歧視的影片，發怒的觀眾打斷了他的話，有人在叫警察，但這個青年毫無懼色，繼續大聲說：『你們不讓我把話說完，我是不會走的！』觀眾喊着：『滾蛋！滾蛋！』

「不久，來了兩個警察，笑容滿面地把那家伙請了出去。

「觀眾情緒還沒有完全穩定下來，一個廿來歲、一臉鬍子的小伙子在後排突然站了起來說：『我跟他們不是一道的；我跟你們一樣買了票

純粹來看戲的。我只是想到，或許對於這樣一個影響千萬人一生的問題，我們應該有個堅定的道德立場，而不只是追求消遣而已。如果五十年前的人也像剛剛這幾個人這樣對被迫害的猶太人執着的話，我的祖父也許可以活到今天，不至於死在德國的煤氣房裏。』然後我就聽到一個非常熟悉沙啞的聲音突然響起：『你說的一點不錯；你可別想叫我閉嘴！』發覺我六十四歲的老母親站了起來，面對着整個戲院，她全身在顫抖。」

如果我們自己和下一代都像故事中的觀眾那樣，不關心別的聲音，最終受害的只會是我們自己。德國神學家馬丁•尼莫拉在懺悔時曾寫過以下一首詩：

當納粹追殺共產主義者
我保持沉默
——我不是共產主義者
當他們追殺社會民主主義者
我保持沉默
——我不是社會民主主義者
當他們追殺工會成員
我沒站出來說話

——我不是工會成員

當他們追殺猶太人

我保持沉默

——我不是猶太人

當他們要追殺我

再也沒有人為我說話了

身處同一天空下，沒有事不關己的事，當社會出現不公義狀況時，如果我們默不作聲，最終也會受害。「沒有人能自全，沒有人是孤島，不要問喪鐘為誰而敲，喪鐘為你我而敲。」(約翰・唐恩《喪鐘為誰而鳴》) 而冷漠自私還會使人的智慧和價值判斷的能力倒退。看龍應台文章《不會鬧事的一代》:「沒有關心，自然沒有做價值判斷的需要。根本不知道南非有嚴重的種族問題。當然就不必去思索誰是誰非，因為無從思索起。沒有關心，也就無所謂道德勇氣和道德行動。非洲的幼兒可以死光，南美的軍隊可以強暴婦女，因為事不關己。海山的煤礦可以一崩再崩，桃園的古迹可以拆了又拆，內湖的垃圾山可以燒了再燒，事不關己。大學四年之中，只有兩件值得關心的事：一是把朋友交好，以後有結婚的對象；一是把功課讀好，將來有滿意的出路。對社會的關心，對是非的判斷能力，擇善固執的勇氣，都不在大學的圍牆以

內。」當然對於香港，最後幾句可改成為：人生數十年之中，只要三餐溫飽，經濟發展良好，有樓住有工做……都不在我們的一生出現。

因此我們和九十後，不要作只懂吃喝的行屍走肉，而要做個會關心、有人性的人。當遇上不平事，當身處不義制度的社會上，我們要出來爭取，因為公義不是從天而降的，公義永遠是爭取回來的，縱使過程中難免損傷。緬甸的8888抗爭與蕃紅花革命、南韓的光州事件、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北非茉莉花革命，這些地區現在享有的成果或階段性成果，都是靠抗爭得回來的。香港也是經過反貪污捉葛柏運動、中文運動、六七抗爭／暴動、焚燒《基本法》運動、反二十三條運動等抗爭，才有目前得來不易的階段性成果，如果我們不持續下去，公義社會只會越離越遠，我們想後代在公義社會內快快樂樂長大的夢只會遙遙無期。

馬丁•尼莫拉：「如果保持沉默，不為公義發聲，最後所有的反對聲音都會被消滅，任何人都自身難救。」人權鬥士馬丁路德金：「一個真正和諧的社會，不是爭議的消失，而是公義得到彰顯。」《聖經•彌迦書6：8》：「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甚麼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聖經•雅各福音4：17》：「人若知道行善，卻不去行，這就是他的罪了。」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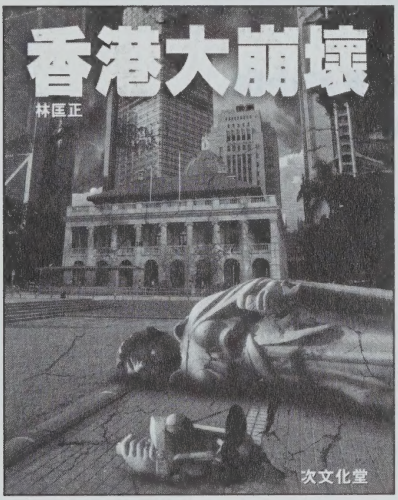
上可見，公義要身體力行爭取才能彰顯，憐憫不只是內心的情感，而是以實際行動幫助別人解決困境。

因此筆者愚昧的寄語九十後年輕人，社會的未來在你們手中，不要浪費你們的朝氣，要做個「公民」，即行公義精神的人民，去為追求和諧美好社會而行動。反之，如果不作「公民」，而作冷漠自私的犬儒，社會只會一步一步的走向黑暗，而我們的後代也將活於黑暗的國度中。最後，筆者想送一首歌給大家，送給還未處於公義社會的各位，一首太極樂隊主唱，潘偉源填詞的歌———《沉默風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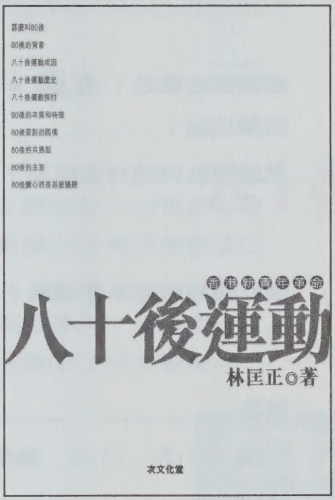
看世界鋪滿塵垢　理論也盡數錯漏
冷眼看真理掉進了深溝
幹勁變真正朋友　努力押在我背後
縱氣憤傷痛也要接受
我要有公正自由　我要有歡笑永久
我要法紀不朽
揮走了塵垢　揮走滿途引誘
揮走痛苦擔憂
多少次圍困　今天我仍奮鬥
刀鋒哪許生銹

補購

林匡正◎作品



《香港大崩壞》



《八十後運動》

補購表格（愛護書本，請用影印）

本人現購買　《香港大崩壞》 _____ 本（每本港幣94元）（連郵費）
　　《八十後運動》 _____ 本（每本港幣64元）（連郵費）

姓名：_____

地址：（只接受本港地區）_____

_____

請連同劃線支票
寄香港九龍彌敦道612號好望角大廈1009室　**次文化堂**　訂購部收
支票抬頭：**次文化有限公司**

次文化堂

讀者服務卡

✣謝謝您購買次文化堂的書，請您詳細填寫本卡各欄寄回給我們，以便我們有為您服務的機會。

您購買的書名：夾縫●九十後看中国

購買地點：..... **區**..... **書店**

您習慣以何種方式購書？

□①逛書店 □②郵購 □③電話訂購 □④傳真訂購

□⑤團體訂購 □⑥銷售人員推薦 □⑦其他_____

您從哪裏得知本書消息？

□①逛書店 □②報紙廣告 □③親友介紹 □④圖書館

□⑤廣播節目 □⑥書刊 □⑦書評推薦 □⑧其他_____

姓名：_____ **年齡：**_____

性別：□ 男 □ 女 **婚姻：**□ 已婚 □ 單身

地址：_____

職業：_____

教育程度：□①小學 □②中學 □③大專或以上

您對本書的意見：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可另紙書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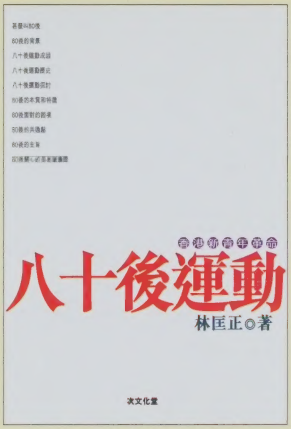
地址：九龍彌敦道612號好望角大廈1009室

次文化堂編輯室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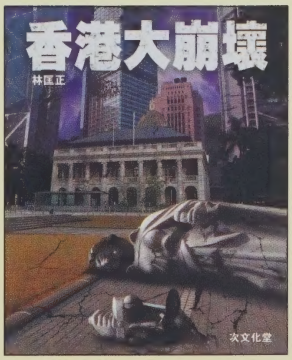
＊凡來信者，可獲本社禮品答謝（請附回郵信封）。

＊請勿撕毀此書，煩用影印本寄來。

林匡正作品



《八十後運動》



《香港大崩壞》

這本書，是我的珍藏

藏書人：

收藏日期：

ISBN 978-962992303-7
88
9 789629 923037

次文化
現象文化
時代見証

SCB 575 $88
ISBN : 978-962-992-303-7
Printed in Hong Kong